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碩士學位論文

指導教授：楊瑞松博士

滿洲國復辟派「反共」意識的形成
(1931—1937)

The Formation of Qing Restorationists' "Anti-
Communist" Ideology in Manchukuo (1931–1937)

研究生：江紀良 撰

中華民國 112 年 7 月

謝辭

本論文的完成必須歸功於許多師長、朋友的指導與協助。首先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楊瑞松老師。從碩一開始修習老師講授的課程中，得到許多啟發，對我的教導不僅在智識層面，對於史觀的塑造，本文問題意識的形成皆有所影響；指導期間，老師也不吝於在生活及工作上給予我諸多協助，讓我在無虞於經濟壓力的情況下，有許多彈性時間得以專注在論文寫作；最重要的是，在我開始得到老師的指導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提醒我論文寫作務必一氣呵成，寫作期間老師也不厭其煩地在百忙之中安排時間檢閱我的論文，甚至親自來電提醒我論文需要修正的地方，使本論文得以順利完成。

本文最後的完成得益於兩位口試委員—林志宏老師和藍適齊老師所提供的寶貴建議，兩位老師仔細的審視我論文中的問題並提出修改建議，對本議題進一步提出未來能夠繼續深入研究的方向，並對本文在史料運用方面做出肯定，使得本篇論文更加完善，感謝兩位口試委員不吝指教。

本論文在問題意識的形成過程中，要感謝許多老師的給予的啟發與建議，在師大修習葉高樹老師的清史和教育實習的過程中，促使我注意到清遺民、復辟派的相關研究；在政大修習民國史期間，劉維開老師介紹之王奇生關於反革命的研究亦對我形塑本篇論文的寫作方向有著決定性的幫助。

本篇論文在史料蒐集方面得到許多協助，特別感謝劉維開老師和周惠民老師介紹我參與政大人文中心的工作，在寫作過程中受到李素瓊助教等中心人員的照顧，在政大人文中心的計畫結束後，承蒙蕭淑慧學姊的推薦，進入中研院民族所參與歷史人口研究計畫，方便我在中研院蒐集資料。在中研院蒐集資料的過程中，特別感謝民族所黃郁麟助教協助借閱院內資料，也感謝張孟珠學姊在口試前，提醒我口試需要注意的準備工作。廖敏淑老師在我解讀日文資料的過程中，給予我許多幫助，並指正我原先在日文資料運用的問題，進一步促使我使用《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作為本文寫作的重要資料，並在史料運用

方面獲得口試委員的肯定，特致謝忱。

在論文寫作和研究所學習的過程中，有幸得到學長姐和同學不斷的鼓勵與協助。感謝林亨芬學姊、江瑜庭學姊、江晉諺學長、李烈寬同學、楊鈞量同學在口試前給予建議與勉勵，其中楊鈞量還在深夜模擬口試時，口試委員可能會詢問的問題，讓我在正式口試時面對提問時，不至於口不擇言。

感謝師大派緹甜點社，即便畢業多年，在社團所學到的烘焙技巧還是能讓我在寫作遇到瓶頸之際，藉由甜香帶我走出寫作卡關的深淵。感謝當天來旁聽的各位同學、國家圖書館、國史館、郭廷以圖書館為我調閱資料的工作人員，以及所有在我寫作論文中給予各種幫助與鼓勵的師長同學朋友。感謝師大派緹甜點社，即便畢業多年，在社團所學到的烘焙技巧還是能讓我在寫作遇到瓶頸之際，藉由甜香帶我走出寫作卡關的深淵。

最後要感謝我的家人，有你們的包容與鼓勵，忍受我耗費青春在歷史洪流中的斷簡殘篇之中，讓我在經濟狀況無虞的情況下，保持餘裕完成本篇論文。謹將此論文獻給我摯愛的家人。

摘要

本研究旨在以反共意識的角度，重新反思復辟派參與滿洲國建國的政治認同。本研究將從新文化運動中的清遺民開始談起，當新文化運動對於傳統價值觀的敵意越深，激進暴力的共產思想越發蓬勃。對於主張捍衛傳統價值觀的清遺民，越發認為自己已經在民國喪失容身之處，更有部分清遺民也走向極端，對抗赤化危機的意識促使他們選擇藉由日本之手，反抗民國的意識形態。本研究所採用的復辟派，除了政治認同傾向清朝的清遺民，還包括積極參與復辟的清朝皇族在內。

藉由滿洲國發行的報刊史料，能夠藉此研究滿洲國清遺民，如何將「反共」、「復辟」等政治意識，透過國家的力量，建構滿洲國的國家意識。鄭孝胥主政滿洲國文教部期間，力主排除他所認為會危害滿洲國建國精神的共產主義、三民主義等異端邪說，並透過國家宣傳、教育等方式，企圖「恢復」傳統儒家，將滿洲國建設成「王道樂土」。然而以鄭孝胥為首的清遺民所建構的王道，不僅逐漸不被掌握滿洲國實權的日本關東軍所接受，溥儀也認為鄭孝胥的王道脫離現實。

1935年5月，為了提升自己身為皇帝的權威，溥儀將滿洲國建國精神從王道轉向日滿親善，並逐漸疏遠清遺民，企圖在滿洲國引進天皇制，獲得日本官吏的忠誠。溥儀也企圖促進日滿軍事合作，讓日本提升滿洲國軍軍備，而關東軍也意識到以共產黨為首的反滿抗日勢力逐漸擴大，需要加強日滿軍事合作來討滅共匪，反共成為滿日雙方強化軍事合作的理由。原先清遺民因為厭惡革命、共產思想的激進暴力，而主張在滿洲國用文教來實行王道，在轉向日滿親善之後，滿洲國對共產黨則將其視為反滿抗日勢力，加以軍事鎮壓。而日滿親善成為滿洲國建國精神的主體，也意味著溥儀實行帝制的正當性，不再是滿洲國國民的民意，而是日本的支持，當日本帝國戰敗，喪失統治正當性的滿洲國也隨即土崩瓦解。

關鍵詞：復辟、清遺民 滿洲國 鄭孝胥 王道 反共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reconsider 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the Qing restorationists involving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Manchukuo in terms of anti-communist consciousness. The research begins with the Qing loyalists in the period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when the hostility against traditional values grew deeper as the radical and violent communist ideology thrived. The Qing loyalists, who advocated for the defense of traditional values, increasingly felt marginalized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some of them even turned to extremism. Their awareness of the communist threat prompted them to collaborate with Japan as a means to resist the ideolog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Qing Restorationists referred in this study include not only the Qing loyalists with the political loyalty towards the Qing Dynasty but also the Qing imperial family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Qing restoration.

By examining the historical resource carefully published by Manchukuo's newspapers,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how Qing loyalists in Manchukuo constructed an ideology for the state through the adoption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such as "anti-communism" and "Qing restoration". When Zheng Xiao-xu served as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in Manchukuo, he attempted to suppress Communism and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which he perceived as harmful and threatened the spirit of Manchukuo's establishment, and "revived" Confucianism to establish Manchukuo as a "Dreamland of the Kingly Way" through state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However, the ideology constructed by the Qing loyalists led by Zheng Xiao-xu gradually became unconvincing in the eyes of the Kwantung Army, which held real power in Manchukuo, and Puyi himself deemed Zheng Xiao-xu's vision of Kingly Way as detached from reality.

In May 1935, in an effort to enhance his authority as the emperor, Puyi changed the founding spirit of Manchukuo from "Kingly Way" into "Japan-

Manchuria friendship" and gradually distanced himself from the Qing loyalists. He sought to introduce the imperial system of Japan to gain the loyalty of Japanese officials. Puyi also aimed to promote military cooperation between Japan and Manchukuo to enhance the military capabilities of the Manchukuo Army. The Kwantung Army realized that the anti-Manchurian and anti-Japanese forces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were growing, necessitating the strengthening of military cooperation between Japan and Manchukuo to eliminate the communist rebels. The Qing loyalists, who originally detested the radical violence of the revolution and communist ideology, advocated for implementing the "Qing restoration" through education in Manchukuo. However, after shifting towards Japan-Manchuria friendship, Manchukuo viewed the Communist Party as an anti-Manchurian and anti-Japanese force to be suppressed militarily. The focus on Japan-Manchuria friendship became the main ideology of Manchukuo's founding spirit, signifying the legitimacy of Puyi's imperial rule not based on the will of Manchukuo's citizens, but rather on Japan's support. When the Japanese Empire was defeated, Manchukuo lost its legitimacy as a result, and also collapsed.

Keywords: Qing restoration, Qing loyalists, Manchukuo, Zheng Xiao-xu, Kingly Way, Anti-communism

目次

謝辭	ii
摘要	iv
Abstract.....	v
目次	vii
表次	ix
圖次	x
緒論	1
一、 問題意識.....	1
二、 研究回顧.....	6
三、 研究方法與資料說明	9
四、 章節架構說明.....	12
第一章、清遺民反共意識的形成	15
第一節 共產主義與對清遺民的衝擊.....	15
第二節 清遺民在九一八事變中的抉擇.....	22
第三節 滿洲國清遺民對「日滿合作入關」的歧見	27
第四節 小結.....	31
第二章、反共與滿洲國王道主義	35
第一節 鄭孝胥與滿洲國文教部.....	36
第二節 鄭孝胥與《王道週刊》的發行	41
第三節 《王道週刊》中的反共宣傳.....	46
第四節 王道與法西斯之間	49
第五節 小結.....	53
第三章、王霸合作與日滿一體的轉化.....	56
第一節 滿洲國清遺民與王霸合作.....	56
第二節 鄭孝胥去職與清遺民勢力的衰落	61
第三節 日滿一體與提升滿洲國皇權.....	63

第四節 小結.....	66
第四章、日滿親善與合作防共	68
第一節 溥儀與日滿軍事合作	69
第二節 日滿合作與討滅共匪	73
第三節 海拉爾事件與思想對策工作.....	79
第四節 小結.....	84
結論、反革命論述與滿洲國的集體認同.....	86
一、清遺民思想中的反共意識.....	86
二、他者建構與反共	88
三、日滿親善與滿洲國正當性的轉移.....	92
參考文獻.....	95



表次

表 2-1 1933年滿洲國文教部職位人員組織表	39
表 3-1 建國以來滿洲國內匪賊盛衰狀況表.....	77



圖次

圖 2-1 滿洲報十年紀念鄭孝胥提詞.....	42
-------------------------	----



緒論

一、問題意識

自辛亥革命之後，「革命」在 20 世紀的中國逐漸被建構為具有神聖不可動搖的道德正當性。在陳建華的研究中，「革命」的話語在現代中國歷經了一連串的演變過程，從原先以暴力的政治手段造成皇權更迭的含意，經由梁啟超從日本引入世間一切事務變化的涵義，革命的意義在現代中國的話語中，逐漸被革命派限縮在政治範圍，且與暴力密切相關¹。「革命」的概念從革命黨推翻帝制，到共產黨主張階級革命，一直延續到中共發動文化大革命都又越來越擴大的趨勢。

當「革命」的概念被逐漸建構、神聖化的同時，陳建華也注意到，伴隨「革命」話語發展的副作用，乃是二元思維模式的形成，將中國人二分為革命陣營與反革命陣營，中間份子的生存空間逐漸被壓縮²。而與革命相對的「反革命」也被建構出來做為革命事業所必須打倒的對象。然而如同革命的所被賦予的意義一樣，「反革命罪」是一條虛實相因、真偽難尋、寬嚴無度的政治污名³。支持革命與反對革命之間，具有對立又相輔相成的複雜關係，若無反對革命的一方與之對壘，「革命」也無法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具有如此巨大的分量。

為此，透過研究代表反對革命的清遺民群體，如何應對日益蓬勃的革命浪潮，才能接近 20 世紀中國革命過程的複雜歷史。

清遺民在近代中國是以反對革命的代表群體登場在歷史舞台。對清遺民的負面報導可追溯至辛亥革命成功之始，於民國初年更是屢見不鮮。被譏為「遺老」的這批人，是民初公眾媒體批判撻伐的一大門類。他們既然仍以皇清子民自居，其公眾形象自不可免的與失勢的王

¹ 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 中國革命化與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 167-169。

² 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 中國革命化與考論》，頁 171。

³ 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 120。

朝相連。在政治上，他們被當成貪得無厭、耽溺於權謀、處心積慮籌畫復辟的野心份子。在革命被建構的過程中，對於反對革命的群體則加以排斥，並對他們所信奉的傳統文化加以貶損，在樹立革命的正當性之餘，展現自己追求新文化的優越性，例如，1919年1月，陳獨秀（1879年—1942年）在《新青年》發表〈本誌罪案之答辯書〉時，就特別針對反對新文化運動的清遺民加以批評：

這第二種人對於本誌的主張，是根本上立在反對的地位了。他們所非難本誌的，無非是破壞孔教，破壞禮法，破壞國粹，破壞貞節，破壞舊倫理（忠、孝、節），破壞舊藝術（中國戲），破壞舊宗教（鬼神），破壞舊文學，破壞舊政治（特權人治），這幾條罪案。這幾條罪案，本社同人當然直認不諱。但是追本溯源，本誌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⁴

陳獨秀將清遺民形容為在文化上、政治上保守頑固的形象，暗示著復辟派的衰弱，以及缺乏進步性，只能被新時代所淘汰。然而關於復辟派為何願意在飽受中國輿論批評的情況下，不惜與加入滿蒙、華北地區有野心的日本所主導的滿洲國也要恢復帝制的問題。除了獲取政治權力之外，1920年代到1930年代的時空背景是否也促進部分清遺民作出與日本協力的決定？若單純將清遺民與日本協力歸咎於清遺民本身的保守性，則難以探究中日各派系之間的複雜關係。

九一八事變爆發期間日本對中國東北的政治動員，除了採取威脅利誘的方式將東北地方軍事將領收編之外⁵，部分清遺民自發性地響應更是促使日本能在九一八事件後掌握東北的關鍵所在。這些清遺民之所以願意支持日本，除了寄望政治地位的獲取之外，對共產主義的憂

⁴ 陳獨秀，〈本誌罪案之答辯書〉，《新青年》第6卷，第1號（上海，1919），頁10。

⁵ 黃自進，〈九一八事變時期的日中政治動員與軍事作戰〉，《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6期（台北，2006.11），頁203-205。

慮是否也是促使他們與日本協力，建立滿洲國的原因之一，實有深入探討的必要。

關於本文在題目將「反共」一詞用引號加以表示，其用意在於雖然使用反共一詞用來表示反對共產主義或共產政權的概念，在現代已是普遍的概念，不過在本文所研究的時段，對於反共的概念還在形塑的階段，史料中有「過激派」、「俄化」、「赤化」、「共匪」、「共產化」、「防共」……等用語，儘管這些用語皆表現出對共產革命的敵視，各個用語背後所代表的意義，形塑這些用語的概念相當複雜。另一方面，復辟派在使用這些用語來表達自身的反共意識時，其背後的目的也不一定為了反共，更可能是為了獲得關東軍的支持，才強調自身的反共意識。基於上述反思，本研究的標題才特別在反共一詞加上引號以表示它可能具有的曖昧性和其在文獻上使用的「歷史性」；但是在正文的部分為行文方便起見，在論述上皆採用反共來說明這些用語，而在史料引用方面則以原文呈現。

本文除了在探討反共意識的論述方面用「反共」一詞作概括性的論述之外，在論述復辟派與日本關東軍之間的合作關係方面，將以「協力 (Collaboration)」一詞加以說明。儘管雙方在合作的過程中，採用日滿合作、日滿親善或日滿一心一德等論述，來強調雙方乃是基於自願與平等而建立的合作關係，雖然如實呈現復辟派與日本關東軍用以論述雙方關係的用語，但雙方之間的關係與其說是平等的合作關係，用協力來說明雙方的關係會更符合滿洲國的情況。關於協立在歷史研究的運用，Gerhard Hirschfeld 認為法國總理貝當 (Philippe Pétain, 1856 年—1951 年) 在 1940 年 10 月在廣播中用協力來描述在法國與納粹德國在停戰後狀況時，協力原先模糊、複雜的意義被限縮定義為試圖保持獨立性的戰敗國與占領外國領土的戰勝國之間的政治安排，並且受到道德譴責⁶。

⁶ Hirschfeld, Gerhard, "Collaboration in Nazi-Occupied France: Some Introductory Remarks," in Hirschfeld, Gerhard and Marsh, Patrick eds. *Collaboration in France: Politics and Culture during the Nazi Occupation 1940-1944* (Oxford: Berg Publishers, 1989), p.1-2.; 貝當廣播原文為 "Une collaboration a été envisagée entre nos deux pays. J'en ai accepté le principe."

然而 Henrik Dethlefsen 反對在歷史研究方面忽略協力本身所帶有的廣泛涵義，若將協力直接用於描述戰敗國與占領者之間的關係，會將所有在佔領區生活的人一併視為支持占領政權的協力者，Henrik Dethlefsen 從德國佔領丹麥研究中發現，在占領區生活並不代表占領區的丹麥人支持納粹統治，Henrik Dethlefsen 認為必須將協力限縮在政治範疇，意味著協力者必須在占領政權出現的情況下運用權力，才能稱之為協力⁷。而 Timothy Brook 也呼應 Henrik Dethlefsen 在研究中對運用協力的考量，在二戰中國日佔區的研究中，將研究對象限定在試圖從日本占領者的協力中運用權力的中國人⁸。袁漸達則進一步將協力的概念運用在滿洲國⁹。

台灣學界目前已逐漸改變過去用「漢奸」一詞，而是用「協力」的用語與概念來研究二次大戰期間的東亞史¹⁰。在本研究中所論述的復辟派與日本關東軍的關係，也是在日本關東軍於九一八事變軍事佔領中國東北後，關東軍與復辟派基於統治滿洲國的需要所產生的關係，當然，雙方不僅只是戰時佔領者與被佔領者的關係，復辟派在 1931—1937 年的滿洲國情況可能更為複雜。因為復辟派的角色並不單純只是關東軍在軍事占領區的合作對象，以溥儀為首的復辟派事實上是主動與日本尋求合作才加入滿洲國。因此本文採用協力來說明關東軍與復辟派之間的關係，不僅期望能藉此說明復辟派在協力關係的主動性，也企圖周延地呈現兩者之間日主滿從的權力結構。儘管在史料方面，無論是在復辟派的相關史料，或是滿洲國相關史料，皆極力避免在論述中，呈現日主滿從的情況。但不可否認的是，關東軍與復辟派之間

⁷ Dethlefsen, Henrik, "Denmark and the German occupation: Cooperation, negotiation or collaboration?,"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istory*, 15: Issue 1-2 (1990): 198-199.

⁸ Brook, Timothy, *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2.

⁹ Jianda, Yuan, *Chinese Government Leaders in Manchukuo, 1931-1937* (Abingdon: Routledge, 2023), p.14-15.

¹⁰ 曾士榮，〈學界關於二次大戰期間東亞的「戰爭協力（wartime collaboration）」的研究回顧與反思〉，《臺灣學研究》，第23期（台北，2019.02），頁35-39。

的權力關係並不對等，因此本研究所使用的合作、親善或一心一德等形容復辟派與日本關東軍之間關係的用語，背後都隱含著協力的概念。

有鑑於此，本研究會先分析滿洲國成立前，清遺民的思想背景，探討清遺民的反共意識與對民國的敵意如何導致部分清遺民加入滿洲國。但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並無意探討所有在滿洲國生活的清遺民的反共意識，而是針對清遺民中對運用政治權力作出積極行動的鄭孝胥、羅振玉等復辟派，相對的本研究更多的囊括了身為皇帝的溥儀本身的思想與政治作為，企圖探討他們的反共意識與在滿洲國的政治作為之間的關聯。

在史料的選擇上，相較於過去對鄭孝胥的相關研究多採用《鄭孝胥日記》，本研究則在分析《鄭孝胥日記》之餘，加入對《王道週刊》的研究。在 1934 年 4 月 2 日到 1937 年 7 月 31 日連載於《滿洲報》的《王道週刊》是鄭孝胥擔任滿洲國國務總理兼文教部總長期間，由文教部主導的王道主義宣傳刊物。不僅期望能反映出鄭孝胥反共意識的變化，還能具體呈現滿洲國王道主義宣傳中的反共意識，並且從《王道週刊》的興衰，探討鄭孝胥在宣傳王道主義過程中的權力變化。

過去的研究多直接引述《我的前半生》的內容，然而溥儀在滿洲國瓦解後所回憶的內容，不一定能完整呈現復辟派與日本關東軍的互動。為此，本研究將從《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著手進行研究。《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為林出賢次郎自 1932 年 11 月至 1938 年 2 月擔任日本駐滿洲國大使館書記官、宮內府行走的工作紀錄，其中《嚴密會見錄》為歷任關東軍司令官與溥儀的秘密會談翻譯紀錄，藉由研究會談內容，不僅可以觀察溥儀與日本在協力過程中的思想變化，也能夠呈現溥儀的權力對塑造滿洲國建國精神的影響。

前人對於滿洲國、清遺民、復辟和協力的研究已經有相當成果，本研究則期望藉由運用新史料來讓這些課題更加完善。本研究從塑造反共意識的角度出發，試圖探究復辟派的反共意識在滿洲國如何演變，對於滿日合作又帶來哪些影響。

二、研究回顧

關於滿洲國復辟派研究的問題，在較晚近的滿洲國歷史相關著作中開始有較細膩的討論，主要可分為兩個層次，從復辟派個人為中心的研究，以及在滿洲國史的框架下，研究復辟派群體與日本的協力關係。

關於復辟派個人為中心的研究方面，胡平生的《民國初期的復辟派》是首見較為全面探討此議題的著作，其關注焦點在復辟運動的參與者。胡平生不只注意到復辟派，還關注到日本人的活動。然而胡平生的研究大多以單一人物為焦點，諸如康有為、鄭孝胥、川島浪速和石原莞爾等知名人物，分別藉由日記、筆記、報刊等豐富的史料，敘述復辟運動參與者的生平與思想，但是對於復辟派在滿洲國的發展則較少關注¹¹。

林志宏的《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則聚焦在清遺民群體的認同問題。關注的焦點集中在「政治認同」上，而非「文化認同」問題。觀察清遺民在「現代中國」建構過程中的心態轉折。但由於過度注重清遺民現的思想分析，容易忽略現實環境對清遺民的影響。尤其民初是政局變動劇烈的時代，日本、北洋、國民黨、共產黨、蒙古、滿洲的政治變化都會改變清遺民的政治作為¹²。

周明之則透過日記、書信等清遺民的私人史料來建構清遺民的思想，更全面的探討清遺民對於「忠」的概念，研究清遺民如何在面臨現代化危機的過程中，塑造內心中的傳統理想世界，並對於參與滿洲國的復辟派做出道德批判，不過對於復辟派實際如何與關東軍互動，較少相關論述¹³。

鄒金喜則以《鄭孝胥日記》的論述為中心，探討鄭孝胥從清末到滿洲國一生對日本的認同變化，描述鄭孝胥在中國經歷政治、社會各

¹¹ 胡平生，《民國初期的復辟派》（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

¹²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台北：聯經出版事業，2009）。

¹³ 周明之，《近代中國的文化危機：清遺老的精神世界》（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9），頁249。

方面劇烈轉變之後，為了實現清朝中興的理想，一改清末時對日本明治維新的輕視，轉而在辛亥革命後積極與日本尋求合作機會，並將滿洲國視為與日本合作實現儒家傳統與帝制的舞台。在鄭孝胥以外的論述則較少提及，且關於鄭孝胥的王道在滿洲國被放棄的問題，僅強調日本的影響，忽略溥儀的角色在滿洲國的作用¹⁴

關於滿洲國復辟派與日本協力的相關研究，山室信一認為滿洲國是由關東軍的、日本天皇和中國皇帝三個元素所組成的國家，政治權力掌握在關東軍，以溥儀為首的清遺民之所以能夠成為關東軍在滿洲國的協力對象，主要的原因在於溥儀仍具有身為前清遜帝的政治聲望，並且對民國的敵視讓他不可能與國民黨、張學良合作，最重要的是溥儀並無東北地方政治實力，勢必仰賴日本關東軍支持。在復辟派的研究視角的部分，山室信一的研究較少使用復辟派的私人史料，因此較缺乏從復辟派自身的觀點來論述復辟派在協力機制的角色¹⁵。

Rana Mitter 的研究則企圖透過分析滿洲國的協力來破除滿洲國抗日神話的論述，Rana Mitter 主張滿洲國民眾大多沒有參與抗日，滿洲國抗日是由宣傳所塑造的神話，並且認同滿洲國清遺民擔任日本理想協力者的關鍵是由於清遺民本身並無政治實力的觀點，由出身外地的鄭孝胥擔任國務總理能夠維持東北地方政治派系的平衡。由於 Rana Mitter 的研究主題關注在滿洲國建國初期的發展，研究時段也止於 1933 年，因此無論是對於復辟派在滿洲國的發展情況，抑或是滿洲國在帝制實行後的變化，都還有深入研究的空間¹⁶。

Prasenjit Duara 的研究則透過「東亞現代化」的概念來論述滿洲國，「東亞現代化」是指歐戰結束後，在反思西方文明的思潮下，中國和日本的知識份子對東方文明的肯定，而滿洲國追求其文化的本真價值，企求證明其主權之獨立，即是「東亞現代化」的例證，而關於復辟派的

¹⁴ 鄒金喜，〈從「此邦俗亦偷」到「今日日光輝萬國」：鄭孝胥日本觀的轉變歷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¹⁵ 山室信一，《キメラ——満洲国の肖像（増補版）》（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4）。

¹⁶ Mitter, Rana, *The Manchurian Myth: Nationalism,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論述，Prasenjit Duara 的論述較少，但對復辟派所參與的滿洲國協和會，則認為將其視為滿洲國建立傳統的合作體系，藉此達成國家建設目標，以求讓滿洲國存續的組織¹⁷。此外，Prasenjit Duara 對於滿洲國的分析乃是為了證明自己對「東亞現代化」的理論，因此在史料選擇上，多採用以日方的角度論述的史料，且復辟派相觀的論述較為缺乏，仍有進一步研究的空間。

黃昱翰的《重把乾綱握？——滿洲國帝制之成立與時人認識》則透過滿洲國的報刊資料，觀察滿洲國清遺民如何建構滿洲國意識形態，而下層民眾又是如何看待強加在自身的意識形態。滿洲國官方雖然始終否定滿洲國帝制與清朝復辟之間的關聯性，但也將溥儀前清遜帝的政治遺產當作其正當性的來源。溥儀自己也在 1935 年企圖透過赴日訪問，藉機確立其政治權威，然而，當地多數居民難以萌發對於新國家的認同，隨著關東軍逐漸強化對滿支配以及全面戰爭的爆發，滿洲國最終徹底淪為日本的附庸¹⁸。黃昱翰對溥儀的論述，仍然延續前人對《我的前半生》的研究，《我的前半生》的記載可能無法如實呈現溥儀與關東軍的互動，本文將藉由近年發掘的《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補足相關研究。

王柯則企圖從日本對復辟運動的參與，來觀察日本如何促使中國成為民族國家的問題。王柯使用日本外務省、陸軍省檔案等大量日文原始資料，用以探討日本「單一民族國家」如何影響日本對復辟運動的政策和理解。同時復辟派也向日本求師改革經驗，甚至直接尋求政治介入復辟運動。藉由分析中日兩國的交流，可以發現日本對近代中國的建構有巨大的影響力¹⁹。在史料選擇上，王柯多採用日本方面的資料，以至於從復辟派視角所進行的論述較為缺乏。

袁漸達則從與日本軍隊合作並領導其政府機構的中國人的角度來

¹⁷ Duara, Prasenjit,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Inc., 2003.)

¹⁸ 黃昱翰，〈重把乾綱握？——滿洲國帝制之成立與時人認識〉（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¹⁹ 王柯，〈亦師亦友亦敵——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

研究滿洲國的政治。過去的研究和輿論多認為這些中國人物是叛徒，袁漸達則強調必須分析這些協力者的民族觀念作為才能理解滿洲國複雜的運作機制，因為滿洲國是由許多佔領者與協力者共同影響之下的產物。為此，袁漸達針對許多中、英、日三方史料進行比對分析，其中關於〈嚴秘會見錄〉的研究成果，對於研究復辟派具體如何與關東軍進行協力有著相當巨大的貢獻²⁰。至於在反共意識的方面，袁漸達的研究則較少論述，本文將在這方面進行補充。

總而言之，過去對於復辟派的中、日、英相關研究在近年來雖已相當豐碩，但由於老成凋零，復辟派參與滿洲國的成員已經不多，復辟派在東北也較少地方政治實力，以至於相關研究仍顯缺乏。然而若無復辟派在滿洲國建立初期的協力，日本關東軍也難以在滿洲國立足。此外，滿洲國復辟派的思想觀念與對滿洲國的定位也會隨著現實局勢改變而產生變化，復辟派對於反共的思想論述也不例外。本研究試圖利用滿洲國清遺民個人史料、滿洲國文教部發行之宣傳刊物，以及目前已數位化的中日文滿洲國發行報刊資料庫等一手史料，探討滿洲國復辟派在反共方面的思想變化，分析滿洲國復辟派的宣傳策略及滿洲國實際上如何執行反共相關政策。

三、研究方法與資料說明

本研究將把時段界定在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到 1937 年七七事變發生之間。這段期間可以觀察到復辟派反共意識的變化，除了觀察復辟派如何在滿洲國進行宣傳，將理念從擴展到各方群體，藉此塑造滿洲國的正當性之外，1935 年到 1937 年正是清遺民群體淡出滿洲國政治舞台，溥儀積極加深與關東軍協力的時期，因此 1931 年到 1937 年的研究時段不僅能分析復辟派反共意識的變化，還能夠探討溥儀如何運用反共的議題，進一步與關東軍深化協力關係。

研究對象則囊括滿洲國內曾參與復辟運動的參與者。透過比較復

²⁰ Jianda, Yuan, *Chinese Government Leaders in Manchukuo, 1931-1937*.

辟派內部的立場與政治作為來分析復辟派的反共意識變遷，並藉此觀察滿洲國的宣傳形式與滿洲國民眾對宣傳的回應。本研究使用的史料包含滿洲國政府檔案、報刊、日記與回憶錄等，以歷史學之史料分析為主要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大量使用已數位化的滿洲國報刊《盛京時報》、《滿洲報》和《大同報》，重新建構滿洲國清遺民的反共宣傳策略，也藉由分析報刊內容的論述變化，研究滿洲國清遺民的思想變化。特別是受滿洲國文教部資助的《滿洲報》中，關於王道主義宣傳的相關內容，《滿洲報》由日本人西片朝三於 1922 年 7 月 24 日在大連創刊，於 1937 年 7 月 31 日停刊。《滿洲報》作為中國東北地區早期發行的中文報刊之一，發行量迅速增加，並在 1933 年一度超越《盛京時報》，成為東北地區發行量最多的報紙。《滿洲報》的特色在於其副刊體系相當豐富，涵蓋政治、兒童、婦女、體育、電影、藝術等領域，能夠滿足不同讀者群體的閱讀需求。²¹其中自 1934 年 4 月 2 日開始連載的《王道週刊》，是清遺民鄭孝胥宣傳「王道主義」的重要場域，內容多宣揚傳統禮教的重要性，並邀請羅振玉等清遺民為專欄題辭，是研究滿洲國清遺民思想的珍貴史料。復次，《大同報》則是由奉天人王光烈（1880 年—1953 年）成立於 1932 年 2 月，背後為滿洲國補助成立的機關報²²，是滿洲國政治地位最高的報紙。甚至於 1943 年 7 月 1 日，改名為《康德新聞》，合併了《盛京時報》，一直持續到 1945 年 8 月 16 日與滿洲國同始同終。與《盛京時報》不同，《大同報》作為滿洲國政府的機關報，壟斷經營特權，且《大同報》地處新京—滿洲國的政治中心，影響範圍覆蓋了整個東北地區。透過研究《大同報》的相關論述能夠了解滿洲國官方宣傳的重點。而《盛京時報》由日本人中島真雄於 1906 年 10 月 18 日在奉天創刊，於 1944 年 9 月併入《康德新聞》，是日本人在中國東北發行時間最長的中文報紙。《盛京時報》背後有日本軍政勢力的支持，

²¹ 陳曦，〈政治文化視角下的《滿洲報》副刊研究（1931-1937）〉（長春：吉林大學文學院暨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論文，2019）。

²² 蔣蕾，〈精神抵抗：東北淪陷區報紙文學副刊的政治身份與文化身份——以《大同報》為樣本的歷史考察〉（長春：吉林大學文學院暨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論文，2008）。

在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前，就以能夠無所顧忌地批評張作霖政權受到東北民眾的歡迎²³。滿洲國成立後，成為滿洲國宣傳其建國理念、王道思想的輿論重地。自1936年開始報社透過舉辦體育賽事、歌唱表演、旅遊報導等各項活動²⁴。《盛京時報》的報導反映滿洲國如何建構王道主義，同時也是研究滿洲國清遺民宣傳成果的重要史料。

在私領域文獻方面，本研究會透過滿洲國清遺民的核心人物如溥儀、鄭孝胥、羅振玉、胡嗣瑗的日記、自傳與回憶錄，分析其反共思想的變化，尤其是任職滿洲國文教部的鄭孝胥，其日記的論述能夠與滿洲國報刊中的宣傳內容相呼應，惟《鄭孝胥日記》對於復辟清朝具有強烈的樂觀主義，以至於論述上往往會誇大滿洲國清遺民的角色，在使用上須注意《鄭孝胥日記》的主觀立場。而《羅振玉學術論著集》是羅振玉之孫羅繼祖所蒐集、整理關於羅振玉在金石學、歷史學等學術相關著作，但其中也有羅振玉參與復辟活動的相關文獻。《羅振玉學術論著集》所收錄的〈集蓼編〉為羅振玉晚年在滿洲國所著的回憶錄，內文表達出自己忠於清朝的政治認同，並詳述參與復辟活動的過程。除《羅振玉學術論著集》之外，《王國維全集》也蒐羅羅振玉與王國維的書信，書信中不僅呈現出王國維、羅振玉等清遺民的互動，亦可從中研究清遺民反共思想的形成與傳佈。

在公領域文獻方面，本研究仰賴已出版之史料彙編，胡平生的《復辟運動史料》基本上匯集1980年代以前台灣有關清遺民的第一手、二手史料。包含中、日兩國的報刊、日記、書信、外交檔案等各種資料。惟個人私密性的史料較少使用，資料來源也相當零散。近年來中國東北地區的圖書館、檔案館陸續將館內所藏之滿洲國官方檔案整理出版，其中遼寧省檔案館出版之《溥儀私藏偽滿秘檔》，蒐羅滿洲國清遺民之間的往來書信，有助於了解滿洲國清遺民的活動；吉林省圖書館編纂之《偽滿洲國史料》中蒐羅大量滿洲國文教部所發行之刊物，有助於研究滿洲國文教部的內部運作與宣傳網絡；吉林省檔案館出版之《日

²³ 吳素惠，〈盛京時報之研究〉（台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²⁴ 楊悅，〈偽滿時期《盛京時報》「主辦事業」研究（1931—1944）〉（長春：吉林大學文學院暨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論文，2018）。

本關東憲兵隊報告集》中，收錄之《思想對策月報》有助於本研究分析滿洲國如何執行反共政策，並探討日本關東軍與滿洲國清遺民間對反共政策的差異。日本方面，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委託雄松堂所出版的《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為林出賢次郎（1882年—1970年）任職外務省期間私自收藏的公文，其中〈嚴密會見錄〉記載大量溥儀與關東軍司令官、日本軍政要員、宮內府官員的會談內容，林出賢次郎曾在滿洲國擔任溥儀的日語翻譯，深得溥儀信任而得以在滿洲國宮內府自由出入，其保存的資料能夠研究溥儀在滿洲國的政治活動，以及政治思想的變化。

四、章節架構說明

本研究在緒論與結論之外，擬將論文分為四個章節進行討論：第一章〈清遺民反共意識的形成〉、第二章〈反共與滿洲國王道主義〉、第三章〈王霸合作與日滿一體的轉化〉、第四章〈日滿親善與合作防共〉。

第一章〈清遺民反共意識的形成〉將探討清遺民反共意識的形成概況，呈現他們所面臨的共產革命衝擊，與在此情況之下，他們的思想變化，進而影響到他們在九一八事變中，選擇與日本進行協力的過程。第一章總共分為三節。第一節「共產主義與對清遺民的衝擊」將探討共產革命的影響如何對清遺民群體產生衝擊，藉由王國維、羅振玉和鄭孝胥對共產革命的回應，來分析清遺民對共產革命產生的危機感，進而形塑成反共意識的過程。第二節「清遺民在九一八事變中的抉擇」將運用溥儀與清遺民的私人書信與日記，探討清遺民在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如何形成透過與日本協力，達成復辟的抉擇。在形成政治抉擇的過程中，各方意見又有哪些衝突，而反共意識對政治抉擇的形成產生哪些影響，復辟派對權力的追求又如何體現。第三節「滿洲國清遺民對「日滿合作入關」的歧見」則將藉由清遺民對「日滿合作入關」的討論來分析復辟清朝的理想，在滿洲國成立後所面臨的挑戰，「日滿合作入關」的挑戰不僅源自於清遺民群體內部對合作日本的歧見，日本對「日滿合作入關」的反對也是「日滿合作入關」難以實行的原因。

第二章〈反共與滿洲國王道主義〉將鋪陳鄭孝胥將王道主義作為滿洲國建國精神後，如何在滿洲國進行王道主義的宣傳工作，並從滿洲國文教部的王道主義宣傳刊物《王道週刊》中，分析反共意識在王道主義宣傳中的作用，進而探討鄭孝胥的思想變化對王道主義宣傳的影響。第二章總共分為四節。第一節「鄭孝胥與滿洲國文教部」將呈現滿洲國文教部的組織架構與人事安排，進而分析文教部如何進行王道主義宣傳工作，進而探討鄭孝胥在文教部的宣傳工作中，如何在日主滿從的權力結構之下，宣傳自己理想中的王道主義。第二節「鄭孝胥與《王道週刊》的發行」將《王道週刊》作為媒體宣傳的案例進行分析，透過《王道週刊》發行的過程，探討文教部如何宣傳鄭孝胥的王道主義，並藉此呈現鄭孝胥在王道主義宣傳的權力運作。第三節「《王道週刊》中的反共宣傳」將分析《王道週刊》中的文本，研究鄭孝胥的反共意識，而鄭孝胥反共意識的變化又如何影響王道主義的宣傳。第四節「王道與法西斯之間」將透過《王道週刊》對法西斯主義的論述，比較鄭孝胥的反共意識與同樣持反共立場的義大利法西斯，藉由凸顯鄭孝胥對法西斯主義曖昧不清的態度，分析鄭孝胥對法西斯主義從認同到反感的變化過程，進而探討鄭孝胥對軍事化的反感如何影響王道主義的形塑。

第三章〈王霸合作與日滿一體的轉化〉將透過《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的資料，以溥儀在滿日協力中的角度為中心，討論滿洲國清遺民勢力的衰退，並呈現滿洲國建國精神從王道主義轉向日滿一體的過程。第三章總共分為三節。第一節「滿洲國清遺民與王霸合作」將呈現清遺民避免軍事化的王道主義的理想，與日本軍事擴張的衝突，而鄭孝胥的「王霸合作」論述在合理化日本軍事化的過程中需要面臨哪些困境。第二節「鄭孝胥去職與清遺民勢力的衰落」將藉由分析《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中，記載溥儀與關東軍司令官的會談紀錄的《嚴密會見錄》，探討溥儀在鄭孝胥去職，乃至於清遺民勢力在滿洲國政壇中衰退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進而分析清遺民勢力衰退如何影響滿洲國重新塑造其建國精神，並揭露溥儀與關東軍在重塑滿洲國建國精神過程中的權力運作。第三節「日滿一體與提升滿洲國皇權」將論述滿洲國建國精神從王道主義，轉化為日滿一體的過程。進而探討溥儀在滿洲國引入天皇制的背後，不僅僅只是為了附和關東軍日滿親善的需求，同時也是溥儀追求提升皇帝權威的嘗試。

第四章〈日滿親善與合作防共〉將以 1935 年鄭孝胥去職為分水嶺，討論日滿合作從鄭孝胥理想中的道德合作，轉向日滿軍事合作防共的發展過程，在日滿軍事合作防共的過程中，除了關東軍維持滿洲國治安需求，加強對滿洲國的統治之外，溥儀也積極推動日滿軍事合作，提升自己在滿洲國軍隊的影響力。第四章總共分為三節進行討論。第一節「溥儀與日滿軍事合作」將以《嚴密會見錄》的內容為核心，討論溥儀在日滿軍事合作中的角色，探討溥儀在《日滿議定書》已經將滿洲國國防委由日本負責的情況下，如何說服關東軍加強日滿軍事合作，進而提升滿洲國軍隊的實力與溥儀在滿洲國軍隊的影響力。第二節「日滿合作與討滅共匪」先介紹溥儀與關東軍將防止共產主義作為滿洲國建國，乃至於關東軍進行擴張行動之正當性的情況，再呈現關東軍對滿洲國共產勢力增加的擔憂與防範蘇聯滲透的國防需求，進而將防共作為日滿軍事合作的首要任務。第三節「海拉爾事件與思想對策工作」將以海拉爾事件為例，說明關東軍憲兵隊進行防共工作的「思想對策工作」的運作情況，並比較《我的前半生》與《嚴密會見錄》中，溥儀對海拉爾事件的論述差異，試圖探討溥儀對日滿軍事防共的認同變化，進而呈現溥儀在將滿洲國建國精神轉化為日滿一體的過程中，也促使滿洲國逐漸軍事化的情況。

第一章、清遺民反共意識的形成

清遺民因所效忠的君主政體及其傳統的價值觀，從中國現代化的角度來看，顯得過時迂腐，因而在中國現代史中，著重在關注參與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的進步思想，而忽視復辟派的政治文化。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基礎中來自海外的新思想，新思想不僅讓運動本身對中國造成的社會文化劇變，也決定了中國近現代史敘述的基本調性。另一方面，新文化運動中所帶來的衝擊除了表現在現代化思想的層面，新文化運動中的共產主義思想也對中國社會帶來分歧，尤其加劇復辟派對民國的敵視。

第一節 共產主義與對清遺民的衝擊

受到俄國革命影響，李大釗（1889 年—1927 年）在俄國共產革命成功之後，隨即在 1918 年 11 月於《新青年》發表〈庶民的勝利〉一文，文中不僅推崇共產主義，並期望能在世界推行：

民主主義、勞工主義既然占了勝利，今後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我們應該準備怎麼能適應這個潮流，不可抵抗這個潮流。人類的歷史，是共同心理表現的紀錄。一個人心的變動，是全世界人心變動的徵幾。一個事件的發生，是世界風雲發生的先兆。一七八九年的法國革命，是十九世紀中各國革命的先聲。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是廿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聲。¹

《新青年》中的左傾文刊深深影響同時代的青年知識份子。勞工主義的思想亦成為對清遺民政治文化批判的利器。例如顧頡剛（1893 年—1980 年）雖然推崇王國維（1877 年—1927 年）在國學研究的貢獻，

¹ 李大釗，〈庶民的勝利〉，《新青年》第5卷，第5號（上海，1918），頁1。

不過對於王國維的政治認同則援引左傾思想加以批判：

他少年到日本早已剪髮，後來反而留起辮子，到現在寧可以身殉辮，這就是他不肯自居於民眾，故意立異，裝腔作勢，以鳴其高傲，以維持其士大夫階級的尊嚴的確據。這種思想是我們絕對不能表同情的。所以我們在哀悼他的學問之外，同時要唾棄他的架子和唾棄溥儀給他的諡法「忠愍」一樣。²

這樣的政治情勢，不僅讓知識份子接受並提倡共產主義，從陳獨秀、李大釗等人成立中國共產黨，孫文的國民黨亦採行聯俄容共政策，到民間此起彼落的罷工事件，共產革命的訴求迅速影響中國政壇。部分清遺民對革命浪潮再起感到憂懼，顧頡剛亦認為對革命的恐懼是造成王國維自沉頤和園的原因之一³。另一部分清遺民對於共產主義的恐懼，則選擇反抗，甚至不惜與日本協力，藉由參加滿洲國來達成其反共復國的政治理想。

從羅振玉（1866年—1940年）紀錄於《集蓼編》的內容可以看出，在俄國共產革命發生之後，便向日本好友犬養毅（1855年—1932年）表達對共產主義對中國衝擊的憂慮。儘管當時羅振玉與犬養毅對於共產主義能否在中國流行尚未有共識。羅振玉認為：「今歐戰告終，赤化遽興，此平日不謀均安之效也。此禍或且延及東方，願貴邦（日本）柄政諸公，幸早留意。」，犬養毅則以為：「此雖當慮，但東方素無此等思想，似不致波及。」，羅振玉則以井田制比擬共產制，認為共產思想在中國早已試行而不能，故久廢矣⁴。

羅振玉反共的思想來源，與王國維對歐戰局勢的觀察密不可分，在王國維寄給羅振玉的書信中，在羅振玉為王國維所寫的《王忠愍遺書序》中，記載著羅振玉等清遺民對歐戰局勢的看法：

² 顧頡剛，〈悼王靜安先生〉，《中國文化》，1995年11期（北京，1995.07），頁286。

³ 顧頡剛，〈悼王靜安先生〉，頁283。

⁴ 羅振玉，〈集蓼編〉，收入於羅繼祖編，《羅振玉學術論著集》，第11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65。

此戰將為國家主義及社會主義激爭之結果，戰後恐無戰勝國，或暴民專制將覆國家主義而代之，或且波及中國…已而俄國果覆亡，公以禍將及我，與北方某耆宿（柯劭忞，1850年—1933年）書言，觀中國近狀，恐以共和始，而以共產終。⁵

根據羅振玉的說法，王國維早在歐戰結束前，就已預見共產主義的危害可能波及到中國，在王國維死後，羅振玉根據王國維《論政學疏》修改出版的《王忠愍公別傳》中也有對共產主義的危機：

井田之法，口分之制，皆屢試而不能行，或行而不能久。西人則以是為不足，於是有社會主義焉，有共產主義焉…俄人行之，伏尸千萬，赤地萬里，而卒不能不承認私產之制度⁶

羅振玉認為王國維對共產主義的危機感，不僅源自於蘇聯在共產革命的過程中所造成的流血衝突，也融合對井田制的研究觀點。在歐戰結束後，王國維亦在與羅振玉的通信中，提及曾請柯劭忞遊說北京政府在巴黎和會提案組成剿滅俄過激黨之國際同盟。對王國維而言：

俄過激黨之禍，德匈及葡瑞諸國均受其影響…如此則歐洲之文化富強不難於數年中滅絕。東方諸國受其禍亦未必後於西洋。⁷

1919年，法國總理克里蒙梭（Georges Clemenceau，1841年—1929年）遭暗殺未遂，更加深了王國維對俄過激黨擴散的憂慮：

⁵ 羅振玉，〈王忠愍公遺書序〉，收入於袁英光、劉寅生編，《王國維年譜長編（1877-1927）》，（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頁536-537。

⁶ 羅振玉，〈王忠愍公別傳〉，收入於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卷20（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頁235。

⁷ 王國維，〈王國維致羅振玉〉（1919年1月19日），收入於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卷15，頁476。

觀法總理被刺，則前致敬仲（柯劭忞）書之所慮將不幸而中，彼昏不知，即令知之防之，亦正無益，世無神禹，豈能抑洪水之禍耶…時局如此，乃西人數百年講求富強之結果，恐我輩之言將驗。若世界人民將來尚有子遺，則非採用東方之道德及政治不可也。⁸

在王國維看來，俄國革命的影響有逐漸擴大的趨勢，可是柯劭忞卻沒有意識到俄國革命的危害，激進的思想也沒有得到抑制。王國維悲觀的預言俄國革命帶來的洪水之禍將擴散到全世界，並將其歸咎於西方追求富強的結果。

根據羅繼祖的回憶，王國維對共產學說確實有強烈的反感，羅振玉對《論政學疏》的修改並不代表《論政學疏》的內容是羅振玉所捏造，王國維對共產學說的反感是受到傳統教育影響的結果。⁹周帥則認為羅振玉在王國維死後有偽造王國維遺折之事，王國維與羅振玉的關係在王國維自沉前亦逐漸疏遠，但是王國維和羅振玉在赤化危機的觀點仍有暗合之處，而王國維的對共產學說的反感也與王國維對沙俄到蘇聯的時事觀察密不可分¹⁰。而林志宏則認為羅振玉與俄國白軍將領謝米諾夫（Grigory Semyonov, 1890 年—1946 年）的聯繫也與兩人恢復帝制與防共的共同理念有關，而羅振玉基於防共的因素，尋求孔孟學說對抗共產主義的想法，在日後逐漸擴散，為滿洲國清遺民支持日滿合作埋下伏筆¹¹。

王國維儘管與羅振玉一樣表現出對俄國革命的反感，將布爾什維克黨（Bolsheviks）稱之為「俄過激黨」意味著對王國維來說，俄國革

⁸ 王國維，〈王國維致羅振玉〉（1919年3月17日），收入於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卷15，頁476。

⁹ 羅繼祖，〈王國維先生的政治思想〉，收入於吳澤主編，《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第一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頁407-408。

¹⁰ 周帥，〈1898-1927：王國維對蘇俄的認識〉，《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7卷，第6期（徐州，2011），頁68-69。

¹¹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頁311-313。

命中激進暴力的手段，正是王國維對俄國革命產生反感的原因。王國維的預言認為此種激進暴力的擴散事實上並無法抑制，王國維的預言將處理俄過激黨影響的重點放置在重建，採用東方道德與政治不在直接抑制激進暴力，而是在激進暴力的影響過後，採用東方道德與政治來重建世界。但羅振玉卻主張採取更加積極的作為，進而形成羅振玉主張恢復帝政乃是力挽共產之邪說、暴民專制之害的想法¹²，並在九一八事變中積極投入滿洲國建國的政治活動。

另一方面，儘管當時羅振玉與犬養毅對於共產主義的憂慮還未有共識。但犬養毅在中國國民黨採行聯俄容共政策後，其態度也逐漸轉向防共的意識：

南京當局利用九一八事變而有寧粵之議，此為無可厚非之事，也是事前可預料之舉。但是，南京當局竟而興起與共匪謀和，與蘇聯企圖聯合等等舉動，卻令人擔憂。南京當局此舉不僅將使中國陷入被赤化之危機，也將導致整個東亞震盪不安。南京當局的對策令人震驚。蔣介石當年在黃埔軍校時期就曾赤化，汪兆銘、胡漢民也都有赤化經歷，馮玉祥與共產黨關係匪淺，此時此刻的中國會有何種變化呢？從整個東亞大陸的發展來看，實令人隱憂不堪。處於此種變局之下，日本的主政當局似乎不曾察覺其危險性，更遑論挽救，日本之不幸，莫過於此。¹³

儘管雙方對於共產主義的擔憂則是顯而易見的。但相較於犬養毅對九一八事變的消極態度，羅振玉反而成為九一八事變後，清遺民積極參與滿洲國的代表人物，促使兩者日後處理九一八事變態度差異的問題上，除了需要考量到共產主義學說對清遺民的影響，還需要考量到在共產主義學說逐漸影響中國的同時，民國與清遺民的衝突也逐漸變得更加劇烈。

¹² 羅振玉，〈集蓼編〉，收入於羅繼祖編，《羅振玉學術論著集》，第11集，頁79。

¹³ 犬養毅，〈副島義一宛犬養毅書翰〉，收入於鷲尾義直編，《犬養木堂書簡集》（東京：人文堂，1940），頁571。

1924年馮玉祥（1882年—1948年）用復辟派曾參與張勳復辟為藉口，發動首都革命，將溥儀驅逐出紫禁城。用武力單方面毀棄清室優待條例承諾的舉動，加上馮玉祥與共產黨之間的密切關係，也讓清遺民深感自己正身陷在赤化危機之中。從王國維與狩野直喜（1868年—1947年）的書信中，可以看出王國維的憂慮：

十月九日之變，維等隨車駕出宮，白刃炸彈，夾車而行…而革命大勢行且入都，馮氏軍隊尚踞禁御，赤化之禍，旦夕不測。¹⁴

王國維的危機感不僅源自於王國維隨溥儀（1906年—1967年）出宮的過程中，所感受到的武力威脅，王國維將馮玉祥的舉動視為赤化之禍，也意味著王國維在從「俄過激黨」到「赤化」的演變中，已經將激進暴力當成是自身現實所面臨的危機，激進暴力已經從俄國革命擴散，從過激的俄國革命演變成擴散世界的赤化危機。馮玉祥驅逐溥儀的舉動不僅讓忠於清室的清遺民感受到威脅，因而遭受清遺民的譴責，馮玉祥動用武力的行為也在民國輿論界引起諸多爭議。

倡導新文化運動的胡適（1891年—1962年），甚至冒維護清室的風險向王正廷（1882年—1961年）表達抗議：

今日下午外間紛紛傳說馮軍包圍清宮，逐去清帝；我初不信，後來打聽，才知道是真事。我是不贊成清室保存帝號的，但清室的優待乃是一種國際的信義、條約的關係。條約可以修正，可以廢止，但堂堂的民國，欺人之弱，乘人之喪，以強暴行之，這真是民國史上一件最不名譽的事。¹⁵

胡適認為馮玉祥的舉動不利於民國政府的信用，但其維護清室的

¹⁴ 王國維，〈王國維致狩野直喜〉（1924年12月1日），收入於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卷15，頁840。

¹⁵ 胡適，〈胡適致王正廷〉（1924年11月5日），收入於潘光哲編，《胡適全集：胡適中文書信集》，卷1（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2018），頁572-573。

舉動也引來周作人（1885 年－1967 年）等人的批評。周作人在給胡適的信中表示：

這次的事從我們秀才似的迂闊的頭腦去判斷，或者可以說是不甚合于『仁義』，不是紳士的行為，但以經過二十年拖辮子的痛苦的生活，受過革命及復辟的恐怖的經驗的個人的眼光來看，我覺得這乃是極自然極正當的事，雖然說不上是歷史的榮譽，但也決不是污點。¹⁶

周作人認為馮玉祥的舉動是對復辟活動的回應，而同時致函胡適的李書華（1890 年－1979 年）和李宗侗（1895 年－1974 年）也批評胡適：

你對於清室問題的意見，我們以為你是根本錯誤了……我們根本上認為中華民國國土以內，絕對不應該有一個皇帝與中華民國同時存在，皇帝的名號不取消，就是中華民國沒有完全成立，所以我們對於清帝廢除名號，遷出皇宮，是根本上絕對贊同的。¹⁷

李氏兩人的主張，溥儀作為帝制殘餘的象徵，從根本上不容於民國的體制，若不斬草除根，只怕春風吹又生，難保不會再有復辟帝制的舉動。而南方的國民黨亦公開讚揚此次馮玉祥的舉動；由於當時孫中山決定採行聯俄容共，故清遺民看待馮玉祥、孫中山的政治立場，認定其已接受赤化¹⁸。鄭孝胥也在溥儀被馮玉祥逐出紫禁城後感受到赤化的危機：

¹⁶ 周作人，〈周作人致胡適〉（1924年11月9日），收入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香港：中華書局，1983），頁 272-273。

¹⁷ 李書華、李宗侗，〈李書華、李宗侗致胡適〉（1924年11月19日），收入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頁278-280。

¹⁸ 〈康聖人因溥儀事大罵馮玉祥〉，湖南《大公報》（長沙），1924年12月6日。

共產黨曰赤黨，俄人持君主宗旨者曰白黨，今馮玉祥及廣東胡漢民接入赤黨矣。¹⁹

民國政府為加強驅逐溥儀的合法性，隨即成立「清室善後委員會」，並清查清室密謀復辟文件，將密謀復辟文件發表²⁰，表示正因為當初憂慮復辟再起，因此才不得不採取武力的手段將溥儀驅逐出宮。不過將溥儀逼出宮禁的軍閥們儘管用意在清理帝制的殘餘，但也迫使溥儀在垂死掙扎中，企圖利用自身殘餘的象徵性的政治資本，也更容易成為國際政局中被利用的對象。尤其在1928年「東陵事件」的發生更激化了清室和國民政府間的矛盾關係。對溥儀來說，這次衝擊比自己被趕出紫禁城還嚴重²¹。胡平生認為國民政府在北伐初成，局勢百廢待興的情況下，不願積極處理東陵事件，國民政府的消極應對，不僅讓清遺民憤慨之餘，更促使清遺民無法再相信民國政府的信用²²。

林志宏的研究認為鄭孝胥在面臨赤化危機逐漸形成「共氏三世」的預言，提出共和、共產、共管皆亡，清朝將能復辟的論述²³，而鄭孝胥預言的成因與鄭孝胥對民國的仇視息息相關。²⁴

在對赤化的憂慮和對民國的敵意雙重因素下，部分清遺民選擇支持復辟清朝，而九一八事件地發生，對這群清遺民而言是不可多得的機會，考慮是否與日本協力建立滿洲國。

第二節 清遺民在九一八事變中的抉擇

基於對赤化的恐懼，以及對國民政府能否抑制赤化的疑慮，於是

¹⁹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1925年6月3日條（北京：中華書局），頁2052。

²⁰ 清室善後委員會，《甲子清室密謀復辟文証》（北京：清室善後委員會，1925）

²¹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北京：群眾出版社，2013），頁173-174。

²² 胡平生，《民國初期的復辟派》，頁456。

²³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1925年11月16日條，頁2072。

²⁴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頁334-335。

透過尋求傳統思想資源與國民政府以外的勢力去「抵禦赤禍」，對於這群清遺民而言，就更加具有政治行動的合理性。九一八事變發生，是滿洲國成立最關鍵的因素，溥儀亦傳諭多位遺民共同商議因應的辦法。參與討論的陳寶琛（1848年－1935年）、朱益藩（1867年－1937年）、鄭孝胥（1860年－1938年）、陳曾壽（1878年－1949年）、胡嗣瑗（1869年－1949年）等人，朱益藩便表示反對意見，陳寶琛、陳曾壽也認為時機尚早，須等局勢不可收拾時，再決定是否出關，就連鄭孝胥也主張靜觀其變，可見清遺民在九一八事變發生的當下，多主張審時度勢，並未認為是復辟的機會²⁵。然而隨著日軍在中國東北進軍順利，加上參與九一八事變的宗室熙洽（1884年－1950年）對復辟活動的保證²⁶，清遺民轉向與日本協力來實行復辟。熙洽早在溥儀於紫禁城大婚時，就透過贈禮表達對溥儀中興清室的期望²⁷，更在九一八事變率先響應日本關東軍，而在熙洽響應關東軍的過程中，羅振玉則扮演著在各方居中牽線的角色。如〈集蓼編〉所記載：

中國廿年來，民生塗炭，皆由改帝政為共和…故欲挽橫流非恢復舊制不可。及予既與熙君（熙洽）定策，乃為擬通告中外電稿，並商之友邦（日本）軍部，亦表示同意。²⁸

羅振玉不僅在熙洽與關東軍之間居中牽線，就連尚在關內的清遺民也因羅振玉頻頻報喜而有所動搖。儘管胡嗣瑗對羅振玉的舉動認為是「欲挾上（溥儀）為孤注者，真是可慮」²⁹。可是鄭孝胥卻一改原先觀望的態度，轉向積極加入滿洲國，鄭孝胥也積極向諸遺老遊說出關響應日本：

²⁵ 胡嗣瑗，《胡嗣瑗日記》，1931年9月21日條（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頁93。

²⁶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頁200-202。

²⁷ 陳熙遠，〈共和國裡的皇室婚禮—宣統大婚與帝制王朝的最後掙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4期（台北，2016.12），頁110。

²⁸ 羅振玉，〈集蓼編〉，收入於羅繼祖編，《羅振玉學術論著集》，第11集，頁78。

²⁹ 胡嗣瑗，《胡嗣瑗日記》，1931年10月3日條，頁93。

若宣統皇帝則已閑居二十年，其權力已失；正以權力已失而益增其提議之資格，以其無種族、國際之意見，且無逞強凌弱之野心故也。吾意共和、共產之後將入共管，而不能成者，賴有此一人耳。此事果成，誠世界人類之福利，種族、國際之惡果皆將消滅於無形之中。視舉世之非戰條約、苦求和平者，其效力可加至千百倍。孔孟仁義之說必將盛行於世。願天下有識者撫心平氣而熟思之。此語已語莊士敦、吳藹宸，惟弢庵（陳寶琛）聞之謂慷他人之慨。弢庵八十四歲矣，固宜為此語，正以他人徒有慷慨而不能自為故耳。³⁰

從這份鄭孝胥的主張來看，鄭孝胥認為儘管日本在東亞有權力能夠結束民國政治亂象，但要達到東亞和平、重建傳統儒家秩序。惟有寄望溥儀復辟才能達成。儘管陳寶琛反對貿然與日本有協力的關係，認為有被日本利用的可能，陳寶琛亦從其他管道得知羅振玉在吉林實際上都被日軍掌握，因而主張觀望³¹。但是在溥儀本人對復辟活動的積極表現之下，遂決定與日本協力，並於1931年10月11日派遣日本人遠山猛雄連絡日本陸相南次郎（1874年—1955年）：

此次東省事變，民國政府處措失當，開釁友邦，塗炭生靈，予甚憫之。茲遣皇室家庭教師遠山猛雄赴日，慰視陸軍大臣南大將，轉達予意。我朝以不忍目睹萬民之疾苦，將政權讓之漢族，愈趨愈紊，實非我朝之初懷。今者欲謀東亞之強固，有賴於中日兩國提攜，否則無以完成。如不徹底解決前途之障礙，則殷憂四伏，永無寧日，必有赤黨橫行，災難無窮矣。³²

從溥儀連絡南次郎的信件可以看出，除了表達與日本合作進行復辟活動的期望之外，也表現出對於漢民族主義，以及共產主義的憂慮。

³⁰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1931年10月7日條，頁2345。

³¹ 胡嗣瑗，《胡嗣瑗日記》，1931年10月7日條，頁102。

³²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頁208。

由於辛亥革命的訴求不只有君主轉為共和的國體之爭，同時也主張將「天下」觀念轉變成「民族國家」的觀念，這樣的概念其實也是受到日本的啟發³³。但是，中國要轉變成民族國家，不同於日本，一定必須面對一個問題：一旦所謂「中國人」標舉自己是「黃帝子孫」，強調「漢化」，那麼從「大清」過渡到「民國」，要從一個實際上包含多元民族組成的帝國轉變成強調單一融合民族的國家，其領土勢必得面臨大家對國族沒有共識而致分裂的情形。於是在辛亥革命後，蒙古、滿洲王公謀求獨立的源頭，除了來自於日本遊說的外因之外，來自於內部反對單一民族主義的因素仍不能忽視。儘管辛亥革命後孫中山雖改口稱「五族共和」，但實際上孫文對仍然主張將中國各個民族同化為漢民族主義國家³⁴，面對國民黨積極呼籲的漢民族主義，溥儀便主張民國將政權交由漢人統治，反而讓中國陷入政治混亂的情形，以至於需要與日本協力來復辟原有的帝制。

事實上溥儀聯絡南次郎的舉動頗有一意孤行之嫌，胡嗣瑗在 1931 年 10 月 16 日仍力勸溥儀應謹慎行事，此時才得知溥儀已派員聯絡南次郎，見事已無轉圜餘地，胡嗣瑗才勉為其難，答應隨溥儀參加滿洲國³⁵。同時羅振玉亦為溥儀擬定參加滿洲國的電報：

自辛亥革命，改君主為共和，宜若可得國利民福矣。乃二十年來，內戰不已，死亡枕藉，復刮民脂膏以充軍費。……今推求禍始，自改政體為民主，人人皆有總統之望，於是人欲日肆，不奪不厭。總統復變為委員制，委員制將復變為共產制。暴民專制之害，遠過於君主獨裁。今欲挽此狂瀾，亟須恢復帝政。³⁶

³³ 王柯，《亦師亦友亦敵：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頁69-71。

³⁴ 孫文，〈演講・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1921年3月6日），收入於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第3冊（台北：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1973），頁227。

³⁵ 胡嗣瑗，《胡嗣瑗日記》，1931年10月16日條，頁106。

³⁶ 王季烈，〈羅恭敏公家傳〉，收入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資料編輯部主編，《民國人物碑傳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頁558。

從電報的內容可看出民國以來政治動盪的情形，促使清遺民認為，相較於讓中國持續陷入所謂暴民專制之苦，不如藉由日本之手，恢復帝制的政治秩序。只是日本人對這些清遺民的態度，並非要協助復辟清朝，溥儀的名義也不是皇帝而是執政，溥儀也曾一度拒絕配合關東軍，但是在鄭孝胥極力勸說溥儀「進退一旦延誤時機，就難得到機會」之後，溥儀也勉強接受執政制³⁷。

儘管清遺民協力日本的目的是為了在中國重建清朝。但事實上，但實際上日本並無意恢復「大清」，從關東軍石原莞爾（1889年—1949年）的〈滿蒙問題解決策案〉來看：

由於九月十九日滿蒙古領之意見中央不予採納，且建川少將也完全不同意，因此終究無法進行占領，只能吞淚接受滿蒙獨立國家方案作為最後陣地，期待良機再次來臨，終有實現滿蒙領土論之日……以受到我國支持之東北四省及蒙古為領域，樹立以宣統帝為領導的中國政權，使滿蒙成為各民族之樂土³⁸

日本關東軍之所以在中國東北扶植溥儀成立滿洲國，實為不得已的選擇，原先關東軍的目標是讓整個中國東北由日本直接統治，實現其滿蒙領土論。儘管關東軍在九一八事變後佔領中東北，但滿蒙領土論因為涉及外交問題，受到日本內閣反對，為了確保在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在中國東北的經濟利益需要在中國東北成立親日政權，才不得不與清遺民合作成立滿洲國。石原莞爾更坦言：

滿蒙自由國或是由宣統帝領導的虛君共和制度，各種方法皆曾研究，最後深入的考慮發現新滿蒙的建設不可能由中國人擔任最高

³⁷ 林出賢次郎，〈菱刈大使會談要領（第一号）〉，1933年10月13日，《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第十卷，未標頁碼。

³⁸ 石原莞爾著、角田順編，《石原莞爾資料——國防論策篇》（東京都：原書房，1975），頁85。

支配，如此將會發生同樣的弊害。因此中央政府應該完全委託日本，日本擔此重任不僅是為了自己，而是真正為了三千萬之在滿民眾以及世界和平³⁹。

由於只是要借用溥儀在滿蒙地區的象徵地位，達到更好的宣傳與控制經濟利益的目的。因此無論滿洲國的政治體制為何，溥儀實際上都無法在任何大事上具有決策權。但是，即便有陳寶琛、胡嗣瑗等人的勸阻，能夠先擔任由執政再過渡到恢復帝制，對溥儀的誘惑，顯然是足以讓溥儀忽略部分清遺民的疑慮。於是，溥儀一再配合日本的要求達到復辟清朝的目的。

第三節 滿洲國清遺民對「日滿合作入關」的歧見

清遺民與日本協力建立滿洲國之後，無論是否支持參加滿洲國，既然溥儀已決定參加滿洲國，也寄望溥儀能夠決定滿洲國的政治體制，圖謀入關復辟清朝的機會。另一方面，從滿洲國清遺民之間的往來書信來看，滿洲國清遺民本身對滿洲國的國家發展本身就有不同的意見，「入關」在現實上也面臨許多困難，其中最重要難題的就在於參與入關的軍隊組成。滿洲國清遺民在缺乏軍隊支持的情況下，只能仰賴日軍的支持。然而對於日軍介入的程度的不同，不僅日本與清遺民之間沒有取得共識，就連各個清遺民之間對日本的態度也不一，使得「日滿合作入關」終究只是滿洲國清遺民在暗中紙上談兵。儘管事實上滿洲國並未能如滿洲國清遺民期望的入關復辟清朝，但在策畫協力的過程中，滿洲國清遺民也能反映他們對滿洲國政治體制的想像，以及如何因應共產勢力擴張的危機。

在選擇合作對象方面，朱益藩強烈表明與日本合作的擔憂。朱益藩儘管沒有參加滿洲國的建立，選擇蟄居北京照料清室人員，但是仍然寄望溥儀能夠入關北京，在溥儀就任滿洲國執政後，持續透過胡嗣

³⁹ 石原莞爾著、角田順編，《石原莞爾資料——國防論策篇》，頁88。

瑗，向溥儀提出政治建議：

武（藤信義）已到長（春），觀其舉止，似非蠻橫不受商量者。惟所謂議定書，未悉內容，不知於從前辦法，能一一糾正否？如報紙所載，則事前並未雙方協商，臨時武（藤信義）先簽字，而亂雅（鄭孝胥）繼之。果爾，則彼仍是令出惟行，無復磋商之餘地，以後欲支，節節與之麻煩，以圖挽回難矣。亂雅（鄭孝胥）自滅自起，戀棧之意顯然，若僅逐其二離，而仍令居位，則一切如故，進展無望矣！替人誠難，其選得一彼善於此，最初未與彼邦定議者，可不為潛力所束縛，或可隨時爭執，漸圖就我範圍……此間自汪、張相持，公署已撤，而設軍委分會，插入多人，前議四路之說，已不適用。近又組織一委員會，章程十八條，業已覓得，彼雖云不改初志，然其辦法，則大異矣！據箇中人密語，大意在收服〔復〕義軍，以為我用，聞現已著手，將來即以為護衛乘輿之用，但恐烏合之眾，不易就緒耳。總之，弟意以為關內，如有團結力，萬眾一心，迎請入關則可，若由他邦送之入關則不可。⁴⁰

朱益藩表達對日滿議定書的疑慮，認為滿洲國應該與日本協商後再簽訂，以獲得更多主導權。甚至向溥儀主張撤換鄭孝胥，同時朱益藩認為復辟清朝應該尋求關內軍民的支持，反對由日本軍隊協助入關。同樣對日本抱持懷疑態度的陳寶琛亦透過胡嗣瑗表達對防範共產主義，以及對滿洲國是否能獨立自主的憂慮：

目下大事，鍾山（國民黨）急於自謀，縱共入湘。若竟入蜀，則成坐大，非從秦隴遏其通道新疆，聽與蘇俄連合，後患豈可勝言？隣（日本）到此時，豈能坐視？而我舍隣（日本），亦誰能為助？英美雖嫉日，亦不能不利用之矣。然回紇助唐，必有李郭新練之軍，能否應用？仍用滿洲國，能慰思漢之心否？亦一疑問，宜予籌之，勿

⁴⁰ 朱益藩，〈朱益藩密札，1932年〉，收入於遼寧省檔案館編，《溥儀私藏偽滿秘檔》（北京：新華書店，1990），頁121。

笑其太早計也。……公近予談論否？修訂大典，舊制自不能無所損益，亦不能盡取彼邦之典范，一一摹仿，宮闈位號，其一端也。奄寺勢不能復，應設女官否？蓋慮必極周詳，願聞其略。⁴¹

陳寶琛不僅在 1932 至 1936 年期間，將關內的政治局勢，透過私人關係輾轉反映至滿洲國，積極獻策。陳寶琛除了表達對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合作的憂慮之外，卻也主張滿洲國不應只依賴日本軍隊，更應該建立效忠皇帝的軍隊，並且滿洲國的政治體制不應該全盤照抄日本制度，需邀考量清朝舊制。由此可見陳寶琛不僅關心滿洲國政治體制的問題，也考量到溥儀需要掌握滿洲國軍權。

事實上，溥儀在滿洲國也在暗中謀畫，利用協力日本來達成「反共復國」的目的，根據遼寧省檔案館所藏「偽滿勾結日本策畫入關方案」，溥儀曾派遣趙欣伯（滿洲國立法院院長，1890 年—1951 年）藉調查憲法的名義赴日，企圖與日本策畫滿洲國入關的相關事宜：

倘能得友邦諒解，在滿練兵，以五萬人為率，即作為主幹軍隊。否則在國內軍隊中，精加選擇，儘可攏絡收用。或攏絡魯韓（韓復榘）之軍供用，其餘各派軍事首領，令其自招自練。至鄰國方面，只有軍官，可以共同入關，軍隊則概行謝絕……現在關內共匪蔓延數省，黨國已無撲滅之能力。如果任期猖獗，則日滿界居兩大蘇維埃之間，危險萬狀。似應從速聯合亞細亞個民族，推一強有力之國為領導，驅除一黨專制，掃蕩共產主義，以維東亞和平⁴²。

從這一份「入關方案」來看，溥儀一方面出於對共產主義蔓延的恐懼，認為國民黨無力阻止共產主義蔓延，因此企圖尋求機會入關以武力打擊共產主義。另一方面，又希望日本能夠攏絡華北地方軍政勢

⁴¹ 陳寶琛，〈陳寶琛密札，1934年12月25日〉，收入於遼寧省檔案館編，《溥儀私藏偽滿秘檔》（北京：新華書店，1990），頁113-114。

⁴² 愛新覺羅·溥儀，〈偽滿勾結日本策畫入關方案〉，收入於遼寧省檔案館編，《溥儀私藏偽滿秘檔》（北京：新華書店，1990），頁50-51。

力，來達到入主北京的目的。「入關方案」凸顯滿洲國清遺民對民國政治體制看法的矛盾性，一方面認為國府無力應付共產主義，一方面又企圖攏絡地方軍政勢力，進一步削弱國府。況且，「入關方案」中主張由日本協助滿洲國訓練軍隊，並在入關時排除日本軍隊參與的計畫，凸顯「日滿合作」之間，早已有不信任的鴻溝存在。

在反共和復辟清朝的理想之下，滿洲國清遺民選擇向日本爭取滿洲國主權獨立，並期望能夠協助「入關掃共」。不過日本既然不願意讓清遺民獲得政治權力來妨礙其對滿蒙經濟利益的攫取，對於滿洲國軍權當然也全然由日本把持，1932年9月13日慶應義塾大學教授板倉卓造（1879年—1963年）拜訪鄭孝胥，席間即表達對滿洲國治安問題的憂慮：

滿洲軍不能剿匪，純由日本軍出戰。日軍常疑鄉團而繳其械，奔匪者相繼，反增仇日之憤。政府上級官吏雖多滿員，而中級日本人之為官吏者把持跋扈，亦多不平之氣，情況漸惡，輿論稍變，殊為可憂⁴³。

對日本而言，即便是協助維持地方治安的鄉團也不是能信任的對象，遑論要日本協助溥儀訓練軍隊，達成入關恢復清朝的目的。板倉卓造同時一針見血地指出，滿洲國政府的權力事實上是由中階層的日系官吏把持，滿洲國清遺民的政治地位可謂是位高權輕，甚至在鄭孝胥因總務廳長駒井德三（1885年—1961年）的專橫，而對諸事保持沉默，並於1935年5月去職之時，原先屬意由蔡運升（1879年—1959年）接任國務總理，然而日本卻決定讓張景惠（1871年—1959年）接任，此舉讓熙洽感到不滿，認為：「張不如鄭，難以為繼」⁴⁴。儘管滿洲國清遺民對軍事權自主、政體自主有所爭取，但實際上政治權力仍然是由日軍所掌握。

⁴³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1932年9月13日條，頁2408。

⁴⁴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1935年5月22日條，頁2583。

事實上就連日本國內是否要藉由扶植滿洲國來達成反共的目的也還沒有共識。當時具有強烈反共意識的首相犬養毅，是主張合作南京國民政府，認為九一八事變反而會造成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反而讓中國陷入赤化危機，犬養毅甚至暗中派遣萱野長知（1873—1947）與居正（1876—1951 年）洽談防止九一八事變擴大、中日在中國東北經濟合作的事宜⁴⁵。惟犬養毅秘密和中國談和的消息為日本軍部偵悉而作罷。

第四節 小結

從反共復國的角度審視滿洲建國，嘗試為清遺民在 1930 年代的處境，尋求他們協力於日本的動因。我們看到，在防共和復辟交相重疊下，從反對民國的角度審視到滿洲立國同樣屬於清遺民對政治認同和抵制的體現⁴⁶。儘管反共主義並非清遺民所專有，清遺民在企圖重建傳統儒家的過程中，反對的外來學說也不只有共產主義。他們在此確實扮演兩難而模糊的角色，清遺民面對日益增加的對於傳統政治文化秩序的敵意，固然有如王國維選擇自沉以明志的案例，也有如羅振玉等部分清遺民企求從日本勢力協助其撥亂反正，以至於選擇與日本協力成立滿洲國的情況。

1920 年代新文化運動激進化，同時也代表著用軍權來捍衛意識形態的局勢越發明朗，胡適在 1925 年致函陳獨秀的信件中也提及：

《晨報》近年的主張，無論在你我眼裡為是為非，決沒有「該」被自命爭自由的民眾燒毀的罪狀；因為爭自由的唯一原理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爭自由的唯一理由，換句話說，就是期

⁴⁵ 黃自進，〈犬養毅與九一八事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5期（台北，1996.06），頁328。

⁴⁶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頁375。

望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⁴⁷

胡適是以自由主義的角度來批評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越發激進的態度。伴隨對中國局勢日益逼近的危機，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越是追求激進速成的聲音。他們認為疾呼改變現狀的口號，不僅愈能撼動人心，也讓反對的聲浪不敢躁進。透過激進的手段來壓抑反對新文化運動的意見，除了意味著單純透過發表言論的手段來捍衛自身意見的正當性，已經逐漸式微，必要時透過暴力來鎮壓反對意見，也被左傾的新文化運動領袖所認可。另一方面，透過暴力的手段來塑造自己意見的正當性，不僅導致清遺民因意識到暴力的危機而產生恐共的心態，也讓部分清遺民意識到，必要時利用日軍的武力來獲得部分政治權力，也許是追求所謂王道樂土的理想的手段。復辟派之所以選擇參加滿洲國，並不只是妥協於日本的軍事占領，也企圖藉此機會掌握重建傳統文化，排除革命、共產等異端思想的實質權力。

1932年，在滿洲國的復辟派與日本關東軍合作成立滿洲國協和會，以溥儀擔任名譽總裁，鄭孝胥為會長，在滿洲國宣揚王道主義、建國精神，強化其統治正當性。根據滿洲國協和會發行刊物《滿洲國協和會之概要》的敘述，滿洲國的創立必須統一國民的信念，排除資本主義的重壓、共產主義的攪亂與三民主義的欺瞞⁴⁸，而滿洲國協和會正是將滿洲國居民的國民思想統一的「思想建國團體」。

刊物也將1932年間，滿洲國協和會具體如何實行建國工作加以陳列。其中派遣宣撫員跟隨關東軍鎮壓馬賊、共產黨、國民黨等反建國團體是工作的重點之一，宣撫員除辦理演講、發行刊物來宣傳「滿洲國精神」之外，同時也擔任審查共產黨、國民黨相關刊物，調查潛伏之共產黨、國民黨組織等情報工作⁴⁹。對滿洲國清遺民而言，為了樹立

⁴⁷ 胡適，〈胡適致陳獨秀〉（1925年12月），收入於潘光哲編，《胡適全集：胡適中文書信集》第2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2018），頁22。

⁴⁸ 滿洲國協和會編，《滿洲國協和會之概要》（新京：滿洲國協和會，1933），頁5。

⁴⁹ 滿洲國協和會編，《滿洲國協和會之概要》，頁24-25。

建國精神，統一滿洲國國民思想，協助關東軍鎮壓共產黨等一切反建國團體與思想都是必要手段。

但是，復辟派卻忽略日本之所以成立滿洲國，只是基於對自身利益的維護。在滿洲國成立之後，清遺民固然繼續暗中聯絡，期望能爭取滿洲國主權。正如朱益藩、陳寶琛在密札中的建言，在缺乏效忠溥儀的軍隊的情況下，無論是要實現復辟的理想，亦或是在滿洲國向日本軍部爭取獨立自主，都是難以實現的理想。況且滿洲國清遺民推行「王道思想」的方式，同樣訴諸於國家暴力的手段。

當 1936 年日人松岡英治詢問鄭孝胥，詢問基督學堂學生不肯拜孔，要如何處置之時？鄭孝胥回答：「雖信教自由，然國家尊孔，宜由政府制定不拜孔者不得入仕，如佛教之出家可也。」甚至在關於溥儀本為清帝，若使民國亡後是否將復職的問題時？鄭孝胥更回答：「一旦證實共和制度不適用於中國時，皇帝以滿洲皇帝兼帝中華，如英王之兼帝印度可也。」⁵⁰由此可知滿洲國清遺民不僅在反共方面訴諸軍隊來掃除共產黨勢力，在提倡王道思想、儒學復興之時，同樣訴諸於強制暴力的手段，將違反王道思想者，排除於政治權力之外。乃至於更進一步，將所認定的敵對政權，視之於類似殖民地的地位，似乎已經不再重視在民國生活的人民的處境。

對於 1920 年代共產黨與清遺民的衝突，導致湖南清遺民葉德輝遇害一事，胡適發表〈悼葉德輝〉總結雙方的衝突：

郎園老人不怕死，槍口指胸算什麼！生平談命三十年，總算今天輪到我。殺我者誰？共產黨。我若當權還一樣。當年誓要殺康梁，看來同是糊塗帳。你們殺我我大笑，我認你們作同調。三十年來是與非，一樣殺人來翼教。⁵¹

胡適藉由評論葉德輝（1864 年—1927 年）遇害，道出 1920 年代

⁵⁰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1936年6月30日條，頁2633。

⁵¹ 胡適，〈悼葉德輝〉（1931年6月18日），收入於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9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333。

的知識分子用激進的手段來維護自身所信仰的主義的現象。對胡適而言，用激進的手段來捍衛自身所信仰的價值觀，這樣的行為也意味著價值觀的優劣，已經不是取決於所謂傳統，抑或是進步的問題，而是取決於信仰者本身的權力。保皇派在清末掌握權力時對維新派武力鎮壓，民國時革命派對保皇派亦復如是。因恐共而寄望協力日本的滿洲國清遺民，亦主張訴諸權力來捍衛傳統。遺憾的是，胡適所呈現捍衛主義的現象，並未隨著清遺民在政治影響力的衰落而有所趨緩。胡適最初在新文化運動中所欲追求的自由的空氣，在「共產」與「反共」的政治壓力之下，正逐漸消逝。



第二章、反共與滿洲國王道主義

為了達成清王朝的復辟，滿洲國清遺民和選擇與日本人協力，參與滿洲國，滿洲國建國的過程不僅倉促，民眾對滿洲國的認同更是極其低落。民眾不僅對所謂王道主義、滿洲國建國精神的認識相當模糊，就連三民主義、共產主義的概念也不甚瞭解，在溥儀被扶植成為滿洲國的元首之前，溥儀不僅政治實力薄弱，他在媒體的形象也多被當作是負面的帝制殘餘，與清遺民企圖呈現的撥亂反正，重建綱常倫理的領導者形象大相逕庭。這樣的情況，復辟派在實際參與建國工作的過程中，也心知肚明。如《滿洲國協和會之概要》所示：

日本的國民有“忠君愛國”的信念，正如美國有擁護星條旗的國民信念一樣，國家的基礎是國民信念的歸一，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滿洲國，好像有村長，不要說滿洲國的建國，就連五色旗和青天白日旗都不知道，以為是 20 年前的清朝，與此同時共產黨、國民黨、張學良的便衣隊對著這些無知冷漠的民眾散佈「謠言」的宣傳來蠱惑人心。為了維持治安，無論如何都要知道建國的意義，涵養著對滿洲國信念的信仰，所以為了這個目的採取了以下各種教化方法。¹

儘管復辟派認為民眾的無知冷漠，加上共產黨、國民黨、張學良等各方政治勢力的蠱惑宣傳是導致民眾對滿洲國認同薄弱的原因，但也承認滿洲國將來勢必需要持續想方設法爭取人民的認同，才可能繼續其統治。本章將會分析滿洲國建國後，官方在媒體宣傳方面對於政權正當性、合法性的各種論述，如何讓民眾脫離共產主義的蠱惑，轉變為認識建國精神、王道主義的意義。

¹ 滿洲國協和會編，《滿洲國協和會之概要》，頁20。

第一節 鄭孝胥與滿洲國文教部

既然要促使滿洲國民眾的國民意識統一於王道主義，排除共產主義等邪說，文教就成為滿洲國建國以後的重要工作。於是滿洲國不僅在軍事方面加強對共產黨組織大力打擊，鎮壓「共產匪」的活動，統合全國文教機構，由中央政府主導文教事務也隨即展開。1932年7月6日滿洲國國務總理鄭孝胥兼任²文教部總長，負責掌管關於教育、宗教、禮俗及國民禮俗等事務。³依照滿洲國官吏制度，文教部隸屬於國務院。

滿洲國文教行政機構，在滿洲國成立前，各省獨立，奉天、吉林、黑龍江、熱河和東省特別區皆有教育廳，滿洲國成立之初，還是沿用舊制，直到1932年7月文教部成立，才將全國文教行政之權統合於中央⁴。

在1933年9月7日在日本駐滿洲國大使官邸舉辦的文化事業茶話會中，羅振玉向日本駐滿大使菱刈隆（1871年—1952年）傳達日滿合作發展文教的意願：

中華民國革命20年來，使中國失去了傳統精神……我們要大力發展文教，重振中國歷來的傳統精神文明，建設王道國家，以此感化中華民國……為了保存東方精神文明，日滿兩國要互相合作。⁵

鄭孝胥也附和羅振玉，支持日滿道德合作：

² 關於滿洲國文教部內部各人事、職掌，詳見國務院總務廳編，《滿洲國官吏錄：大同二年版》（大連：滿洲日報社，1933），頁127-130。

³ 關於滿洲國文教部機構、任務之相關研究，可見任蓉蓉，〈偽滿洲國文教部研究〉（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論文，2020）。

⁴ 國務院文教部編，《滿洲國文教年鑒》，上冊（新京：川口印刷所，1933），頁59。

⁵ 林出賢次郎，〈菱刈大使會談要領（第一号）〉，1933年9月7日，《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第十卷，未標頁碼。

正是這思想道德的合作親善，才是最高最有力的力量……這種力量是偉大的，將要勝過數十萬的兵力，我們要盡快同日本學者及道德家互相合作⁶。

對滿洲國清遺民而言，日滿合作建設王道國家的目的在於恢復革命以來中國所喪失的傳統道德，尤其對鄭孝胥來說，思想道德的合作，其力量要勝過軍事的力量。

自文教部成立以來，文教部與滿洲國各地方教育機關，力圖復興禮教。鄭氏認為民國以來的黨化教育，抄襲外國，貽誤至多，不符合滿洲國需求。因此，鄭孝胥認為文教行政工作最重要者，即是廢止黨意與添授經學、於各地成立教育會，由當地人復興教育⁷，並將設立文教部視為溥儀力挽民國以來禮教衰敗，復興孔教的政績⁸。

由每年文教部出版的《滿洲國文教年鑒》的題字來看，清遺民對於文教部肩負復興禮教的能力抱有很高的期待⁹。不過在實際上推行文教工作時，基本上還是不得不留用民國時期舊有的師資，只是在透過舉辦教員講習所的方式，將全國中小學校長、教師，輪流召到新京參加講習會，再讓教師回到地方學校，教授講習會所宣傳之王道主義的內容¹⁰。從《滿洲國文教年鑒》的記載來看，雖然鄭孝胥痛陳辛亥革命以來，教育幾頻於破產¹¹，但於〈學校教育〉一章中，卻又多次提及，

⁶ 林出賢次郎，〈菱刈大使會談要領（第一号）〉，1933年9月7日，《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第十卷，未標頁碼。。

⁷ 國務院文教部編，《滿洲國文教年鑒》，上冊，頁60。

⁸ 國務院文教部編，《滿洲國文教年鑒上》，上冊，頁2-9。

⁹ 參與題字的清遺民有胡嗣瑗、商衍瀛、許寶衡、陳曾壽、王季烈、寶熙、羅振玉、熙洽，以及任職滿洲國的各部會長官，題字內容詳見國務院文教部編，《滿洲國文教年鑒上》，上冊，頁3-18。

¹⁰ 國務院文教部編，《滿洲國文教年鑒》，上冊，頁552-553。

¹¹ 國務院文教部編，《滿洲國文教年鑒》，上冊，頁551。

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全國學校多數停辦¹²。為此，文教部當務之急是要恢復舊有因九一八事變戰禍停擺的學校教育，故對於推行王道主義，恢復傳統道德的理想，還只能停留在宣傳而已。

講習會除了講授王道主義，讓畢業的講習員在地方宣傳王道主義之外，講習會滿洲國在儀式中動員民眾的手段之一。如在第二次講習會的行程中，就要求講習員參加日本承認滿洲國紀念祝賀典禮¹³。更於1933年7月30日的行程中，安排講習員全體到車站恭送日本駐滿洲國大使武藤信義的靈柩上車¹⁴。由此可知，滿洲國文教部的政治動員，不僅僅只是為了塑造對滿洲國的正當性，同時也具有表現日滿親善的意義存在。實際上文教部事務的決策與執行，都免不了受到日系官吏的影響。

儘管國務總理和文教部總長都由鄭孝胥本人擔任，理論上滿洲國宣傳建國精神、王道主義的工作都操之於鄭孝胥本人之手，但根據《鄭孝胥日記》所記載：

至文教部，與西山司長商籌辦《文教雜誌》月刊及請簡禮教司長、委任屬官。¹⁵

實際上文教部事務的決策與執行都需要與日系官吏文教部總務司司長西山政猪（1883年—1951年）共同討論。西山政猪總攬文教部大權的情況，同為日系官吏的社會教育科科長古閑亮也有所抱怨：

文教部古閑亮及一譯人來見，言部內總統（務）司長攬權廢事之狀。

16

¹² 國務院文教部編，《滿洲國文教年鑒》，上冊，頁553。

¹³ 國務院文教部編，《滿洲國文教年鑒》，上冊，頁564。

¹⁴ 國務院文教部編，《滿洲國文教年鑒》，上冊，頁564。

¹⁵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1932年10月29日條，頁2421。

¹⁶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1934年11月12日，頁2556。

關於鄭孝胥在滿洲國文教部的角色，過往的研究也多將其視為日本為掩飾背後操控滿洲國而推出的樣板人物，鄭孝胥對於文教部事務並沒有任何置喙的餘地¹⁷。然而日記中也表示鄭孝胥對於文教部人事不是沒有任何話語權：

彭、程二子來，言憲兵橋某來部查問之狀。¹⁸

作書與憲兵司令官岩佐祿郎，請其秉公查明彭、程二子之事。¹⁹

彭、程來，言憲兵事已解。²⁰

彭壽、程克祥當時為文教部調查科科員（見表 2-1），負責在《滿洲報》中主編《王道週刊》²¹，宣傳鄭孝胥的王道主義。既然鄭孝胥在文教部並沒有任何決定權，文教部的事務也均由日系官員操辦，那麼為何鄭孝胥需要親自為兩位科員發聲？而且關東軍憲兵最終會聽從鄭孝胥的意見，沒有為難這兩位科員呢？為此，有必要針對彭壽、程克祥與鄭孝胥之間的關係進一步深究，對於彭、程兩人所主編的《王道週刊》中的內容進行分析。

表 2-1 1933年滿洲國文教部職位人員組織表

文教部 總長：鄭孝胥 （國務總理兼任） 次長：許汝棻	總務司 理事官：西山政 猪（司長）	秘書科 事務官： 王炎（科長）、劉元任、黃懋謙 屬官：許樹百
		文書科

¹⁷ 任蓉蓉，〈偽滿洲國文教部研究〉，頁18。

¹⁸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1934年11月2日，頁2554。

¹⁹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1934年11月3日，頁2554。

²⁰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1934年11月5日，頁2554。

²¹ 彭壽，〈發刊詞〉，《滿洲報》，1934年4月2日，第3版。

		事務官：堀越英二（科長）、福士末之助（督學官）、孫祥雲 屬官：池田清、錢定鈞、李仲怡、薛世忠
		庶務科 事務官：堀越英二（科長） 屬官：土屋鉞夫、森田悌三、前田莊三、羅福榮
		調查科： 事務官：任祖安（科長） 屬官：川尻伊九、錢定鈞、彭壽、程克祥、錢弼臣 督學官：福士末之助、岩間德也、陶心源
	學務司 理事官：上村哲彌（司長）	總務科 事務官：山本力（科長） 屬官：柏木竇丸、崔國鈞、丁莘白、恩藤正、陳訓旭
		普通教育科 事務官：趙德健（科長）、赤鉾林太郎 屬官：後藤春吉、王維常、龜井俊彰、孟桀
		專門教育科 事務官：魏象賢（科長）、一條林治 屬官：和田正夫、張志銘、南齊光、李祥生、伊晉序、景介

		編審官室 編審官：福井優、長濱義純、馮汝玖、江幡寬夫、邢定雲 屬官：關文瑛、甯廼理、田中義人
	禮教司 理事官：陳懋鼎（司長）	社會教育科 事務官：古閑亮（科長）、河瀨松三、白雲麟 屬官：岡田七雄、黃浩、久保田完三、陳曾杰
		宗教科 事務官：王興義（科長） 屬官：日田次郎、吳鴻恩、華志震
	教員講習所 所長：許汝棻（文教部次長兼任）	教授：高起元、堀井德五郎 助教授：邵令魁 屬官：南喜市

資料來源：國務院總務廳編，《滿洲國官吏錄：大同二年版》（大連：滿洲日報社，1933），頁127-130。

第二節 鄭孝胥與《王道週刊》的發行

為促使滿洲國民眾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王道，鄭孝胥將王道滲透到日常生活各個領域，王道拒毒、王道教育、王道義行、王道體育、王道社會學……等各種龐雜，甚至是互不相干的領域，鄭孝胥都企圖透過王道加以統合，期望在短時間內將滿洲國打造成為王道國家²²，為此文教部在鄭孝胥任內編纂許多宣傳王道主義的刊物，其中連載於《滿洲報》的《王道週刊》，是當時宣傳王道主義的重要刊物。

由於鄭孝胥認為「為言愛國之思想、軍國民之教育皆足釀成世界

²² 鄭孝胥於1934年2月帝制實行大致確定後表示，自己年事已高身體不堪負荷，任事以五年為限，內容詳見滿洲國，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1934年2月18日，頁2507。

戰禍，王道則不主愛國而主博愛，不用軍國教育而用禮義教育²³」，為推行禮義教育，宣傳王道主義，採用借助《滿洲報》既有的發行量和讀者，連載《王道週刊》的方式，強化王道主義宣傳的效果。

《滿洲報》由西片朝三於1922年7月24日在大連創刊，九一八事變後，《滿洲報》發展進入鼎盛時期，不僅在哈爾濱、奉天、新京成立分社，各分社還針對鄉鎮設立招募代派處，擴大報紙銷售範圍。1932年，時逢《滿洲報》創立10周年，位於大連本社遷移到新辦公大樓，鄭孝胥也提詞「籥雲展步」為《滿洲報》祝賀²⁴。



圖 2-1 滿洲報十年紀念鄭孝胥提詞

資料來源：〈紀本報新館〉，《滿洲報》，1932年11月1日，第1版。

²³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1932年7月19日，頁2396。

²⁴ 〈紀本報新館〉，《滿洲報》，1932年11月1日，第1版。

與此同時《滿洲報》也擴大經營其獨具特色的副刊版面，自1933年7月11日起，《滿洲報》由10個版增加到12個版，新增兩版副刊版面。《滿洲報》副刊相當豐富，涵蓋政治、兒童、婦女、體育、電影、藝術等多元領域，能夠滿足不同讀者群體的閱讀需求，《滿洲報》的發展不僅得益於日本擴張的需要，其有效的經營，透過獨樹一格的副刊內容吸引讀者²⁵。

1934年4月2日，鄭孝胥在《滿洲報》連載《王道週刊》強化王道主義宣傳。主要由出自滿洲國文教部的彭壽、程克祥（1907年—1981年）、錢定鈞，以及《滿洲報》社社員安東照負責編輯工作，為「發揚學界之王道思想」、「增進讀者研究文學之興趣」、「使文化日趨發展」，與《文教月刊》合作，由《文教月刊》介紹教員學生之王道作品，再由程克祥負責審稿潤色²⁶。其中程克祥、彭壽參與王道主義宣傳的動機可能並不單純，兩人的身分可能是受國民黨指派潛入滿洲國的諜報人員，其身分曾於1941年10月31日潛伏上海時為汪精衛政府偵破²⁷。

程克祥，字季明，江西浮梁人；彭壽，字述先，兩人同為上海大學學生。1932年滿洲國成立後，程克祥經族叔「白菰居士」程濟（1870年—1940年）介紹，結識鄭孝胥，並任職於滿洲國文教部，直到1935年，張景惠取代鄭孝胥繼任滿洲國國務總理，在失去依靠的情況下離開滿洲國²⁸。儘管兩人任職期間有暗中將情報呈送曾任上海大學校長

²⁵ 關於《滿洲報》副刊之相關研究，可見陳曦，〈政治文化視角下的《滿洲報》副刊研究（1931-1937）〉，2019。

²⁶ 〈編輯者言〉，《滿洲報》，1935年4月1日，第5版。

²⁷ 周佛海，《周佛海日記全編》，1941年10月31日（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533-534；戴笠（1897年—1946年）亦曾增加發給程克祥、彭壽在汪精衛政府的活動經費，詳見「戴笠手諭關於安少如組組員准自十二月份起月增活動費並務於明日上午十時前告知安同志」，1942年11月15日，〈戴公遺墨—經理類（第2卷）〉，《戴笠史料》，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144-010111-0002-038。

²⁸ 孫瀟瀟，《軍統對日戰揭秘》（北京：團結出版社，2016），頁134。

的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于右任（1879年—1964年）的嫌疑²⁹，但不可否認的是，兩人任職期間是《王道週刊》發展最好的時候。尤其彭壽在文教部還負責《文教月刊》雜誌主任的工作³⁰，並直接參與《王道週刊》的籌辦工作³¹，對於《王道週刊》稿件的數量及內容的豐富程度都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程克祥、彭壽之所以能夠擔任《王道週刊》的主筆，得益於兩人與鄭孝胥之間親密的師生關係，根據《鄭孝胥日記》所載，兩人受業鄭孝胥期間，不僅互贈詩文：

中元節。彭、程二子來，程示詩數首，有云：「我行傍溪水，水深魚潛藏。」此二語甚佳。³²

甚至彭、程兩人在滿洲國的生活起居也受到鄭孝胥不少資助，1932年9月22日，彭壽以訂婚為由，求借鄭孝胥300元³³，鄭孝胥不僅應允，更親自擔任彭壽的證婚人³⁴。透過親密的私人網絡，彭、程兩人主筆《王道週刊》期間，不僅王道主義的內容受到鄭孝胥本人肯定，王道主義的宣傳方式也更為豐富：

彭、程…來。朝陽嫠婦劉李氏少寡，撫孫貧甚，鄉里稱之；以百元使《滿洲報》代遺之。³⁵

²⁹ 程克祥晚年口述自己參與情報工作的經歷，由黃曜隆編輯成間諜小說出版，程克祥回憶自己曾奉于右任之命在滿洲國搜集情報，報告內容深得于右任賞識，因而受于右任推薦給戴笠從事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工作，由於程克祥在滿洲國的報告《東北見聞錄》在二戰期間遺失，故本研究對程克祥是否在滿洲國的就參與情報工作先持保留態度，相關內容詳見程克祥口述，黃曜隆著，《京滬區長》（桃園：慈恩書局，1982），頁10-13。

³⁰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1933年3月15日，頁2448。

³¹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1933年8月3日，頁2474。

³²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1932年8月16日，頁2400。

³³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1932年9月22日，頁2410。

³⁴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1933年12月4日，頁2428。

³⁵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1934年6月3日，頁2528。

鄭孝胥用《滿洲報》的名義獎勵孝子節婦等事跡，不僅符合鄭孝胥本身實踐王道主義的作法，對連載於《王道週刊》的《滿洲報》而言，以此促進《滿洲報》的銷量，對於王道主義的宣傳有著莫大的幫助。錢定鈞亦在〈王道週刊今後的責任〉中稱讚彭、程二人宣傳王道主義的做法：

自從吾友彭述先、程克祥兩君，主《滿洲報王道週刊》的筆政，他們頗能夠講善……鳳城縣某某小學兩個未成年的小學生，在操場上工作，拾到了銀製首飾，趕緊的呈送校長返還學生，彭、程兩君，嘉其見利思義，並特為文以張之並求了總理大臣，贈賚學堂和小學生…。³⁶

彭、程二人去職離開滿洲國時，《王道週刊》在1935年7月15日刊登了鄭孝胥為兩人離去所作的詩：

二子北來問王道，北方學者未能先。峨嵋謠詠尋常事，不用尤人更怨天。功名富貴儻來耳，處困而亨道在吾。自古坦途非捷徑，卻須求己下功夫。³⁷

對鄭孝胥而言，彭、程二人對實行王道主義的積極性，遠高於滿洲國其他學者，另一方面也意味著王道主義對滿洲國民眾而言，並沒有太多吸引力，事實上，當彭、程二人離去後，主辦《王道週刊》的責任落在錢定鈞、安東照兩人手中，王道主義的宣傳效果終究不及彭、程二人在任時成功。

錢定鈞，浙江嘉興人，畢業於兩江法政大學，1933年開始任職滿洲國文教部屬官，1934年升任滿洲國文教部秘書官³⁸。安東照，日本

³⁶ 錢定鈞，〈王道週刊今後的責任〉，《滿洲報》，1935年1月1日，第8版。

³⁷ 鄭孝胥，〈彭述先程季明辭官南歸〉，《滿洲報》，1935年7月15日，第5版。

³⁸ 外務省情報部編，《現代中華民國滿洲帝國人名鑑》（東京：東亞同文會，1937），頁652。

熊本人，於 1932 年擔任《滿洲報》社駐新京特派員，負責吉林、哈爾濱的經營業務³⁹。

相較於彭、程二人與鄭孝胥緊密的師生關係，錢定鈞和安東照與鄭孝胥的關係較為疏離，文章刊登前，也不像彭、程二人在任時，會將文稿讓鄭孝胥看過。與此同時，鄭孝胥免職國務總理後，《王道週刊》頓失金援，面臨嚴重的稿源短缺問題，於 1936 年 9 月 14 日改名《王道專刊》，不僅無法應付每周出刊的需求，改為不定期出刊，版面更縮減為半版⁴⁰，直到 1937 年 7 月《滿洲報》停辦而停刊。

第三節 《王道週刊》中的反共宣傳

《王道週刊》創刊的目的，是為了達成鄭孝胥「今也鑒禍亂之無已，將欲正人心明王道」的理想⁴¹，本節根據 1934 年 4 月 2 日到 1937 年 7 月 31 日的《王道週刊》理論、小說、劇本，共 138 期的連載內容進行考察。其中以 1934 年 4 月 2 日到 1935 年 7 月 15 日這 63 期的文章為主，這段期間由彭壽、程克祥主編，文章內容直接受到鄭孝胥本人的審查，能直接反映滿洲國清遺民的思想。

《王道週刊》的頭條文章，主要為宣傳鄭孝胥的王道主義，而連載文章則是以闡釋鄭孝胥的王道主義理論為主，並連載王道主義小說和劇本。關於《王道週刊》文章的具體分析如下。

〈鄭總理大臣談王道教育要旨〉，談到鄭孝胥之所以在滿洲國推行王道主義教育的原因：

中國自古以來，為開化最早，學問最深之國家，但最近二十年來，其壞可謂已達極點…幾欲將本國固有之教育，完全根本剷除，而一切均模倣於外國…以三民主義代表我古代之精純道德，以白話代表我古時之淵深文學，詎非刺謬已極，現在我滿洲國既已單獨建國

³⁹ 滿蒙資料協會編，《滿洲紳士錄 第一版》（東京：滿蒙資料協會，1937），頁237。

⁴⁰ 〈王道專刊〉，《滿洲報》，1936年9月14日，第5版

⁴¹ 彭壽，〈發刊詞〉，《滿洲報》，1934年4月2日，第3版。

矣，實不能不根本推翻以前之所為，而以舊道德為教育之宗旨。⁴²

對鄭孝胥而言，民國以來，來自外國的新文化、新道德、新主義，是中國之所以頹壞的原因，以至於鄭孝胥企圖在滿洲國推行的王道主義教育，實際上就是將近代來自外國的新文化推翻，代之以中國的舊道德、舊文化。《王道週刊》頭條文章亦不時呈現排外思想，來作為提倡舊道德的理由，如〈論王道〉認為：

美國人以為此老大帝國，但能應用現代文明，即可復活，青年暗〔諳〕於其國歷史，亦附和之以為創造新中國甚易…其結果…軍閥以其威權支配人民，於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赤化等主義趁虛而入…非惟中國，即他國亦不應以富強為惟一之目的，應在道德，中國既持有甚古之道德，早晚必歸於以道德為其第一目的。⁴³

從〈論王道〉的觀點來看，晚清確實需要改革，但是青年貿然用美國之方法來創造新中國的結果卻反而造成軍閥混戰，共產主義趁虛而入。因此中國之改革，甚至是外國之改革，都要避免富國強兵之改革，而是要回歸至道德之改革。

在頭條文章之外，《王道週刊》也透過刊登鄭孝胥所審定之王道教育劇本⁴⁴，具體呈現鄭孝胥理想中的王道教育形式。〈博愛〉一文以在課堂上介紹白俄轉學生開始，教師向學生介紹新同學的故鄉和就學於滿洲國的緣由：

他的故鄉是很有名的，就是產生世界有名文豪的俄羅斯…現在他的父母因為覺感共產黨畜牧的主張，和猶太化的主義的苦痛，所以纔帶著他把全家搬到我們王道樂土的滿洲國家。⁴⁵

⁴² 王道學會，〈鄭總理大臣談王道教育要旨〉，《滿洲報》，1934年7月31日，第7版。

⁴³ 鶴廬居士，〈論王道〉，《滿洲報》，1934年4月9日，第3版。

⁴⁴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1934年5月7日，頁2524。

⁴⁵ 彭壽，〈博愛〉，《滿洲報》，1934年5月21日，第5版。

接著老師指點級長為轉學生講述歡迎之辭，要全級的學生「使這位新來的小朋友感受到，在我們王道樂土的滿洲國內，處處得到比在他的故鄉還要快樂…有無禮的行為去加害這新來的學友，那就沒資格作我們五色旗下的人民了。」⁴⁶。

劇中的教師不斷向學生強調滿洲國的博愛精神，文末，同學們確實聽話的將文具贈與新來的白俄轉學生，讓轉學生感受到滿滿的快樂。

47

對鄭孝胥而言，傳統道德與滿洲國的建國精神密不可分，滿洲國之所以能夠成為遠離共產主義迫害的王道樂土，取決於滿洲國國民是否具有崇高的道德，也因此王道主義教育特別重視傳統道德的養成。

既然鄭孝胥在《王道週刊》強調傳統道德的重要性，自然也會在其頭條文章發表關於如何在滿洲國恢復傳統道德的具體政策。其中，〈鄭總理大臣談王道教育要旨〉一文為不僅呈現鄭孝胥王道主義教育政策，還節錄鄭總理在教育廳長會議的訓詞：

鄙意欲速制冠婚喪祭及鄉飲酒各種通俗禮式，指導實行，以為社會教育之助，由文教部擬作演說法、演義法之體例，徵求仿作，候選定後頒布實行以為初等教育之助。實業學校則預擬農、工兩科，為造成技師及藝徒之備，將來令居全國職業學校中百分之七十；外人設立學校，應視同私立學校，勸令學習國語國文及帝制王道之宗旨。⁴⁸

由此觀之，鄭孝胥所提倡的王道主義教育，基本上是採取由國家強制實行的傳統道德教育，企圖在滿洲國恢復舊文化，不論公立私立，本國外國，教育內容都要符合滿洲國實施帝制王道的需要。既然將實

⁴⁶ 彭壽，〈博愛〉，《滿洲報》，1934年5月21日，第5版。

⁴⁷ 彭壽，〈博愛〉，《滿洲報》，1934年5月21日，第5版。

⁴⁸ 王道學會，〈鄭總理大臣談王道教育要旨〉，《滿洲報》，1934年7月31日，第7版。

行帝制的正當性與重建傳統道德價值，防範三民主義、共產主義等外國學說之危害聯繫起來，於是乎在宣傳滿洲國施政方針、建構帝制王道的正當性時，會採取提倡舊道德的論述方式，讓重建傳統道德成為凝聚滿洲國認同的資本。不過儘管三民主義、共產主義都被斥為是來自外國的異端邪說，鄭孝胥對於同樣來自異國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卻有著曖昧的態度。

第四節 王道與法西斯之間

在將王道塑造為滿洲國建國精神的同時，鄭孝胥經常將法西斯主義與王道主義互相比較。1934年6月日本秩父宮親王訪問滿洲國⁴⁹，《王道週刊》也刊登對秩父宮親王（1902年—1953年）訪滿的社論〈東西兩大盛事〉：

鄭國務總理大臣訪日後，不久御名代秩父宮殿下，答聘來滿…如歐西兩怪傑墨索里尼與希忒拉突然會見握手言歡…復君主、中興意大利之首相墨索里尼，其政治手腕之雄邁、政治成績之卓越，世界已目之為怪傑矣…德揆希忒拉，又為時代所屬目之一人…吾人以王道之眼光測之，深信其必有相當樹立，以媲美我滿日提攜，造福東亞之嘉謨宏猷⁵⁰

〈東西兩大盛事〉一文透過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1883年—1945年）與希特勒（1889年—1945年）的合作，表達對日滿合作的期望，與此同時，鄭孝胥也期望自己能如墨索里尼復君主、中興義大利一樣，成為溥儀的肱骨之臣。隔月，《王道週刊》又刊登〈鄭總理大臣談王道與法西斯一文〉，宣傳鄭孝胥對法西斯的推崇：

⁴⁹ 〈秩父宮殿下蒞京〉，《滿洲報》，1934年6月7日，第1版。

⁵⁰ 壽祥，〈東西兩大盛事〉，《滿洲報》，1934年6月25日，第3版。

法西斯主義，其目的為救意大利之危難，發揚大羅馬之精神，由歐戰之影響，工業商務，日就萎靡，共產主義，大肆猖獗，社會黨專橫武斷，其他憲政黨…農民黨等之搗亂…舉國皆陷於危險境地之意大利，於是墨索里尼起，以愛國之思想，喚起國民，作大規模之運動…全國實權，掌諸法西斯之手而告厥成功…王道之於滿洲，與法西斯之於意大利，有殊途同歸之勢…。⁵¹

對鄭孝胥而言，滿洲國實行王道，就有如義大利實施法西斯主義一般，目的是為了解決滿洲國所面臨的危機，而義大利所面臨的民生凋敝，共產主義、各黨各派搗亂國家的危機，也呼應辛亥革命以來中國所面臨的危局。既然鄭孝胥認為王道與法西斯皆「殊途同歸」，也就表示王道與法西斯之間的解決危機的目的相同，差別在於兩者的手段卻是大相逕庭：

蓋一則以富強為極則，竭其心力，與反對者作死戰，其功赫赫，進取特速；而一則以仁義為大本，矜孤卹寡使無告者有養，不尚爭競，專注教化，行之不餒，以期大成，此其歸也。⁵²

正如林志宏所指出的，鄭孝胥傾慕義大利的法西斯運動，但這不代表鄭孝胥欲完全仿效法西斯，沒有自己的見解。⁵³對鄭孝胥而言法西斯主義追求富國強兵的手段，在對抗反對者方面，效果立竿見影；而王道則以重視仁義，不崇尚競爭，採用道德教化來改善弱勢生活，才是鄭孝胥的理想。文末更點出法西斯主義的弊端：

蓋富強之學以之治國有餘，以之平天下則不足，天下皆期其富且強也，於是各懷侵略抵制之謀，愈逼愈緊，及至各不相讓之際，拔刀

⁵¹ 彭程，〈鄭總理大臣談王道與法西斯〉，《滿洲報》，1934年7月9日，第3版

⁵² 彭程，〈鄭總理大臣談王道與法西斯〉，《滿洲報》，1934年7月9日，第3版

⁵³ 林志宏，〈王道樂土—清遺民的情感抵制和參與「滿洲國」〉，頁85。

張弩，以較勢力，其潰裂毀滅至易。⁵⁴

鄭孝胥認為法西斯主義追求富強的作法，用之於治理國內還能有所成效，若是過度追求富強，則容易在國際上招致抵制，當各國都紛紛採行富國強兵之道，國際關係劍拔弩張，反而造成世界大戰的危局。

早在 1932 年，溥儀就將「除去種族之見、國際之爭」⁵⁵作為滿洲國建立的基礎，鄭孝胥宣傳王道主義之時，就將和平視為滿洲國應以王道立國的理由。1934 年，鄭孝胥在教育廳長會議再度強調：

現今各國之教育宗旨，不曰愛國思想，即曰軍國主義，以愛國主義，鼓勵其民心，以軍國主義，訓練其武事，結果將會造成永無止境的世界大戰⁵⁶。

在鄭孝胥的眼裡看來，世界大戰的陰霾如影隨形，鄭氏不只在日記中多次提及對世界大戰的憂慮⁵⁷，《王道週刊》也不時刊登對世界大戰的社論，在 1934 年 8 月連載的〈世界大戰與王道〉中，透露出鄭孝胥對於戰爭的看法：

兩軍相見，各為其主，死亡覆滅，終不反顧，勇也。降者不誅，投械者不戮，義也。禁暴戢兵，以持和平，仁也。此數說者，今皆廢矣…蓋往時之殺戮，止於戰者，今之殺戮，及於不戰者，欲免交戰之相殺，必先破滅其不戰者，使之不能戰…以兵立國者，其果足以立國乎？⁵⁸

⁵⁴ 彭程，〈鄭總理大臣談王道與法西斯〉，《滿洲報》，1934年7月9日，第3版。

⁵⁵ 〈執政宣言〉，《滿洲國文教年鑒》，上冊，頁19。

⁵⁶ 王道學會，〈鄭總理大臣談王道教育要旨〉，《滿洲報》，1934年7月31日，第7版。

⁵⁷ 相關記載詳見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1932年7月19日，頁2396；1932年9月23日，頁2410；1933年3月26日，頁2450；1933年5月18日，頁2461；1934年6月4日，頁2528-2529；1936年3月5日，頁2619。

⁵⁸ 彭壽，〈世界大戰與王道〉，《滿洲報》，1934年8月13日，第7版。

鄭孝胥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觀察到，戰爭的規模越來越廣，不只破壞力越發驚人，更重要的是道德層面的破壞，過去的戰爭仍講求尚勇、尚仁、尚義，而世界大戰則不然，非把敵國的有生力量消滅不可。當然，鄭孝胥也明白各國不是不知道戰爭的危害，在戰爭型態改變成總體戰的情況下，各國也不得不擴充武力，採用軍國主義，各國的軍備競賽，已成成騎虎難下之勢。⁵⁹

1936年，10月，義大利入侵衣索比亞，使得鄭孝胥對於墨索里尼窮兵黷武的作為感到越來越失望。事實上，鄭孝胥對墨索里尼的不滿，早在1932年，鄭氏聽聞墨索里尼再度宣揚「黃禍」之說時，鄭孝胥的不滿便表露無遺，隨即表示有意撰寫一篇〈反黃禍論〉，用以反駁墨索里尼，並促使西方列國反省專尚霸術的害處。⁶⁰當鄭氏得知義大利入侵衣索比亞時，也明顯並不認同義大利出兵無飛機、坦克車的衣索比亞是仁義之師的作為。⁶¹與此同時，《王道週刊》亦刊登時評譴責墨索里尼：

意相墨索里尼，一意孤行，傾舉國之雄師，以與阿比西尼亞戰，其勝利固在吾人意想中…使阿王而失政，阿民而暴亂，意舉義師，大張撻伐…而意相之義聲，可與天日同光明…今阿王果若是乎？阿民果若是乎？勝之不武，徒示天下以殘虐，嗚呼意人。⁶²

〈勝之不武，意大利果足以自豪耶〉一文，譴責義大利對衣索比亞的入侵，即便勝券在握，也只是勝之不武，只會向世人展示墨索里尼的殘暴，但與此同時，時評也透露出鄭孝胥理想中的戰爭型態，似乎

⁵⁹ 彭壽，〈世界大戰與王道〉，《滿洲報》，1934年8月20日，第7版。

⁶⁰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1932年5月6日，頁2382。關於鄭孝胥對墨索里尼態度的轉變，可參考林志宏，〈王道樂土—清遺民的情感抵制和參與「滿洲國」〉，《新史學》，第18卷，第3期（台北，2007.09）

⁶¹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1935年10月7日，頁2601。

⁶² 克祥，〈勝之不武，意大利果足以自豪耶〉，《滿洲報》，1935年10月28日，第5版

只要義大利在適當的時機出兵，墨索里尼的義聲一樣可以「與天日同光明」。

事實上鄭孝胥也意識到，弭兵裁軍在現實上已不可能做到，於是鄭孝胥遂主張戰爭的正當性應該建立在傳統道德：

古時用兵之道，必忠勇，不誅降，不戮投，禁暴撫民，垂為法則。譬始亂臣賊子，肆行無忌，兵以靖之…鄰國有難…仁者以不忍人之心，整軍往救，去暴則已，不問其內政…自從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堂堂正正，以仁義的武力，扶助滿洲國成立，並且舉國一致，尊重滿洲國獨立的尊嚴，三年來，內政熙平，外交公道，東方已漸露和平曙光。⁶³

鄭孝胥將傳統武德與救助鄰邦作為必要時容許使用武力、發動戰爭的前提，並將九一八事變的日軍訴造成協助滿洲國建國的仁義之師，既可重申傳統道德對滿洲國的重要性，同時也表達日滿親善的態度。這樣的說法不免有雙重標準之嫌，鄭孝胥理想中的王道，應該透過教化來提升人民的道，進而形塑整個國家，最終推己及人，推動志同道合的國度一起合作。同樣採用軍國民教育，並發起戰爭的義大利和日本，事實上都違背鄭孝胥理想中的王道主義。然而，相較於鄭孝胥對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轉變為敵視的態度，對於日本濫用武力的情況，鄭孝胥卻不得不為日本的行為自圓其說，以致於將日軍視為促進東亞和平的基礎。

第五節 小結

滿洲國對王道主義的詮釋，便是依據上述的脈絡下，由鄭孝胥任職文教部期間所塑造的。以鄭孝胥為首的滿洲國清遺民，基於對辛亥革命以來，傳統禮教日漸衰微，三民主義、共產主義等外國學說橫行於世感到不滿，加上九一八事變之後，為了在滿洲國建國之際，凝聚

⁶³ 彭壽，〈世界大戰與王道〉，《滿洲報》，1934年8月27日，第7版。

滿洲國國民的國民意識，鄭孝胥遂透過滿洲國文教部，運用國家的力量，積極推動王道主義。

在推動王道主義的過程中，鄭孝胥在文教部扮演的角色相當微妙，文教部的運作受制於日系官吏，但鄭孝胥與其說是日本樹立的傀儡，不如說是協力，甚或是互相利用的關係。確實文教部的人事、決策鄭孝胥都需要與日系官吏討論才能執行，文教部的宣傳也需要傳達日滿親善的內容。但鄭孝胥也擁有話語權，文教部所發行的刊物內容，基本上都是由鄭孝胥主導的王道主義相關論述。

藉由檢視《王道週刊》的內容，可以分析鄭孝胥對王道主義的詮釋及其宣傳方式。《王道週刊》雖在民營的《滿洲報》連載，卻是由文教部的職員負責主編，文章也多出自文教部職員和滿洲國清遺民。雖然《王道週刊》具有半官半民的性質，但與其說《王道週刊》是滿洲國文教部的官方刊物，不如說是鄭孝胥的王道主義宣傳刊物，事實上《鄭孝胥日記》中透露出鄭孝胥與擔任主編的彭壽、程克祥與鄭孝胥有著深厚的私人關係，鄭孝胥也會在《王道週刊》的文章在刊登前加以檢視，並資助《王道週刊》。這也意味著《王道週刊》的命運與鄭孝胥的仕途密不可分，當鄭孝胥卸任文教部，喪失支持的《王道週刊》也隨即斷炊。

《王道週刊》既然由鄭孝胥支持，文章的內容也就呈現出鄭孝胥理想中的王道主義。鄭孝胥的王道主義呈現出對舊有政治秩序、傳統禮教的想像，並以此貶抑民國以來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的混亂局面。而以王道主義建立的滿洲國，即可用「撥亂反正」來呼喚起人民對於溥儀、滿洲國，及日滿親善的認同。

在鄭孝胥進行所謂撥亂反正的同時，對於同樣統合國民意識，反對共產主義的法西斯，卻有著曖昧的態度。在宣傳王道主義的過程中，鄭孝胥不免要將王道主義與其他外國學說進行比較，藉此凸顯王道主義的優越性。但是，鄭孝胥卻在論述法西斯時，多次表現出對墨索里尼的推崇。鄭孝胥認為致力於恢復羅馬的墨索里尼，就如同積極參與復辟大業的自己。

不過，法西斯對鄭孝胥而言，終究不適合在滿洲國實行。鄭孝胥

認為法西斯過度追求富國強兵，用武力鎮壓異端邪說的方式，容易招致各國進行軍備競賽，以致於演變成世界大戰的危局，當墨索里尼派遣義大利軍隊入侵衣索比亞，似乎能夠應證鄭孝胥對法西斯的評價。而鄭孝胥理想中的王道主義則採取用教化的方式，透過教育提升國民的道德，進而向其他國家推廣，藉此達到世界和平的境界。

儘管鄭孝胥宣傳王道主義對世界和平的貢獻方面可說是不遺餘力，但鄭孝胥也意識到當前軍備競賽的局面已經無法消弭。因此鄭孝胥轉而提倡將戰爭的正當性建立在傳統道德，強調強國發動戰爭應該以保護弱國為目的，在戰爭的過程中也要盡量避免牽連無辜的民眾，如此一來強國也能獲得輿論的支持。

鄭孝胥越是將王道主義與世界和平的論述連結的越深，在面對日本採用軍國主義，對外武力擴張時，鄭孝胥的宣傳就顯得越來越無力。為提倡日滿合作的重要，鄭孝胥也將日軍塑造成協助滿洲國實行王道主義的仁義之師。如此一來，既可為滿洲國實行王道主義尋求正當性，又可為日軍在滿洲國大肆擴張的行為自圓其說。

在《王道週刊》的論述中，實行王道主義為滿洲國消滅異端邪說，重建傳統禮教的不二法門。在滿洲國文教部的宣傳中，滿洲國的優越性在於道德教化，而不在於軍事、經濟方面的成就。這樣的描述姑且不論傳統禮教是否符合滿洲國民眾的需求，滿洲國是否真如宣傳中所描述的那樣以教化優先，以和平為宗旨呢？無論如何，滿洲國清遺民在滿洲國政治體制之下，並沒有政治實力，政治作為皆仰賴與日本協力。因此，關於滿洲國反共實際上究竟是透過王道主義教化，抑或是透過其他手段，仍有進一步探究的必要。

第三章、王霸合作與日滿一體的轉化

滿洲國的政治權力，基本上由日本關東軍掌握。當滿洲國宣傳王道主義的過程中，為了正當化日本在滿洲國的活動，將日滿親善融入王道主義的論述中，對亟需日本協助復辟的滿洲國清遺民而言是不可或缺，也是不得不作的妥協。

鄭孝胥任職滿洲國文教部期間，不僅人事選擇、政策規劃都需要與日系官吏討論，所執行宣傳王道主義的活動也需要加入提倡日滿親善的儀式。儘管鄭孝胥宣傳王道主義的過程中，力主排斥透過愛國主義教育、軍國主義教育在滿洲國實行。但是面對同樣實行軍國主義，甚至主動挑起戰爭的日本，卻不得不在日滿親善的壓力之下，嘗試正當化日本的作為。

在滿洲國清遺民正當化日本作為的論述中，多將日本視為協力者的角色，並淡化其軍事化的色彩，強調日滿兩國在道德方面的一致性。在現實上又無法忽視日軍在滿洲國的活動，於是鄭孝胥選擇透過王霸合作的論述，提倡王道滿洲與霸道日本的合作。

另一方面，鄭孝胥的論述也隱含著日滿差異的思想，對關東軍而言，有將滿洲國從日本統治中獨立的風險，不僅鄭孝胥在政治上受到關東軍的排斥，也進而影響王道主義在滿洲國的宣傳。而王道主義的論述，對溥儀本身而言，並不足以建立皇帝的權威，進而開始排斥滿洲國清遺民，與日本尋求更加緊密的合作，企圖強化滿洲國皇帝的權威。而在王道主義轉化為日滿一體的過程中，清遺民的影響力如何淡出，溥儀的權威又有那些變化呢？

本章將從王霸合作的論述開始，整理滿洲國清遺民對王道主義的塑造，如何與日滿合作的論述互相結合；接著論述清遺民勢力在滿洲國政治的退場過程，分析溥儀本身推動清遺民勢力淡出政治的過程中，所考量的因素。最後，將試著從溥儀在日滿一體的角色，考察溥儀的權威在日滿一體論述中的變化。

第一節 滿洲國清遺民與王霸合作

日本的武力對企圖復興傳統禮教、復辟清朝的滿洲國清遺民而言，一直都是無法忽視的存在。在理想上，日本對於滿洲國清遺民而言是

協助重建傳統道德秩序的友邦，而在現實上日本的窮兵黷武，干涉滿洲國內政的情況，也讓滿洲國清遺民對於如何定位和日本之間的關係，變得曖昧不明。就連原先力主協力日本的羅振玉也在《集蓼篇》中表達對現實日滿關係生變的無奈：

乃恭迓聖駕蒞遼後，不意于政體忽生枝節。事機不順，內咎寸衷。
冬春間遂病呃逆…乃臘月廿八聖駕臨視…予當時紀恩詩有「敢言
捧日心無貳，妄冀回天事轉歧」語，蓋紀實也。¹

羅振玉冀望日本協助溥儀復辟，以挽救他心目中世衰道微的中國，然而現實的政治發展卻出乎羅振玉的意料之外，滿洲國不僅採行執政制，而非帝制，權力也幾乎由日本關東軍把持。即便羅振玉在滿洲國位居監察院長的地位，與溥儀的關係也相當深厚，羅振玉身為監察院長的權力卻處處受到日本的限制。1935年5月20日韓雲階（1894年—1982年）被選為擔任新京特別市市長的人選²，韓雲階在擔任黑龍江省省長期間卻曾因賣官、販賣鴉片遭到羅振玉彈劾而一度去職，羅振玉為此稱病辭職，溥儀亦向南次郎表達對若起用韓雲階的可能會招致羅振玉的不滿，但南次郎基於韓雲階對穩定地方治安的需要，仍重新起用韓雲階，監察院的彈劾成為一紙空文。³「妄冀回天事轉歧」可謂一語道破滿洲國清遺民在對日協力的心態，原先日滿合作，重新建立傳統道德秩序的理想，在日本關東軍的壓力下，清遺民的政治作為可謂是處處受限，就連積極參與滿洲國的羅振玉，對日滿合作的關係也逐漸轉為失望。

而日滿合作關係變質的過程，也體現在滿洲國清遺民的王道主義論述的變化。王道在傳統儒家的政治理念中，要求君主以仁義道德為

¹ 羅振玉，〈集蓼編〉，收入於羅繼祖編，《羅振玉學術論著集》，第11集，頁78-79。

² 林出賢次郎，〈嚴秘會見錄〉，1935年5月20日，《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第一，未標頁碼。

³ 林出賢次郎，〈嚴秘會見錄〉，1935年5月23日，《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第一卷，未標頁碼。

基礎，在政治上實施善政。在傳統儒家的論述中，王道往往與法家「以力假仁」的霸道形成對比。⁴正如林志宏所呈現的，王道事實上也是一種「被發明的傳統」，來自傳統詞彙的「王道」在歷經近代日本漢學家、中國政治家們賦予了現實的意義之後，到了滿洲國已經呈現為極為複雜，內容多樣矛盾的面貌⁵。

為了合理化日軍在滿洲國的活動的現實，滿洲國清遺民也在王道主義論述中，試圖從傳統儒家論述尋求思想資源，如1934年12月25日，鄭孝胥在《王道週刊》刊登〈王霸合作〉一文：

四十年來以來，亞洲南見侵於歐美，北見侵於俄，其不已者幾希矣。幸而日本崛起，尊王攘夷，力求富強，而後日俄一戰，暫阻南北之侵。雖與歐美爭霸，其勢甚孤，故霸業既成，而兵甲難息也…滿洲得日本之助力，可以安集其人民，日本亦得滿洲之興，蓋可以取信於天下，王霸合作之制已見於此合。歐美亞洲危機之潛伏者多矣，得日本而爭霸者或將知難而引退；得滿洲而好戰者或將畏禍而降心。⁶

在鄭孝胥的論述中，傳統儒學中應該壁壘分明的王道與霸道，因應日滿合作的需要，而展現出合作的新風貌。在王霸合作的概念中，亞洲的危機因為日本爭霸而有所減緩，但日本也因爭霸而與歐美交惡，故需要提倡王霸合作，讓滿洲國得到日本的協助，對日本的國際信用的提升亦有所幫助。這樣的論述，對於積極提倡王道的滿洲國而言，

⁴ 「王道」一詞出自於《尚書·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王道的概念經過《孟子·公孫丑上》：「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加以詮釋，成為儒家思想中在上位者為政的準則。

⁵ 林志宏，〈王道樂土—清遺民的情感抵制和參與「滿洲國」〉，頁82-83。關於「被發明的傳統的概念」，詳見Hobsbawm, Eric,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 in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6.

⁶ 鄭孝胥，〈王霸合作〉，《滿洲報》，1934年12月25日，第7版。

無疑是更加退縮，將滿洲國視作日本稱霸的媒介，將傳統儒家應該排斥的霸道之說置於王道之前。鄭孝胥對王道主義論述的變化，也為日後滿洲國由王道主義轉向日本皇道埋下伏筆。

鄭孝胥在論述王道的過程中，對於日本軍事化的行為的詮釋，往往將其視為王道主義論述的例外情況。1933年3月26日，關東軍司令部顧問宇佐美寬爾（1884年—1954年）向鄭孝胥提出王道不能廢兵的主張，鄭孝胥則答道：

若滿洲國實行王道，日本以不去兵而倡王道，則天下嗜殺者或不能逞矣。⁷

周明之認為鄭孝胥的王道主義論述對日本軍事化用「武裝王道」的論述將其合理化，不僅源自於鄭孝胥親日的態度，更代表鄭孝胥有意用日本的武力消滅中國，才有讓中國再生的可能⁸。

無論是王霸合作，或是武裝王道的論述，雖然都呈現出鄭孝胥既不反對日本軍事化，也沒有譴責日本實行霸道，不過對於滿洲國本身，鄭孝胥仍然堅持其王道主義本位，並沒有要讓滿洲國走上軍事化的道路，且鄭孝胥看待實行霸道的日本，仍然將其當作合作者的角色。對鄭孝胥而言，在實現日滿合作實現王道主義的理想方面，滿洲國本身應該專注於道德教化的任務，而軍事事務則應該委託日本。

在鄭孝胥對日滿合作的理想中，在滿洲國任職的官員，也必須具備良好的道德，鄭孝胥也在1934年2月22日對菱刈隆傳達對滿洲國地方官僚腐敗的憂慮：

滿洲的馬賊、土匪等，由於日本軍的努力，現在已經絕跡了，但是又逐漸增加了一種土匪…地方上的土豪劣紳等拉攏縣知事，利用官憲的力量，搶奪民間財富。⁹

⁷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1933年3月26日，頁2450。

⁸ 周明之，《近代中國的文化危機：清遺老的精神世界》，頁249。

⁹ 林出賢次郎，〈菱刈大使會談要領（第一号）〉，1933年12月2日，《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

對此，菱刈隆回應：「要殲滅全部的惡黨是不可能的，所謂的好國家只不過壞蛋比例較少罷了。¹⁰」

對日本關東軍來說，鄭孝胥理想中的滿洲國，事實上是不可能實現的，鄭孝胥王道滿洲與霸道日本的協力模式，儘管放棄了滿洲國對軍事的主導權，另一方面，鄭孝胥對於滿洲國國家意識的塑造，宣傳滿洲國文化教育，乃至於以道德為理由，卻要求關東軍在滿洲國人事權方面做出一定程度的讓步。

鄒金喜認為在鄭孝胥的心目中，日本的王道思想並不足，惟有日本幫助滿洲國施行並提倡王道主義，才能提升日本王道思想的內涵，進而達到道德聯合的境界，更能進一步聯合世界，如此一來便不需要用武力征服世界，就能將世界變成王道樂土¹¹。這也意味著對鄭孝胥而言，滿洲國在滿日協力的結構中仍然具有獨立性，應當在維護傳統道德方面作出積極的貢獻，而日本則是滿洲國對等的合作者，若要達成鄭孝胥王道主義的終極目標，甚至需要日本接受王道主義思想，如此一來滿洲國反而成為滿日協力架構中的主導者。山室信一的研究認為，鄭孝胥在滿洲國獨立性的表現，使得關東軍擔憂若繼續由鄭孝胥擔任總理，難保日後滿洲國不會脫離日本的掌握¹²。駒込武的研究更進一步指出，滿洲國推行的王道主義，對臺灣、朝鮮的殖民統治而言，不啻是一大威脅，有必要將王道導向皇道¹³。也因此撤換鄭孝胥，成為日本關東軍在滿洲國改行帝制後的首要任務，而撤換鄭孝胥過程中，溥儀自己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微縮資料）》，第十卷，未標頁碼。

¹⁰ 林出賢次郎，〈菱刈大使會談要領（第一号）〉，1933年12月2日，《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第十卷，未標頁碼。

¹¹ 鄒金喜，〈從「此邦俗亦偷」到「今日日光輝萬國」：鄭孝胥日本觀的轉變歷程〉，頁84-85。

¹² 山室信一，《キメラ——滿洲国の肖像（増補版）》，頁218-219。

¹³ 駒込武，《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6），頁280。

第二節 鄭孝胥去職與清遺民勢力的衰落

早在 1933 年 7 月 6 日，溥儀就在與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1868 年—1933 年）討論滿洲國執政府人事問題的會議中，向武藤表達對鄭孝胥的不滿：

鄭國務總理人品崇高，學識淵博，確實是個好人。只是其理想太過高遠，也就是其主張難以實行。¹⁴

在 1935 年 5 月 3 日，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與鄭孝胥談論內閣改造的問題，鄭孝胥推薦間島省長蔡運升（1879 年—1959 年）接任國務總理¹⁵，不過在 5 月 14 日南次郎的回覆中，卻以暫緩內閣改造為由，婉拒鄭孝胥的建議¹⁶。在討論內閣改造的過程中，溥儀察覺到關東軍對鄭孝胥的不滿，因而在 1935 年 5 月 18 日向日本駐滿洲國大使南次郎提出撤換鄭孝胥的意見：

如果對關東軍或對日本的對滿洲政策有不滿之處，應堂堂正正地向關東軍和日本政府提出來商量…然而他在應該發言的場合卻一言不發，卻在報紙上透露出內心的不滿。身為總理大臣而言是頗不謹慎的行為…我打算此次內閣改組時，讓他暫時退職去休養才好。

17

¹⁴ 林出賢次郎，〈元会録〉，1933年7月6日，《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第五卷，未標頁碼。

¹⁵ 林出賢次郎，〈嚴秘会見録〉，1935年5月3日，《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第一卷，未標頁碼。

¹⁶ 林出賢次郎，〈嚴秘会見録〉，1935年5月14日，《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第一卷，未標頁碼。

¹⁷ 林出賢次郎，〈嚴秘会見録〉，1935年5月18日，收入於林出賢次郎，《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第一卷，未標頁碼。

溥儀主張撤換鄭孝胥的意見，意味者鄭孝胥的王道主義論述與滿洲國獨立自主的想法，在現實上已然成為日滿合作的障礙，鄭孝胥理想中應在滿洲國實行的王道，甚至是王霸合作的日滿關係，已經被日本關東軍揚棄，而溥儀自己也心知肚明，因而在鄭孝胥與日本關東軍之間，選擇放棄鄭孝胥，進而深化與日本關東軍的協力。袁漸達認為鄭孝胥去職可以說是關東軍與溥儀共同決定的結果¹⁸。

溥儀有意疏遠滿洲國清遺民的情況，不僅表現在撤換鄭孝胥的事件，在 1935 年 7 月 13 日，溥儀也向南次郎表達對於羅振玉職務安排的意見：

羅振玉作為監察院長適合適的，但如果將他調往他處，由別人代替也可以。但要特別重視羅監察院長，給現職的羅院長特別的恩惠，羅振玉與監察院之間的關係特別深，將來若監察院有必要縮編與改革，就不至於產生恐懼。現在同時給羅振玉、鄭孝胥兩個人恩賞，而鄭孝胥已經退職，這時給鄭恩惠，我想不是太難處理。¹⁹

儘管溥儀決定給予退休的鄭孝胥恩賞，表達遺老重臣對滿洲國建國的貢獻，但是對於滿洲國清遺民的政治訴求，溥儀已經決定與他們保持距離，儘管羅振玉與監察院之間的連結甚深，但溥儀也極力避免讓日本對羅振玉留下其地位不可或缺的印象，進而像鄭孝胥任職國務院總理時一樣，成為日滿合作的障礙。

內閣改制後，溥儀也認識到滿洲國清遺民的政治勢力，也不可避免的受到新興協力者的競爭，因而在植田謙吉（1875 年—1962 年）繼任日本駐滿大使後，向植田謙吉表達期望遏止在宮內府挑戰

¹⁸ Jianda, Yuan, *Chinese Government Leaders in Manchukuo, 1931-1937*, p.87.

¹⁹ 林出賢次郎，〈嚴秘會見錄〉，1935年7月13日，《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第一卷，未標頁碼。

遺老權威的年輕野心家²⁰。正如 Timothy Brook 對協力者的研究，協力者之間互相競爭在占領政治中十分普遍，協力者之間的競爭能夠讓占領者順利招徠他們進行新政權建設，樹立政權正當性²¹。1937年5月3日，植田謙吉以政府改革的名義告知溥儀廢除文教部、監察院，並要求參議府參議寶熙（1868年—1942年）、胡嗣瑗退職²²，滿洲國清遺民的政治影響力逐漸衰落。滿洲國清遺民的政治影響力衰落，可以說是溥儀默許的結果，那麼在鄭孝胥王霸合作之外，溥儀理想中的日滿協力模式究竟為何？滿洲國清遺民強調的傳統道德的優越性被溥儀放棄後，溥儀如何重新詮釋日滿合作的基礎，並在新的協力模式中，提升自己身為滿洲國皇帝的權威。

第三節 日滿一體與提升滿洲國皇權

在滿洲國實權皆由關東軍與日系官吏掌握的情況下，鄭孝胥推動的王霸合作模式，無法讓溥儀獲得身為皇帝的權威。既然無法藉由提倡滿洲國的獨立性，從日本獲得更多權力，溥儀遂反其道而行，而在滿洲國實行帝制之後，溥儀隨即在1935年4月訪問日本，在訪問日本的過程中，溥儀欽羨於日本人對於天皇的崇拜，遂企圖在滿洲國效法日本天皇制度，建立滿洲國皇帝的權威。溥儀還意識到提升滿洲國皇帝權威，必須建立在日滿親善的前提上，將滿日臣民對天皇的忠誠，藉由滿日親善轉化為對滿洲國皇帝的忠誠²³，在訪日行程結束後，溥儀也在滿洲國宮內府向滿洲國群臣傳達日滿

²⁰ 林出賢次郎，〈嚴秘會見錄〉，1936年6月21日，《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第一卷，未標頁碼。

²¹ Brook, Timothy, *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p. 159.

²² 林出賢次郎，〈嚴秘會見錄〉，1937年5月3日，《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第一卷，未標頁碼。

²³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頁259。關於溥儀的訪日行程，詳見林出賢次郎，《扈從訪日恭紀》，（新京：國務院總務廳情報處，1936年）。關於溥儀在訪日過程中對日滿關係心態的轉變，亦可見於黃昱翰，〈重把乾綱握？——滿洲國帝制之成立與時人認識〉，頁71-72。

合作的重要性²⁴。

溥儀 1935 年 5 月 2 日，溥儀召集滿洲國各省長，在京官員，舉行宣召儀式，並在隔日在滿洲國各大報紙頒布〈回鑾訓民詔書〉，向滿洲國民宣示日滿兩國不可分的關係。

朕與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體。爾眾庶等，更應體仰此意，與友邦一德一心，以奠定兩國永久之基礎，發揚東方道德之真義。則大局和平，人類福祉，必可致也。²⁵

鄭孝胥亦在同日訓令各省對詔書「努力宣講，昭示勿遺」²⁶。而在詔書頒布後，滿洲國官方也在全國各地舉行宣傳活動。但是黃昱翰的研究指出，當時的滿洲國民眾，大多只能意識到〈回鑾訓民詔書〉中，強調日滿親善的面向，對於溥儀企圖提升皇帝權威的嘗試，則沒有表現出有所認識的跡象²⁷。

至於對關東軍而言，溥儀的欲藉由日滿一體，提升皇帝權威的企圖，確實有所認識，南次郎在張景惠就任國務總理的會談中就提及溥儀的指示：

皇帝陛下從日本回來不久後就對我說：「如果有滿洲人對日本抱持反感不利於日本者，對朕而言就是不忠的國民；如果日本人抱持惡意不利於滿洲國者，就是不忠於日本天皇陛下。」…正是有了這個，我相信兩國人民之間就會做到真正的和睦相處。²⁸

²⁴ 愛新覺羅·溥儀，〈訪日後滿洲國高官ニ對スル皇帝陛下御諭示〉，1935年5月4日，收入於林出賢次郎，《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第一卷，未標頁碼。

²⁵ 〈詔書〉，《大同報》，1935年5月3日，第2版。

²⁶ 〈總理大臣訓令各省，努力宣講昭示勿遺〉，《大同報》，1935年5月3日，第2版。

²⁷ 黃昱翰，〈重把乾綱握？——滿洲國帝制之成立與時人認識〉，頁75。

²⁸ 林出賢次郎，〈嚴秘會見錄〉，1935年5月21日，《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第一卷，未標頁碼。

對關東軍而言，溥儀欲藉由將自己與天皇精神一體，要求日本人與效忠日本天皇一樣效忠自己的論述，基本上並沒有表現出強烈的反對，相對的，關東軍更強調日滿親善的部分。山室信一的研究更進一步指出，關東軍反而針對溥儀的論述，提出自己身為天皇代理，有權指導溥儀的說法，最終溥儀與關東軍都尋求將自己與天皇更加同一化，企圖獲得更高的權威，也是導致溥儀日後放棄清朝祖宗，轉而將日本神道當作滿洲國國教的原因²⁹。駒込武也認為〈回鑾訓民詔書〉的頒布象徵日本天皇制的意識形態開始移植到滿洲國，進而使滿洲國的國家政治理論和意識形態日本化，並被納入日本帝國的政治秩序理論之下。

儘管在溥儀追求日滿一體的結果是完全喪失滿洲國的獨立性，在此過程中，溥儀也藉由天皇的名義，在振興儒學方面向關東軍要求更多資助：

文教部制定的初等教育教材，必須充分加入儒教精神，這樣就要給文教部增加經費，制定出好的教科書…我與大日本天皇陛下會談時，天皇陛下曾說過，日本自廢除孔教後，由於給國民精神上帶來不好的結果，因此，今後日本一定要大力推行孔教，這同滿洲的建國精神也是一致的。³⁰

對於溥儀訴諸天皇的名義，讓關東軍給予滿洲國文教更多資助的要求，南次郎也欣然接受，另外還稱許張景惠透過修建孔廟防止被赤化的做法。從會談的內容來看，溥儀將推行儒學的訴求，藉由將自己與日本天皇同一化的方式向關東軍提出，確實能夠讓關東軍更容易接受，不過關東軍之所以能夠接受溥儀的資助儒學的提議，在日滿一體的論述之外，也考量到防共的因素，南次郎在接受溥儀資助儒學的過程中，同時認為推廣儒學有助於防共，在日滿親善與防共雙重考量下，南次郎選擇接受溥儀的提議。換言之，溥儀所謂「如果有不忠於滿洲

²⁹ 山室信一，《キメラ——滿洲国の肖像（増補版）》，頁231-232。

³⁰ 林出賢次郎，〈嚴秘會見録〉，1937年7月3日，《林出賢次郎関係文書（微縮資料）》，第一卷，未標頁碼。

國皇帝的，就是不忠於日本天皇，有不忠於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於滿洲國皇帝」³¹的政治邏輯，在實際運用上，與其說是直接透過與日本天皇同化，進而提高滿洲國皇帝權威，不如說是將訴求放置在日滿共同利益的前提下，進而說服關東軍接受，關東軍主導滿洲國的權力結構並沒有太多改變。

第四節 小結

滿洲國清遺民的在宣傳王道主義的過程中，標榜傳統道德的優越性，現實上面對以武力在滿洲國擴張，實行霸道的日本，卻無法用王道主義來合理化日滿之間的關係。為了在王道主義論述中，融入日滿親善，鄭孝胥的王霸合作論述，嘗試在論述中，既肯定滿洲國實行王道主義，又不否定日本的霸道對滿洲國建立的貢獻。鄭孝胥的論述只是將日滿之間原有的差異呈現，在鄭孝胥的心目中，日本與滿洲國是合作的關係，仍然是對等的存在。

鄭孝胥對日滿關係的論述，對於企圖建立日主滿從秩序的關東軍而言，不啻於是一種威脅。同時，溥儀自己也對鄭孝胥道德理想崇高，施政難以實行的情況感到不滿，加上溥儀在訪問日本的過程中，受到日本天皇制的影響，既而思考利用日滿親善，達到提高滿洲國皇帝權威的可能性。在關東軍與溥儀的雙重壓力下，滿洲國清遺民，逐漸淡出政治舞台。

溥儀企圖藉由將自己與天皇的關係緊密結合，將日本人對天皇權威的崇拜，轉化為對自己的忠誠。從《盛京時報》關於帝制宣傳的內容來看：

三千萬民眾，爭先恐後，向政府請願或建議……對於溥儀執政，速就帝位之渴望，日益高漲，呈人心歸一之勢；而帝制運動，遂因之出現。³²

³¹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頁259。

³² 〈白山黑水普天率土 帝制運動方興澎湃〉，《盛京時報》，1934年1月12日，第4版。

滿洲國宣傳是將在帝制與滿洲國的民意支持互相結合，當溥儀在滿洲國引進天皇制，無疑是將滿洲國帝制的正當性從民意，強行轉移到日滿親善，然而這樣的轉換不僅沒有讓溥儀如願獲得更高的權威，無論是民間輿論，或是日滿官吏，都只會意識到溥儀推動日滿親善的一面。更會造成溥儀為了獲取更高權威，反而造成自己和滿洲國更加依附日本的後果。

即便溥儀以天皇的名義，成功從關東軍獲取到部分利益，也不見得是溥儀成功在滿洲國移植天皇制的結果。關東軍仍然會考量溥儀的訴求，是否符合雙方共同利益，而防共往往是關東軍接受提議的考量因素之一。

對於溥儀來說，要提高皇帝權威，就必須加強日滿之間的關係，為了促進日滿雙方的合作，原來滿洲國清遺民所提倡的道德合作，已經不足以滿足日滿親善的需要，此時，過去被鄭孝胥所排斥的軍事化、日滿軍事合作，成為溥儀在日滿合作所關心的重點。

第四章、日滿親善與合作防共

在溥儀將滿洲國的建國精神，從王道主義轉向強調日滿親善之後，不僅企圖提高皇帝權力，也改變鄭孝胥在日滿合作中，強調日滿共同道德的方針，滿洲國清遺民，乃至於滿洲國文教部職員，對於用王道主義統合滿洲國思想的目標，基本上重視的是王道主義的宣傳工作，藉由強調滿洲國在推動傳統儒學的貢獻，建立溥儀統治滿洲國的正當性，而日本的武力則擔任協助滿洲國的角色。日滿合作只體現在文教方面，這樣的協力模式對溥儀而言是不夠的，在宣傳滿洲國建國精神，塑造滿洲國正當性的同時，也必須提升皇帝的權威，並掌握滿洲國軍權。

在1935年訪日之後，溥儀將日滿親善與提升皇帝權力之間的關係緊密結合，而為了提升皇帝在滿洲國的軍事權力，溥儀也自然而然的期望能透過日滿軍事合作，掌握滿洲國軍事權力。不過，在滿洲國建立初期，滿洲國已經將軍事國防的主權，透過《日滿議定書》委託給日本，因此溥儀必須在《日滿議定書》的框架下，說服日本接受日滿軍事合作。

另一方面，而日本方面也意識到只依賴日本軍隊，實則難以負擔在滿洲國的軍事事務，對於共產主義的憂慮日益增加，也讓日本考量到讓滿洲國軍隊負擔部分國內治安任務的可能性。為此，如何在維持日主滿從的權力結構中，提升日滿軍事合作也是關東軍需要面臨的難題。防範共產主義的需求如何讓溥儀與關東軍如何達成共識，建立更加緊密的合作？日滿軍事合作的過程中，對溥儀的權威又產生哪些變化呢？

本章將探討防共如何成為溥儀與關東軍提升日滿軍事合作的基礎。本章在一開始會先探討溥儀對日滿軍事合作的認知，藉由溥儀與關東軍的會談，呈現如何在《日滿議定書》的規範中，說服關東軍提升日滿軍事合作，接著針對關東軍對防共，以及維持滿洲國治安的論述，分析關東軍對日滿軍事合作的態度，最後透過海拉爾事件的個案分析，呈現鎮壓反滿抗日的「思想對策」進行的過程，並透過溥儀對海拉爾事件的不同論述，試著詮釋溥儀在日滿合作中的角色。

第一節 溥儀與日滿軍事合作

在 1935 年 5 月的內閣改組，不僅標示著滿洲國清遺民逐漸淡出權力中心，也代表溥儀企圖藉由更加親日的施政方針，來換取自己身為滿洲國皇帝權威的提升，與此同時溥儀也冀望在日滿兩國在軍事方面能夠有更密切的合作。早在 1928 年東陵事件後，溥儀就認識到掌握軍權的重要性，因而積極籌畫安排宗室子弟赴日學習軍事，並在 1929 年三月派遣胞弟溥傑（1907 年－1994 年）、內弟潤麒（1912 年－2007 年）赴日就讀士官學校。¹南次郎也多次向溥儀傳達兩人的學習狀況：

這一次，溥傑和潤麒兩人順利從士官學校畢業。特別是溥傑先生，成績實在是非常優秀。²

除了派遣宗室赴日學習軍事，溥儀也關注滿洲國軍與日軍合作的問題，並且自 1935 年 9 月起安排軍政部最高顧問佐佐木到一（1886 年－1955 年）為自己講解有關滿洲國軍制及軍事現狀，內容包括滿洲帝國軍制上的特質、解說陸海軍條例、部隊編制及裝備、教育訓練機關、軍官士兵的素質、軍用通信、馬政、海軍、整備計畫與滿日兩軍協同作戰等課程³。

在 1932 年 9 月 15 日所確立的《日滿議定書》中，已經有如下的宣言確立日軍主掌滿洲國國防的法源依據：

日本國及滿洲國，確認對締約國一方之領土及治安之一切威脅，同時亦對 締約國他方之安寧及存立之威脅，兩國相約有共同防衛之

¹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頁174。

² 林出賢次郎，〈敵秘會見録〉，1935年7月3日，《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第一卷，未標頁碼。

³ 佐佐木到一，〈聖旨ニ基ツキ本日以降滿洲帝國ノ軍制並軍事ノ現狀ニ就キ概ネ六面ニ互リ御進講申上ケ奉る〉，1935年9月，收入於李茂杰編、李學松譯，《溥儀與關東軍司令官絕密會談錄》，第17卷（北京：線裝書局，2015年），頁62-66。

責任，因此所要之日本國軍駐紮於滿洲國境內。⁴

在簽訂《日滿議定書》的同時，日滿間也簽訂了《日滿守勢軍事協定》⁵，解學詩的研究認為，透過上述兩條協定，日本軍隊不僅能夠在滿洲國自由行動，又能剝奪滿洲國軍隊的軍令權，關東軍並在滿洲國軍政部派遣軍事顧問，控制滿洲國軍隊，進一步掌握滿洲國軍政大權。⁶而根據軍政部軍事顧問佐佐木到一對溥儀的講義，佐佐木強調滿洲國軍隊的統帥權仍由皇帝負責，基於 1932 年簽訂的《日滿議定書》，滿洲國的國防委任日本負責，但是在國內治安警備的部分，則由日滿兩軍共同負擔⁷，因此溥儀對滿洲國軍事的關注，主要在關東軍與滿洲國軍合作剿匪的事務方面。

事實上，山室信一的研究也表明，滿洲國軍是在滿洲國官制與法規都沒有規範的情況下運作，在慣例上，軍政部大臣的命令需要經由軍事顧問的承認才能生效。⁸及川塚英的研究更進一步指出，滿洲國軍內的中下層軍官，日系軍官的人數隨著戰爭的進行有越來越增加的趨勢，這些日系軍官效忠於軍事顧問，而軍事顧問又直接聽命於關東軍司令官，日系軍官的增加也造成滿洲國軍內部時常發生日滿衝突的情況⁹。在滿洲國實施帝制之後，滿洲國軍的統帥權依法應該由皇帝總攬，不過條文只是為了維持獨立國的名義而已，實際上滿洲國軍的統帥權掌握在關東軍司令官手中¹⁰，溥儀在滿洲國軍事方面被限制在象徵性

⁴「御署名原本・昭和七年・条約第九号・昭和七年九月十五日ノ日滿議定書」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1877600、御署名原本・昭和七年・条約第九号・昭和七年九月十五日ノ日滿議定書（国立公文書館）。

⁵「日滿守勢軍事協定」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030502700、滿日守勢軍事協定書類 日滿守勢軍事協定書類 昭和7年9月15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⁶ 解學詩，《偽滿洲國史新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頁246-247。

⁷ 佐佐木到一，〈進講第一回〉，1935年9月，收入於李茂杰編、李學松譯，《溥儀與關東軍司令官絕密會談錄》，第17卷，頁67-69。

⁸ 山室信一，《キメラ——滿洲国の肖像（増補版）》，頁228-229。

⁹ 及川塚英，《帝国日本の大陸政策と滿洲国軍》（東京：吉川弘文館，2019），頁162。

¹⁰ 「第2章 滿洲国軍政及之が指導の現況／第1節 總説」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

的地位。

對溥儀而言，即便是象徵性的地位也不減自己對軍事的興趣，在張景惠接任國務總理後，張景惠也多次向溥儀報告日滿兩軍合作剿匪的消息：

張總理近期到各地出差，聽取了當地情況的報告，欣喜地看到治安形勢逐漸改善，在討伐土匪方面，日滿兩軍警協力融和的非常好，以吉林地區為例，日軍在吉林討伐的時候，把土匪追擊到森林裡，而耗盡了糧食之際，滿軍都感受到了日軍的困難，主動將自己的糧食提供給日軍。¹¹

相較於鄭孝胥任內，日本對滿洲國軍多抱持猜忌的態度，甚至經常繳械滿洲國軍武裝，張景惠卻能夠有效改善日滿雙方在軍事上的衝突，進而合作討伐土匪。Rana Mitter 認為張景惠之所以選擇與日本合作與張景惠的意識形態或信仰無關，張景惠的馬賊出身與軍事經歷促使張景惠傾向尋求更為強大的支持者，當獲得來自國民政府的支持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張景惠遂選擇與日本合作。¹²為促進日滿合作，張景惠並不像鄭孝胥一樣強調日滿兩國是基於共同道德而互相合作，張景惠更著眼於日滿雙方的利益，也不吝於將滿洲國的工礦原料、土地和糧食給日本徵購，換取日本在軍事、技術方面的支持。溥儀也承認張景惠在取悅日本的能力上，遠高於鄭孝胥¹³，不過溥儀對滿洲國軍的期望，並不止於協助日軍作戰而已，溥儀還多次向南次郎表達期望日本協助提升滿洲國軍素質的訴求：

ター) Ref.C13010028300、満洲国軍政の指導 昭和9年8月1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¹¹ 林出賢次郎，〈嚴秘會見録〉，1935年11月13日，《林出賢次郎関係文書（微縮資料）》，第一卷，未標頁碼。

¹² Mitter, Rana, *The Manchurian Myth: Nationalism,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 p. 91.

¹³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頁263。

現在的滿洲國軍因為國民教育程度低，所以軍隊素質也低，不足以達到使用文明的利器的水準。在討伐國內土匪的時候，也還達不到能夠利用文明利器的水準，但將來要提高素質，同日軍合作抗擊外敵，就不能不使用文明的利器了。¹⁴

溥儀說服日本協助訓練滿洲國軍的論述中，仍然將滿洲國軍隊的角色定位在協助日本軍隊作戰的附庸地位。但溥儀的論述中也傳達出他對滿洲國軍隊的期望，不僅止於負責處理滿洲國內的治安問題，還企圖讓滿洲國軍隊能夠對外作戰。溥儀的論述對日本而言，也確實具有一定程度的說服力，在植田謙吉繼任日本駐滿大使後，回覆溥儀滿洲國土匪討伐問題的內容中，也提及滿洲國軍隊討伐土匪的情況：

滿洲國軍隊在討伐土匪的過程中，戰鬥力有了很大的進步，但無論是在部隊素質還是在武器裝備方面，都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

15

同時植田謙吉也向溥儀說明滿洲國軍隊募集的概況，以及日滿兩軍互相合作的情形：

這次，吉林省在各縣抽調一定數量的地方青年，徵召為兵，就可以說是半徵兵制。各地日滿兩軍的融和都能夠順利進行，從吉林獨立守備隊的情況來看，發現司令部和兵營內都貼上了「日滿親善從守備隊做起」的標語。這種精神已經徹底貫徹在一般兵士的身上。¹⁶

¹⁴ 林出賢次郎，〈嚴秘會見録〉，1936年2月13日，《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第一卷，未標頁碼。

¹⁵ 林出賢次郎，〈嚴秘會見録〉，1936年6月1日，《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第一卷，未標頁碼。

¹⁶ 林出賢次郎，〈嚴秘會見録〉，1936年6月1日，《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第一卷，未標頁碼。

從溥儀與日本駐滿大使關於滿洲國軍隊的對話來看，溥儀理想中的日滿軍事合作則體現在日滿兩軍能否進行協同作戰，合力討伐土匪，甚至能夠對外作戰的問題上，因此重視滿洲國軍隊的素質和武器裝備的提升。另一方面，日本雖然認識到滿洲國軍隊在討伐土匪的貢獻，也同意滿洲國軍隊仍有提升武器素質的必要，但日本方面則更關注滿洲國軍隊日滿親善的意識，日滿軍事合作體現在向滿洲國民宣傳日滿親善，滿洲國軍隊應該成為日滿親善宣傳的榜樣。

為了促進日滿雙方在軍事上更加緊密協力，達到讓日本協助溥儀強化滿洲國軍隊的目的，溥儀在積極推動日滿軍事合作的過程中，必須要塑造日滿共同的軍事敵人。既然滿洲國軍的主要任務在與日本軍隊合作處理治安問題，那溥儀本身是如何看待滿洲國軍討伐的對象呢？在塑造日滿兩軍共同敵人的過程中，溥儀關注的討伐對象又有那些變化呢？為了釐清溥儀對日滿兩軍共同敵人的想像，有必要深入探討日滿兩軍中對於「共匪」的論述。

第二節 日滿合作與討滅共匪

在滿洲國建立初期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與溥儀就將防共當作日滿合作親善的基礎，在 1932 年 12 月 21 日的會談中武藤信義與溥儀表達出對東亞赤化的憂慮：

中國無條件同蘇俄恢復國交，不能不說那是中國的重大失策…今後中國共產黨將會更加兇猛…日本多年來為了防止東洋被赤化…也是為了東方民族的幸福…幸虧今年滿洲國成立以來，透過日滿兩國的合作，正在建立日滿中三國友善的基礎¹⁷。

對武藤信義來說，滿洲國的建立與防止東亞赤化密不可分，溥儀

¹⁷ 林出賢次郎，〈元会録〉，1932年12月21日，《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第五卷，未標頁碼。

也藉由反共的名義，促使關東軍在熱河戰役中對張學良勢力用兵：

張學良與蔣介石是中國和平及世界和平的障礙，如不將其討滅，是不能清除排外思想和共產主義的。¹⁸

在會談中，溥儀極力表現出對共產主義的敵視，也支持關東軍以反共的名義用兵，但是此時溥儀的態度，與其說是支持日滿軍事合作進行防共，不如說是利用防共的名義，獲得日本對自己在軍事和外交方面的支持。

事實上，正如 Rana Mitter 的研究，無論是張學良或是蔣介石，在滿洲國成立之前就積極反共，張學良也在 1929 年的中東路事件中與蘇聯發生軍事衝突¹⁹。滿洲國成立初期的反滿抗日成員，背後主要也是由張學良系統的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所支持²⁰。然而，為了合理化日滿合作防共的正當性，張學良和蔣介石也在滿洲國被塑造成防共不力的形象。溥儀向關東軍表現出反共意識，與關東軍深化協力的過程中，並無意考量民國是否反共的問題，而是以反共為藉口，促使關東軍在滿洲國投入更多資源。

此外，當大規模的抗日義勇軍已經逐漸被關東軍鎮壓，此時共產黨勢力，反而捲土重來，為此菱刈隆在 1933 年 12 月 2 日的會談中，向溥儀傳達對共產黨問題的憂慮：

討匪還做的不夠，我想今後還需要十年、二十年時間。儘管現在已經殲滅了大頭目，剩下的都是各處沒有主義的土匪，惟有在間島的

¹⁸ 林出賢次郎，〈元會錄〉，1933年1月2日，《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第五卷，未標頁碼。

¹⁹ Mitter, Rana, *The Manchurian Myth: Nationalism,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 p. 49.

²⁰ Mitter, Rana, *The Manchurian Myth: Nationalism,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 p. 132.

共匪，性質惡劣，難以處理。²¹

對於菱刈隆的擔憂，溥儀對日滿軍事合作剿共的問題，還沒有表現出積極的態度。溥儀認為及早制定滿洲國教科書，並要求關東軍在滿洲國多增設兵營，才能有效遏止土匪問題²²。儘管此時溥儀意識到共產黨對滿洲國治安的危害，也強調武力鎮壓的必要性，但溥儀的態度還是將處理共產黨的責任委由日軍，對於日滿合作的關心還是在文教方面，而在日滿軍事合作的態度上仍然十分曖昧。

直到 1935 年 5 月溥儀訪日後，溥儀逐漸關注日滿軍事合作的議題，並在 1935 年 5 月 28 日向來滿洲國視察的日本陸軍大臣林銑十郎（1876 年—1943 年）傳達日滿加強軍事合作的意願²³，而南次郎隨即在同年 6 月 4 日向溥儀傳達林銑十郎對日滿軍事合作的意見：

日滿關係既然發展至今，獨立守備隊就不應只在鐵路沿線，而是要維持一定範圍的治安，使師團的兵力與滿洲國軍隊互相合作，還要專門防備外國…蘇聯方面入侵我方抓人，我方也有一樣的行為，還有蘇聯利用匪賊等問題…²⁴

在林銑十郎的眼中，日滿軍事合作還有加強的必要，除了要在內部治安方面加強合作，更進一步延伸到防範外敵的部分。而蘇聯的角色在林銑十郎看來，不僅是日滿在邊境衝突上需要防範的外敵，也將蘇聯當作支持土匪，危害滿洲國治安的敵人。南次郎也多次在與溥儀

²¹ 林出賢次郎，〈菱刈大使會談要領（第一号）〉，1933年12月2日，《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第十卷，未標頁碼。

²² 林出賢次郎，〈菱刈大使會談要領（第一号）〉，1933年12月2日，《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第十卷，未標頁碼。

²³ 林出賢次郎，〈嚴秘會見録〉，1935年5月28日，《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第一卷，未標頁碼。

²⁴ 林出賢次郎，〈嚴秘會見録〉，1935年6月4日，《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第一卷，未標頁碼。

的會談中，藉由蘇聯資助滿洲國土匪的案例，向溥儀傳達出對蘇聯的不信任；

在滿洲國內，匪賊被日滿軍追趕到國境，只要揮動紅旗，就會被允許進入俄國領土，還發現某匪賊秘密接受俄國指令騷擾地方…²⁵

除了在會談中，直接向溥儀表達關東軍反共的態度，在溥儀接受佐佐木到一軍事講習的課程內容中，也將日、中資助共產黨，當作土匪活動在滿洲國越來越活躍的原因（見表 3-1）。

《滿洲國史》的研究指出，蘇聯對滿洲的工作分為兩個途徑：其一是由共產國際，指示中國共產黨，再由中國共產黨向中國共產黨滿洲省委員會發出指示信²⁶，進而指揮在滿洲的共產軍；其二則是由蘇聯國家機構，如克格勒、極東赤軍、領事館等機構直接進行赤化工作²⁷。

在加藤豐隆的研究中，以東北人民革命軍為核心的共產主力勢力，在 1935 年受到日滿軍警的不斷討伐之下，逐漸瓦解成小部隊，但共產黨的小部隊反而在強力鎮壓下，為了自衛而互相合作，共產黨勢力也能夠為了共同戰線的目標，進行統一下層戰線的工作，積極吸收其他團體。儘管在吸收其他團體的過程中時常發生衝突，但在共產勢力的吸收與軍警鎮壓的雙重壓力下，張學良殘餘勢力的「政治匪」與地方土匪，不得不在「共匪化」和被剿滅之中選邊站，而共匪相較於政治匪與土匪更有思想，也更重視宣傳²⁸。

關日昇更進一步指出，北滿地區原先由農村有力人士和土匪所掌

²⁵ 林出賢次郎，〈嚴秘會見錄〉，1935年7月13日，《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第一卷，未標頁碼。

²⁶ 〈中央給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論滿洲的狀況和我們黨的任務〉，1933年1月26日，收入於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九冊（1933）（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21-45。

²⁷ 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編，《滿洲國史 各論》（東京：滿蒙同胞援護會，1971），頁305-310。

²⁸ 加藤豐隆，《滿洲國警察小史—（第一編）滿洲國権力の實態について》（松山：滿蒙同胞援護會愛媛県支部，1970），頁39。

握的馬車運輸經濟，在滿洲國的建立後逐漸受到破壞，因此農村有力人士也尋求與中共合作，而中共除了將馬車運輸用於經濟活動外，也用於軍事運輸，使得武器裝備大幅提升，進而有能力收編滿洲國各地的武裝勢力。²⁹在反滿抗日勢力不斷被共產黨吸收的情況下，剿滅共匪成為關東軍最優先處理的治安問題。

由於關東軍不斷強調防共的重要性，加上溥儀原本就受到滿洲國清遺民敵視共產主義的影響，溥儀自己在日滿合作的過程中，也需要向日本表現出對共產黨，以及蘇聯的防範，不僅能夠樹立滿洲國合作日本的正當性，並且藉此向日本要求更多軍事上的支持³⁰。南次郎也向溥儀傳達佐佐木到一在視察討匪情況的報告中，強調滿洲國軍隊在討匪的過程中，逐漸擺脫私兵，成為富有戰力的國家的軍隊、皇帝的軍隊的情況³¹。可見得即使關東軍在滿洲國的掌握實質權力，但溥儀依然能夠藉由支持日滿合作，分享到部分的權力，以建立效忠自己的軍隊。

表 3-1 建國以來滿洲國內匪賊盛衰狀況表

年度 \ 區分	最盛匪數	衰盛匪數	摘要
大同元年	360,000	130,000	一、基於張學良失地恢復工作，大大策動了國內的兵匪，從八月末開始，由於於殿臣、馮占梅、蘇炳文、馬占山的再起，頓時激增。 二、為此，日滿軍以強而有

²⁹ 関日昇，〈北満山間部農村における抗日民族統一戦線の形成と地域社会—農村有力者、土匪、共産党の關係を中心に〉，《アジア研究》，第69卷，第2期（東京，2023.04），頁17。

³⁰ 林出賢次郎，〈厳秘会見録〉，1935年7月13日，《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第一卷，未標頁碼。

³¹ 林出賢次郎，〈厳秘会見録〉，1935年10月23日，《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第一卷，未標頁碼。

			力的兵團銳意掃蕩兵匪，由於余景德的歸順，丁超、李杜的繳械，蘇炳文、張殿九逃亡俄境，減少了約三分之一。
大同二年	212,000	30,000	一、熱河省內抗日義勇軍抬頭，在展開政治活動的同時，吉林省內的兵匪也呈現活躍趨勢。 二、日滿軍聯合，強行持續熱河作戰，由於吉林省內大量的消匪工作，激減到七分之一。
康德元年	25,000	11,000	一、季節性抬頭 二、持續上一年，日滿軍隊在匪集地帶強力分散配置，治安工作收到了極大的效果。
康德二年	31,000	17,000	一、在北鐵接受前後，由於蘇中兩國對於匪團赤化活動的潛行活躍，政治、思想匪呈擴大趨勢。 二、同國境封鎖的對策相輔相成，極力確保治安

資料來源：佐佐木到一，〈進講第三回〉，1935年10月，收入於李茂杰編、李學松譯，《溥儀與關東軍司令官絕密會談錄》，第17卷，頁270。

事實上，與土匪合作的行為，從晚清以來，就是東北地區的普遍現象，不僅清朝經常使用拉攏土匪的方式維持地方治安，在日俄戰爭期間，無論是日軍或是俄軍都有與當地土匪合作，組成「義勇軍」的情

況³²。曾參與過日俄戰爭的南次郎與林銑十郎，在與溥儀的會談中，也不諱言日軍在日俄戰爭中受到「滿洲義軍」的幫助，溥儀也附和南次郎，將其當作是日滿親善的先例。³³這樣的論述，似乎意味著日滿親善的神話，能夠將滿洲國的任何群體囊括進日滿親善的論述中。為了透過日滿合作反共，來促進日滿親善，不僅要犧牲反滿抗日的成員，就連與溥儀親近的清遺民群體也在犧牲之列。

第三節 海拉爾事件與思想對策工作

關東軍憲兵隊基於日滿共同防衛的目的，將鎮壓反日與防範反滿抗日與共產思想的工作稱之為「思想對策」。在根據關東軍憲兵隊司令東條英機（1884年—1948年）在1936年1月對南次郎發布的報告，思想對策需要根據在滿共產黨、反滿抗日政治和民族黨團，依序分配警察力量加以鎮壓，並且需要特別注意蘇聯和中國的動向，防止兩國擾亂滿洲國³⁴。思想對策實行的過程中，興安北省省長凌陞（1886年—1936年）便成為日滿合作反共的犧牲者。

凌陞，字雲志，為呼倫貝爾副都統、滿洲國參議府參議貴福貴福（1859年—？）之子，曾任張作霖政權蒙古宣撫使顧問，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支持滿洲國，並被任命為興安北省省長，管轄原呼倫貝爾盟³⁵。1936年4月，關東軍憲兵隊以密謀組織蒙古獨立運動為理由，逮捕興安北省省長凌陞。在關東軍憲兵隊的調查報告中，以凌陞為首的蒙古獨立集團，在1929年的中東路事件，就得到蘇聯軍司令官支持蒙古獨

³² Mitter, Rana, *The Manchurian Myth: Nationalism,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 p. 38-41.

³³ 林出賢次郎，〈嚴秘會見錄〉，1935年5月28日，《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第一卷，未標頁碼。

³⁴ 東條英機，〈關於昭和十一年四月以後的治安肅正對策意見〉，1936年1月31日，關憲警第52號，收入於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偽滿憲警統治》（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60-62。

³⁵ 解學詩，《偽滿洲國史新編》，頁224。

立的口頭約定，在海拉爾為蒙古獨立奔走，並在 1935 年在滿洲里會議中與外蒙代表聯絡，說服部下參與反滿抗日陰謀，並將日滿軍情與滿洲國政情密報給蘇蒙兩國³⁶。在報告書中，也提及海拉爾領事館警察署在 1936 年 4 月取締蒙古共產黨員敖世奇、登登來將日滿軍軍情交付給共產國際成員任福祿，並從事赤化宣傳的情事³⁷。儘管在追捕的過程中曾一度逮捕共產黨團海拉爾支部負責人任福祿，任福祿卻在 1936 年 6 月 6 日逃脫³⁸。在日本關東軍的報告中，海拉爾事件是蘇聯在背後給予指導，並企圖蒐集日滿軍情報的事件。³⁹

在《滿洲國史》的研究中，根據日系官吏依田四郎（蒙政部次長）、菊竹實藏（興安總署次長）援助凌陞的情況，加上外蒙古方面同樣對滿洲里會議的蒙方代表桑博（サンパー、Лхамхүүгийн Дарьзав，1891—1937）加以整肅，且受凌陞牽連的烏爾金（Уржин Гармаевич Гармаев，1888 年—1947 年）、額勒春（1879 年—？）也被認為其通蘇反滿的指控係屬誣告，因此認為此事件是蘇聯為離間日蒙關係所為⁴⁰。

宜日奇則認為凌陞之所以支持滿洲國，而後又轉向對抗日本的認同變化，歸因於凌陞受到傳統文化的薰陶，加上清朝對蒙古盟旗實行保境安民的統治政策，使得凌陞帝制思想濃厚，由於呼倫貝爾與蘇聯接壤，在蘇聯極力拉攏下，加上反感日本對呼倫貝爾實施移民開拓，

³⁶ 中央警務統制委員會，〈思想對策月報（第一報）〉，1936年6月13日，中警委第147號，收入於吉林省檔案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編，《日本關東憲兵隊報告集（第一輯）》，第五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162。

³⁷ 中央警務統制委員會，〈思想對策月報（第一報）〉，1936年6月13日，中警委第147號，收入於吉林省檔案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編，《日本關東憲兵隊報告集（第一輯）》，第五卷，頁159。

³⁸ 〈偽中央警務統制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紀要〉，1936年7月6日，中警委第186號，收入於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東北歷次大慘案》（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43-45。

³⁹ 中央警務統制委員會，〈思想對策月報（第一報）〉，1936年6月13日，中警委第147號，收入於吉林省檔案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編，《日本關東憲兵隊報告集（第一輯）》，第五卷，頁150。

⁴⁰ 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編，《滿洲國史》，各論，頁1273-1274。

促使凌陞轉向反日⁴¹。

解學詩認為凌陞與溥儀之間緊密的關係，使得凌陞事件也影響到溥儀對關東軍的態度變得更加恐懼，進而影響到溥儀在訪日後對皇帝權力燃起的熱情，又逐漸消退⁴²。溥儀在自傳中聲稱由於自己與凌陞之間有著緊密的關係，在植田謙吉「殺一儆百」的舉動之後，而對日本關東軍的統治產生恐懼，而四妹韞嫻（1914年－2003年）與凌陞之子色布精太的婚約也因而取消⁴³。解學詩進一步指出凌陞事件波及到滿洲國上層官員，使得滿洲國上層滿系官員人心惶惶⁴⁴。

不過，從〈嚴密會見錄〉中溥儀與植田謙吉的會談記錄，卻看不到溥儀在凌陞事件發生時，對權力的熱情有所衰退，對於植田謙吉所謂「殺一儆百」的言論，溥儀也沒有表現出反對的意圖，遑論因為聯姻關係而對凌陞的遭遇表現出同情。在1936年4月11日的會談中，溥儀主動向植田謙吉詢問凌陞事件的詳情，然而植田謙吉表示案情還需要詳細調查，由於凌陞身分特殊，需要充分尊重其地位，並且改善日滿對蒙古政策，防止事件影響擴大⁴⁵。

對於植田謙吉的回覆，溥儀卻提出鎮壓反滿抗日的必要性：

我看滿洲國的人們，可以大致分為幾種類型…第三種，無論如何教導也不理解滿洲國建國的真正精神，進而繼續採取反滿抗日行動的少數人…對於第三種不良分子，要驅逐到國外或使其滅亡。⁴⁶

⁴¹ 宜日奇，〈試析凌陞的功過是非〉，《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7年03期（呼和浩特，1997.03），頁，32-35。

⁴² 解學詩，《偽滿洲國史新編》，頁224-225。

⁴³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頁262。

⁴⁴ 解學詩，《偽滿洲國史新編》，頁225。

⁴⁵ 林出賢次郎，〈嚴密會見錄〉，1936年4月11日，《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第一卷，未標頁碼。

⁴⁶ 林出賢次郎，〈嚴密會見錄〉，1936年4月11日，《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第一卷，未標頁碼。

而在 1936 年 4 月 21 日，植田謙吉向溥儀告知凌陞因為洩漏日滿軍情，而將被宣判處刑時，溥儀也認為凌陞的行為不當。植田謙吉認為凌陞在蒙古族的領導地位，處置凌陞時需要考慮到，嚴懲凌陞可能會導致蒙古族背叛滿洲國的情況發生，不過要是對凌陞從輕處罰，將來就容易出現同類的犯罪，到時還會需要嚴懲新的罪犯。至於軍事會議的法官，則強調凌陞的判決是基於法律，而不是不是因為私見或政治因素⁴⁷。

對於植田謙吉關於凌陞判決的回覆，溥儀引述乾隆不因皇族身分，而按照國法處置的案例，表達對重視國家法律的肯定。溥儀也就自己回絕貴福為凌陞求情的事情，向植田謙吉徵詢意見，植田謙吉強調貴福不應該為此覬覦溥儀，若貴福轉而向自己請求接見，自己也會拒絕。

48

在關於凌陞事件的會談中，溥儀主張嚴厲鎮壓反滿抗日份子的內容在自傳中並沒有提及，而植田謙吉對於嚴懲凌陞可能會造成滿洲國蒙古人更往蘇聯、外蒙靠攏的擔憂也在溥儀的自傳中被隱瞞，只呈現植田謙吉主張殺雞儆猴，震懾滿洲國國民的一面⁴⁹。

關於〈嚴秘會見錄〉與《我的前半生》對溥儀在滿洲國的經歷所記載的內容有所落差的問題，袁漸達認為溥儀往往會在《我的前半生》的內容中，刻意隱藏自己因為政治權力的野心而與日本協力的一面⁵⁰。從〈嚴秘會見錄〉中關於溥儀積極推動滿日皇室聯姻的內容來看，袁漸達認為溥儀具有藉由利用天皇制，在滿洲國獲得更多政治權力的企圖⁵¹。

在海拉爾事件後，鑒於任福祿逃脫，遂導致東條英機決定在北滿

⁴⁷ 林出賢次郎，〈嚴秘會見錄〉，1936年4月21日，《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第一卷，未標頁碼。

⁴⁸ 林出賢次郎，〈嚴秘會見錄〉，1936年4月21日，《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第一卷，未標頁碼。

⁴⁹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頁262。

⁵⁰ Jianda, Yuan, *Chinese Government Leaders in Manchukuo, 1931-1937*, p.56-57.

⁵¹ Jianda, Yuan, *Chinese Government Leaders in Manchukuo, 1931-1937*, p.54-55.

擴大對共產黨的逮捕行動，將反共從維持治安的剿匪工作，擴大到教育界，並在 1936 年 6 月 13 日進行全面逮捕北滿共產黨的行動，其中逮捕的教育工作者佔 40%⁵²。中央警務統制委員會認為，滿洲國的教育將共產黨認為是匪賊問題，會導致缺乏對教師、學生的警戒，以至於縱放共產黨嫌疑者，為此警務機關要與教育機關加強合作，嚴格檢查學校教師、學生的思想：

對不良分子要採取堅決措施，努力工作，以期絕滅。⁵³

關東軍在取締共產黨的過程中，對所謂的「不良分子」表現出敵視的態度，與溥儀在海拉爾事件中對「不良分子」的論述可以說是遙相呼應，都主張用武力將其滅絕。海拉爾事件影響日後日滿合作防共的規模不僅更加擴大，防共的手段也更加激進暴力，原先用軍事力量對付共產黨武裝勢力的手段，擴大到對文教界，並將涉嫌宣傳共產主義的教師、學生、報社社員加以逮捕、處決⁵⁴。然而在溥儀的回憶錄中，溥儀卻將自己塑造成畏懼關東軍權威，不得不服從的形象，隱藏自己在日滿合作反共中，曾經表現過的積極性。

Timothy Brook 認為中國人在抗日史的集體記憶有著固定的模式，殘暴的日本人，欺凌中國人，中國人進而挺身抗戰，在這樣的集體記憶中，中國人和日本人協力的歷史並不受歡迎，甚至不被承認。⁵⁵在滿

⁵² 〈偽中央警務統制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紀要〉，1936年7月6日，中警委第186號，收入於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東北歷次大慘案》，頁44。

⁵³ 〈偽中央警務統制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紀要〉，1936年7月6日，中警委第186號，收入於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東北歷次大慘案》，頁45。

⁵⁴ 〈關於逮捕北滿共產黨概況〉，關東憲兵隊編，《在滿憲兵史》，收入於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東北歷次大慘案》，頁50-51。

⁵⁵ Brook, Timothy, *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p. 3.

洲國，抗日神話的影響一樣強烈，Rana Mitter 強調即便是馬占山、蘇炳文等傳統抗日神化論述中的英雄，在決定投入抗戰或是服從日本的過程中，都有複雜的考量，最終無法抵擋中國民族主義的抗日宣傳，選擇與日本分道揚鑣。⁵⁶儘管溥儀選擇與日本維持更加緊密的協力關係，企圖從中獲得更多政治利益，當滿洲國走向失敗，溥儀不得不妥協抗日神化論述，即便不能將自己塑造成抗日的形象，卻有意識的將自己在協力的角色，塑造成被日本利用的受害者形象。在溥儀塑造受害者形象的過程中，溥儀在協力過程中的主動形象被刻意淡化，溥儀對反滿抗日份子的敵視，以及疏遠清遺民的歷史也逐漸被遺忘。

第四節 小結

在滿洲國建立之前，溥儀就意識到軍隊對強化政治權力的重要性，也派遣宗室成員留學日本學習軍事。在滿洲國建立之後，《日滿議定書》中所建構的日滿軍事合作關係，是將滿洲國的國防事務委託日本，將日軍在滿洲國的行動合法化，軍事大權是由日本所掌握。在滿洲國清遺民所塑造的滿洲國建國精神中，王道主義也標榜以和平為目的，鄭孝胥擔任國務總理期間對於日滿軍事合作的態度也相當消極，強調日滿間傳統道德一致性，專注在文教宣傳方面的合作。

但是在溥儀轉向透過強化日滿親善，企圖藉此提高皇帝權力之後，在滿洲國建立效忠皇帝的軍隊，因而開始重視強化滿日軍事合作。另一方面，日本也深感加強日滿軍事合作，有助於達成其反共的目的，溥儀在滿洲國也積極向日本表達對共產主義的憂慮。而《日滿議定書》所規範的日滿軍事關係，固然將滿洲國國防事務委託日本，但是在滿洲國國內治安方面，也強調日滿軍事合作的重要性，故溥儀也企圖藉由強化日滿軍隊合作共同「討滅共匪」，提高滿洲國軍隊的素質，和對皇帝的忠誠。

儘管滿洲國對軍隊的統帥權實際上被由關東軍所派遣的軍事顧問

⁵⁶ Mitter, Rana, *The Manchurian Myth: Nationalism,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 p. 223-224.

所架空，但表面上，無論是關東軍與溥儀的談話，亦或是新任國務總理張景惠的報告，都向溥儀傳達滿洲國軍隊有逐漸脫離私人軍隊的性質，轉而效忠皇帝的訊息，而溥儀也樂見日滿軍事合作的發展。

在日滿強化軍事合作，共同討滅共匪的過程中，也伴隨著許多滿洲國國民的犧牲，其中也包括原先支持滿洲國，對溥儀復辟頗具好感的凌陞，在凌陞因為通蘇與支持蒙古獨立而被關東軍逮捕處決的過程中，溥儀選擇疏遠這些曾經的支持者，強調違反建國精神的國民，即便是驅逐或鎮壓也在所不惜，當滿洲國的建國精神已然變質，從王道主義變質為日滿親善，鄭孝胥、羅振玉等清遺民也因此對滿洲國轉向失望。在滿洲國走向失敗後，溥儀選擇在白傳中隱藏對日滿軍事合作的積極性，選擇附和中國在中日戰爭中的集體記憶，將自己也塑造成日本侵略的被害者，但是溥儀為加強日滿親善，對滿洲國國民，乃至於滿洲國清遺民所造成的傷害，已經無法彌補。



結論、反革命論述與滿洲國的集體認同

一、清遺民思想中的反共意識

「革命」在中國現代史中佔有著巨大的話語權，革命不僅標誌著在政治上皇帝制度轉向共和制度，在文化思想上，也意味著中國傳統文化將面臨西方文化更加劇烈的衝擊。然而，在支持革命的口號大肆宣揚，以革命為名的政治運動在中國現代史上如火如荼的進行之時，站在反革命立場的清遺民群體，事實上也同樣在中國現代史上，具有不可忽視的聲量。

如同陳建華在研究中，揭示了「革命」的話語在現代中國所經歷的演變¹，反對革命的清遺民同樣會尋求各種思想資源來加強反對革命的論述，當民國的知識分子逐漸受到共產主義的影響，共產黨人甚至以共產主義為名義，促使革命更趨向激進化的同時，清遺民也在反革命的論述中，強調共產主義的危害，而防止共產主義繼續蔓延，則成為部分清遺民繼續投入復辟運動，乃至於參與滿洲國的理由之一。

在清遺民在滿洲國塑造反對革命的論述過程中，反對共產主義之所以被羅振玉、鄭孝胥等清遺民當作不得不參與滿洲國的理由，在於清遺民認為共產主義對於傳統儒學的危害，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而東北地區既是清朝的龍興之地，受異端邪說影響的程度又不至於糜爛到無可挽救，應該趁九一八事變的時刻，積極與日本協力尋求復辟清朝的機會。這樣的論述，不僅標誌著共產主義將在滿洲國被視為異端邪說，受到強烈的打壓，更進一步預示著滿洲國的建國精神將是一元化的統合國民意識。

如同王奇生在研究中所指出，「革命」在民國被神聖化與正義化的同時，往往意涵著強烈的任意性與專斷性²，當鄭孝胥在擔任國務總理

¹ 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化與考論》，頁167-169。

² 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頁100 頁。

期間將王道主義作為滿洲國建國精神，透過文教部在滿洲國推廣宣傳的同時，在滿洲國宣傳中所排斥的異端邪說，同樣不限於共產主義，任何有違鄭孝胥思想中傳統儒家道德的思想，都是需要排除的對象。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清遺民的反共意識中，和革命一樣帶有強烈的暴力含意，在清遺民的理想中恢復傳統道德，仰賴的是文教的力量。

清遺民在滿洲國企圖恢復傳統道德的理想中，固然在反對共和、防止共產主義方面與日本利益一致而得以建立協力的基礎，但是鄭孝胥理想中的王道主義，卻極力反對軍國主義。在鄭孝胥對法西斯主義的評論中，可以看出鄭孝胥雖然肯定法西斯主義對於反共、排斥異端邪說的作為，但鄭孝胥卻厭惡法西斯主義實施軍事化與暴力的手段，強調滿洲國王道主義的優越性在於透過文教來改善國民的道德。

當滿洲國清遺民越是強調道德的優越性，指責共產主義、革命的暴力對傳統道德的危害，卻越是無法忽視在東亞實行軍事擴張的日本。事實上，鄭孝胥並不是沒有意識到滿洲國王道主義宣傳與日本軍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也企圖用王霸合作的論述合理化王道主義的滿洲國與實行霸道的日本合作的情況。但鄭孝胥的努力不僅無法說服日本與鄭孝胥繼續維持協力，鄭孝胥恢復傳統道德的理想也無法得到溥儀的青睞，在溥儀的授意之下，鄭孝胥在 1935 年 5 月不得不去職。

相較於清遺民的反共意識是基於共產主義的激進暴力對傳統道德破壞的危機感，溥儀在滿洲國之所以表現出反共的態度，與其說是源自於道德危機感，不如說是藉由反共與日本關東軍深化協力，並以此提升自己身為皇帝的權威。對溥儀而言，清遺民的王道主義宣傳，藉由恢復傳統道德，增強自己滿洲國統治的正當性固然重要，但溥儀同樣意識到掌握軍事權力對擴大政治影響力的必要性。而日滿合作武力鎮壓共產黨的活動，不僅能夠有效削弱滿洲國內的反對力量，同時還能讓溥儀說服日本協助提升滿洲國軍隊的裝備與素質，甚至增強滿洲國軍隊對皇帝的忠誠。

鄭孝胥去職後，清遺民在滿洲國的政治勢力逐漸衰退，他們在滿

洲國所宣傳的建國精神也逐漸變質。滿洲國的反共主義從清遺民對道德危機的回應，轉變為溥儀在日滿協力的結構中建構自身權力正當性的工具，不僅意味著原先清遺民所強調的傳統道德的優越性，逐漸被日滿親善所取代，也讓滿洲國採取更加激烈的手段對付共產主義。而在演變的過程中，滿洲國也逐漸喪失自身的主體性，成為日本進行軍事擴張的附庸。

二、他者建構與反共

儘管清遺民在滿洲國重建傳統儒家的理想，隨著滿洲國逐漸捲入戰爭而瓦解，但清遺民確實為滿洲國建國初期，對塑造滿洲國集體認同做出努力。近年來也有學者開始肯定滿洲國的建國精神與意識形態，Prasenjit Duara 認為，文化與權力之間的關係在戰間期逐漸被確立，文化變成了一個被認同的概念、實體與潛在的認同對象，範圍可能比民族國家遼闊或窄小，一旦文化被確立，文化成為身份認同的對象，也就形塑了真實的政權。由於作為文化形態的國家允許一定程度的自願性和滲透性，缺乏種族民族主義的預定論和排他主義。文化國家有能力發展成為多元文化國家。儘管滿洲國的權力結構是由少數日本統治者占主導地位，但滿洲國在建國初期仍呈現出多元文化國家的模式，滿洲國藉由實踐尊重滿洲國內各種多元文化，進一步在東亞塑造了跨國族認同，也藉此確立了滿洲國的主權，然而隨著戰爭持續進行，滿洲國越來越疏遠跨國族認同，最終成為軍事法西斯國家³。

儘管 Prasenjit Duara 對滿洲國演變成法西斯國家的結局感到遺憾，但也對滿洲國在建國初期所塑造的多元文化理想表示肯定。這樣的理論也意味著 Prasenjit Duara 將滿洲國建國精神的塑造，看作是缺乏排他主義的結果。忽略了滿洲國在塑造建國精神的同時，也在排除任何

³ Duara, Prasenjit,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p.251-253.

有違滿洲國建國精神的思想。實際上，清遺民在滿洲國重建傳統儒學的過程中，也毫不避諱的宣傳排除共和、共產等外來異端邪說的重要性。

在 Edward Said 的東方主義研究的觀點中，無論東方或西方，在任何場域涉及到集體認同的建構，總是需要不斷的重新詮釋他們與我們的差異。換言之，建構集體認同的過程中，他者的建構也同時並存。他者塑造的過程不僅影響到認知層面，更對政治權力的建構產生莫大的影響⁴

若從 Edward Said 的觀點來看待滿洲國集體認同的塑造，何謂滿洲國建國精神，哪些意識形態、政治學說符合滿洲國建國精神，或違反滿洲國建國精神，成為被排除的對象，與滿洲國集體認同的塑造密不可分，連帶影響滿洲國的施政方針。在塑造滿洲國集體認同的過程中，共產主義往往被滿洲國官方認為是不符滿洲國建國精神的學說，不僅在文教方面要防止共產學說在滿洲國蔓延，傳播共產主義的共產黨成為滿洲國軍事鎮壓的對象。

滿洲國對於共產主義的認知，也進而影響滿洲國排除他者的範圍與排除他者的手段。反共意識的形成相當複雜，滿洲國對於共產主義如何與滿洲國建國精神互相牴觸，如何分辨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共產黨，共產主義的傳播是來自本國，或是外國勢力在背後操控，種種考量都會影響到滿洲國的反共政策。

對滿洲國清遺民而言，滿洲國建國精神中的王道主義與恢復傳統儒學密不可分，在滿洲國清遺民的認知中，共產主義是破壞傳統儒學的外來學說，要根本排除共產主義，必須透過文教的力量，在滿洲國積極傳播儒學。為此，以國家為主導的宣傳與教育，是滿洲國清遺民進行反共的主要施政方針。滿洲國清遺民的反共，乃是基於傳統道德遭受激進暴力破壞的危機感，滿洲國清遺民在塑造滿洲國建國精神的

⁴ Said, Edward, *Orientalism* (London: Penguin Group, 1994), p.332.

過程中，也同時在排除軍事化、革命等暴力激進的思想，然而清遺民排除軍事化的理想，卻與掌握滿洲國權力的日本關東軍的理想背道而馳。

駒込武的研究認為王道主義的理念的形成是用來對抗中國民族主義，但是當王道主義與日本民族主義以及日本帝國擴張的戰略需求產生衝突時，王道主義便難以延續。1935 年以後，滿洲國引入天皇制的思想，目的是為了消融王道主義的影響，以便於進一步將滿洲國納入日本帝國的支配體系⁵。

原先清遺民的理想是將滿洲國塑造成王道主義國家，在日本的介入下，滿洲國的建國精神的基礎也從王道主義變成日滿親善，在滿洲國的集體認同產生質變的情況下，作為他者的共產主義也勢必受到影響。1935 年以後，日本關東軍逐漸將治安問題的目標從張學良殘餘勢力轉移到共產主義者，將共產主義者視為共匪，加強軍事鎮壓。

在日本關東軍的眼中看來，共匪不僅危害地方治安，共匪在背後有蘇聯、中國和蒙古暗中支持，來自滿洲國境外的共產主義者也透過共匪蒐集滿洲國軍事情報，進而危害日本軍隊的安全，甚至是日本在滿洲國的統治基礎。當共產主義從傳統道德危機，被塑造成國防治安的隱患，滿洲國也強化武力鎮壓共產主義者的政策。

在滿洲國趨向軍事化的過程中，也不限於日本關東軍會將日滿親善當作區分我群、他群的分類依據，溥儀在海拉爾事件中，就將滿洲國民按照接受日滿親善的程度進行分類：

我看滿洲國的人們，可以大致分為幾種類型：第一種，是能夠充分認識滿洲國建國的真正精神，認為日滿一德一心，關係密不可分的少數知識階級；第二種，透過教導可以使之成為服從東西南北任何方向的大多數國民；第三種，無論如何教導也不理解滿洲國建國的

⁵ 駒込武，《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頁281-282。

真正精神，進而繼續採取反滿抗日行動的少數人。⁶

溥儀承認大多數的國民都還未具備滿洲國集體認同，只有少數人將日滿親善視為滿洲國集體認同，為了擴大日滿親善的集體認同，需要透過文教來凝聚大多數的滿洲國國民，但是對於反滿抗日份子，儘管同為滿洲國國民，溥儀將其視為他者，毫不留情將其排除在滿洲國之外。

在溥儀與關東軍都將日滿親善當作滿洲國集體認同的基礎，並且反滿抗日份子、共產主義者、投向外蒙的蒙古民族主義者…等一切被認為違反日滿親善的群體，即便是滿洲國國民，曾經在建國初期認同滿洲國，擔任滿洲國官員，都成為滿洲國集體認同的他者，必要時須要透過武力排除在滿洲國之外。而凌陞作為海拉爾事件的主謀，將日滿軍事機密出賣給蘇聯、外蒙，率領蒙古族在蘇聯的支持下，企圖讓蒙古族共產化，即便曾經認同滿洲國，在成為違背滿洲國建國精神的他者之後，最終被關東軍處決⁷。

當滿洲國的王道主義逐漸式微，轉向軍事化的日滿親善國家，作為滿洲國建國功臣，在滿洲國建國初期塑造王道主義的清遺民，即便在滿洲國地位崇高，也獲得優渥的功勞金，但卻在溥儀的默許下，藉由內閣改造，逐漸被排除在滿洲國政治權力核心之外，儘管忠誠於溥儀的清遺民逐漸喪失政治權力，但對溥儀而言，深化與日本作協力才是獲得政治權力的必要手段。

如同國民黨與共產黨在革命論述的他者建構，當革命被塑造成集體認同的同時，將反對者塑造成反革命加以排除也牽涉到中國政權的爭奪，當日滿親善被塑造成滿洲國建國精神，成為滿洲國的集體認同，

⁶ 林出賢次郎，〈嚴秘會見錄〉，1936年4月11日，《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第一卷，未標頁碼。

⁷ 林出賢次郎，〈嚴秘會見錄〉，1936年4月21日，《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第一卷，未標頁碼。

在滿洲國將共產黨、蒙古獨立者、政治匪、土匪等一切反對者用反滿抗日的名義當成滿洲國的他者加以武力鎮壓，也是滿洲國展現權力的方式，然而將日滿親善當作滿洲國的集體認同，也意味著日本在滿洲國的權力進一步被強化，在溥儀深化日滿協力之後，滿洲國的政權正當性也隨之移轉。

三、日滿親善與滿洲國正當性的轉移

在日主滿從的權力結構中，溥儀嘗試透過深化日滿親善，藉由日本天皇制，重建皇帝權力。事實上，無論是關東軍，抑或是滿洲國民眾，都只能感受到溥儀強化日滿親善的一面，並沒有意識到溥儀在提升的皇帝權威的努力。

Timothy Brook 認為，協力在政治上並不穩定，協力者與占領者之間也難以建立道德正當性，對於占領者來說，協力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表面上的，占領成本不斷增加，抵抗使得占領者扶植任何實質的新秩序變得相當困難。更糟糕的是，當協力所引發的共謀和競爭，阻礙了協力政權為了宣稱合法性而必須經歷的政治過程。在這種情況下，協力將陷於失敗。⁸

滿洲國的政權穩定性，相較於 Timothy Brook 所研究中協力政權來的穩定，但是在日本帝國戰敗垮台後，滿洲國也和其他協力政權一樣迅速瓦解。事實上，若將溥儀疏遠清遺民勢力，藉由深化日滿親善來提升政治權力的舉動，當作是 Timothy Brook 在研究中所指出的協力中的競爭的話⁹，溥儀的舉動不僅破壞清遺民塑造滿洲國王道主義的努力，同時也降低了滿洲國的政權正當性。

事實上，在溥儀決定深化日滿親善，引入天皇制之前，曾經擔任日本眾議院議員的神田正雄（1879 年—1961 年）在視察滿洲國實施帝

⁸ Brook, Timothy, *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p. 248.

⁹ Brook, Timothy, *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p.159.

制的情況之後，也曾建議溥儀與關東軍，在滿洲國實施帝制之後，需要透過實踐王道主義，獲得滿洲國民眾的支持來提升皇帝的權威：

中國的皇室與人民的關係是君主的德政為人民所敬仰後，才可以即帝位…要在滿洲帝國樹立真正意義的帝制，以所謂的王道主義使人民沐浴在王的德澤，就需要施與帝王的德政制度…今日最必要的當然是日滿兩國民的融和，但如何讓滿洲民眾理解沐浴德政的新制度的功德。為此，我認為可以盡早考慮將制度從軍政轉向民政。¹⁰

現實的發展並沒有按照神田正雄的建議，滿洲國透過實踐王道主義，來獲得滿洲國民眾支持來提升皇帝的權威，溥儀反而選擇將皇帝權威與天皇制互相結合。也正如神田正雄所言，滿洲國民眾並沒有日本民眾服從於天皇制的傳統，在滿洲國引進天皇制，並不能藉此獲得滿洲國民眾的支持，溥儀自己也意識到大部分的滿洲國國民對滿洲國並沒有好感，然而溥儀對於如何獲得滿洲國國民的支持問題，並沒有選擇實施德政，而是企圖用宣傳教化的方式，讓滿洲國國民接受滿洲國建國精神，而不願接受其教化的國民，則將其視為反滿抗日份子加以鎮壓。

在七七事變爆發後，儘管溥儀在與植田謙吉的談話中，強調日軍進攻北京是為了協助溥儀復辟的傳言係屬捏造¹¹，溥儀也動員滿洲國國民在經濟上，援助日本在中國的軍事擴張，藉此向日本傳達日滿一心一德的態度¹²。在溥儀宴請關東軍將領的晚宴上，溥儀再次強調反共

¹⁰ 神田正雄，〈帝制後の満洲国を視察して〉，1934年9月，收入於李茂杰編、李學松譯，《溥儀與關東軍司令官絕密會談錄》，第20卷，頁165-181。

¹¹ 林出賢次郎，〈嚴秘會見録〉，1937年8月2日，《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第一卷，未標頁碼。

¹² 林出賢次郎，〈嚴秘會見録〉，1937年8月11日，《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

與日滿親善的重要性：

南京政府同共產主義握手，將其引入國內。一想到中華民國人民的將來，實在是令人感到寒心…日滿一德一心的精神才是不滅的寶物…滿洲國全體一定要努力貫徹此精神，對於努力說明仍然不能理解的人，只能將其排除。¹³

當溥儀將統治正當性與日滿親善結合的同時，也意味著溥儀將統治正當性從滿洲國國民的支持中轉移，使得溥儀與滿洲國國民的距離越來越疏遠，德政不僅沒有實施在滿洲國國民，為了促進日滿親善，甚至需要增加滿洲國國民的經濟負擔以支持日本軍事擴張，並將不服從日滿親善的滿洲國國民加以排除。

誠如駒込武在研究中所指出，溥儀在滿洲國導入日本天皇制，讓滿洲國被納入與日本帝國的支配體系¹⁴，這也同時讓滿洲國的政權正當性與日本帝國的命運互相依存，也意味著滿洲國已經無法從王道主義獲得政權正當性，滿洲國也得不到滿洲國國民的支持，當1945年日本帝國戰敗，滿洲國也隨即瓦解。

第一卷，未標頁碼。

¹³ 林出賢次郎，〈皇上關係（第二号）〉，1937年8月12日，《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第六卷，未標頁碼。

¹⁴ 駒込武，《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頁281-282。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一) 日記、回憶錄、文集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香港：中華書局，1983。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全五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

周佛海，《周佛海日記全編》，北京：中華書局，2003。

胡嗣瑗，《胡嗣瑗日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

袁英光、劉寅生編，《王國維年譜長編（1877-1927）》，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程克祥口述，黃曜隆著，《京滬區長》，桃園：慈恩書局，1982。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北京：群眾出版社，2013。

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潘光哲編，《胡適全集：胡適中文書信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2018。

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全 20 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羅繼祖編，《羅振玉學術論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二) 期刊報紙

《大同報》（新京），1935。

《盛京時報》（奉天），1934。

《新青年》（上海），1919。

《滿洲報》（大連），1934、1935、1936。

湖南《大公報》（長沙），1924。

（三）檔案

「戴笠手諭關於安少如組組員准自十二月份起月增活動費並務於明日
上午十時前告知安同志」，1942年11月15日，〈戴公遺墨－經理
類（第2卷）〉，《戴笠史料》，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144-010111-
0002-038。

（四）史料彙編

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編，《日本帝國
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東北歷次大慘案》，北京：中華書局，
1989。

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編，《日本帝國
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偽滿憲警統治》，北京：中華書局，1993。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九冊（1933），北京：中共中
央黨校出版社，1991。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資料編輯部主編，《民國人物碑傳集》，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4。

李茂杰編、李學松譯，《溥儀與關東軍司令官絕密會談錄》，20卷，北
京：線裝書局，2015。

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台北：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1973。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甲子清室密謀復辟文証》，北京：清室善後委員
會，1925。

遼寧省檔案館編，《溥儀私藏偽滿秘檔》，北京：新華書店，1990。

（五）專書

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

學文獻出版社，2010。

王柯，《亦師亦友亦敵：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

周明之，《近代中國的文化危機：清遺老的精神世界》，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9。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台北：聯經出版事業，2009。

胡平生，《民國初期的復辟派》，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

陳建華，《「革命」的現代姓 中國革命化與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解學詩，《偽滿洲國史新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六） 論文集論文

羅繼祖，〈王國維先生的政治思想〉，收入於吳澤主編，《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第一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頁398-409。

（七） 期刊論文

周帥，〈1898-1927：王國維對蘇俄的認識〉，《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7 卷，第 6 期（徐州，2011），頁 63-69。

宜日奇，〈試析凌陞的功過是非〉，《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7 年 03 期（呼和浩特，1997.03），頁 29-39。

林志宏，〈王道樂土—清遺民的情感抵制和參與「滿洲國」〉，《新史學》，第 18 卷，第 3 期（台北，2007.09），頁 45-101。

陳熙遠，〈共和國裡的皇室婚禮—宣統大婚與帝制王朝的最後掙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94 期（台北，2016.12），頁 77-129。

曾士榮，〈學界關於二次大戰期間東亞的「戰爭協力（wartime collaboration）」的研究回顧與反思〉，《臺灣學研究》，第 23 期

（台北，2019.02），頁 31-55。

黃自進，〈九一八事變時期的日中政治動員與軍事作戰〉，《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26 期（台北，2006.11），頁 169-231。

黃自進，〈犬養毅與九一八事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5 期（台北，1996.06），頁 311-335。

顧頡剛，〈悼王靜安先生〉，《中國文化》，1995 年 11 期（北京，1995.07），頁 283-288。

（八）學位論文

任蓉蓉，〈偽滿洲國文教部研究〉，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論文，2020。

吳素惠，〈盛京時報之研究〉，台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陳曦，〈政治文化視角下的〈滿洲報〉副刊研究（1931-1937）〉，長春：吉林大學文學院暨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論文，2019。

黃昱翰，〈重把乾綱握？——滿洲國帝制之成立與時人認識〉，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楊悅，〈偽滿時期《盛京時報》「主辦事業」研究（1931—1944）〉，長春：吉林大學文學院暨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論文，2018。

鄒金喜，〈從「此邦俗亦偷」到「今日日光輝萬國」：鄭孝胥日本觀的轉變歷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蔣蕾，〈精神抵抗：東北淪陷區報紙文學副刊的政治身份與文化身份——以《大同報》為樣本的歷史考察〉，長春：吉林大學文學院暨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論文，2008。

二、日文部分

（一）日記、回憶錄、文集

石原莞爾，《最終戦争論・戦争史大観》，東京：中央公論社，1993。

（二）史料彙編

外務省情報部編，《現代中華民國滿洲帝国人名鑑》，東京：東亞同文會，1937。

角田順編，《石原莞爾資料——國防論策篇》，東京：原書房，1975。

林出賢次郎，《林出賢次郎關係文書（微縮資料）》，10卷，東京：雄松堂書店，1999。

國務院文教部編，《滿洲國文教年鑒》，上、下冊，新京：川口印刷所，1933。

國務院總務廳，《滿洲國官吏錄：大同二年版》，大連：滿洲日報社，1933。

滿蒙資料協會編，《滿洲紳士録昭和12至版》，東京：滿蒙資料協會，1937。

滿洲國協和會編，《滿洲國協和會之概要》，新京：滿洲國協和會，1933。

鷺尾義直編，《犬養木堂書簡集》，東京：人文堂，1940。

（三）專書

山室信一，《キメラ—滿洲国の肖像（増補版）》，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4。

及川琢英，《帝国日本の大陸政策と滿洲国軍》，東京：吉川弘文館，2019。

加藤豊隆，《滿洲国警察小史—（第一編）滿洲国権力の実態について》，松山：滿蒙同胞援護会愛媛県支部，1970。

滿洲国史編纂刊行会編，《滿洲国史》，總論、各論，東京：滿蒙同胞援護会，1970、1971。

駒込武，《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6。

（四）檔案

- 「日満守勢軍事協定」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C14030502700、満日守勢軍事協定書類 日満守勢軍事協定
書類 昭和7年9月15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 「御署名原本・昭和七年・条約第九号・昭和七年九月十五日ノ日満議
定書」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1877600、御
署名原本・昭和七年・条約第九号・昭和七年九月十五日ノ日満
議定書（国立公文書館）。
- 「第2章 満洲国軍政及之が指導の現況／第1節 総説」JACAR（ア
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010028300、満洲国軍政の指導
昭和9年8月1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五） 期刊論文

関日昇，〈北満山間部農村における抗日民族統一戦線の形成と地域社
会—農村有力者、土匪、共産党の關係を中心に〉，《アジア研究》，
第69巻，第2期（東京，2023.04），頁1-21。

三、英文部分

（一） 専書

- Brook, Timothy. *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Duara, Prasenjit.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2003.
- Hobsbawm, Eric, and Ranger, Terence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Mitter, Rana. *The Manchurian Myth: Nationalism,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Said, Edward. *Orientalism*. London: Penguin Group, 1994.

Jianda, Yuan, *Chinese Government Leaders in Manchukuo, 1931-1937*. Abingdon: Routledge, 2023.

（二）論文集論文

Hirschfeld, Gerhard. "Collaboration in Nazi-Occupied France: Some Introductory Remarks," in Hirschfeld, Gerhard, and Marsh, Patrick ed., *Collaboration in France: Politics and Culture during the Nazi Occupation 1940-1944*. Oxford: Berg Publishers, 1989.

（三）期刊論文

Dethlefsen, Henrik. "Denmark and the German occupation: Cooperation, negotiation or collaboration?,"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istory*, 15: Issue 1-2 (1990): 193-206.